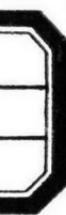


小城镇 四记

费孝通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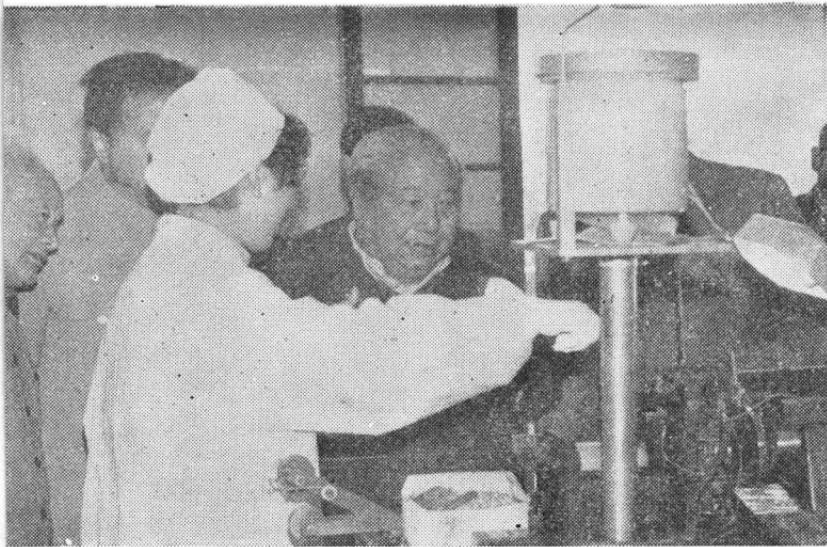
新华出版社



1983年费孝通教授(右)在南京“江苏省小城镇
研究讨论会”上发言



费孝通教授(右二)乘船去吴江县



费孝通教授(左二)在泰州参观乡镇企业



费孝通教授(前)在镇江听取汇报

出版说明

小城镇的发展已成为我国四化建设中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问题。费孝通教授以社会学家的责任感和洞察力，抓住这个问题，深入到城乡人民的改革实践中去作调查研究。近年来，他以故乡——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为出发点，对江苏全省十一个市的小城镇作了系统的了解和分析。在这个基础上，他写了四篇重要著作，即《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再探索》、《小城镇，苏北初探》、《小城镇，新开拓》。这四篇著作陆续刊登在《瞭望》周刊，现应读者要求，汇集而成册，征得费孝通教授同意，书名定为《小城镇四记》。

推荐一本书(注)

胡 耀 邦

发展小城镇这件事，我们党内许多同志还没有接触过，我也是蜻蜓点水，因此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更不可能拿出一套正确的措施。既然拿不出，就不必急忙作决策，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推行。凡属不成熟的事硬着头皮去干，事情必然成不了功。我在这方面吃苦头是很多的。

但这本小册子是值得一看的。文字将近四万，太长了一点，但是好看。费老毕竟是一位有专长的学者。而这篇东西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能给人以一定的思想启迪。

1983年11月5日

注：书指费孝通作的《小城镇，大问题》。题目系编者所加。

序

费老孝通同志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学者。近年来，他研究小城镇问题多有论述，多有创见。

更值得推荐的是他的治学方法。他彻底抛弃锁在书斋里讲道理的方法，坚持到现场去到实践洪流里去蹲点调查，坚持把所见所闻如实记录下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探讨。几年来不辞辛苦，五下江苏，悉心考察了大江南北一处又一处的小城镇。着力于掌握翔实的第一手材料，从生活中捕捉新鲜的信息，追溯历史，预测未来，给社会学这门科学注入新的生命力，也为国家解决当前迫切的建设课题提供科学基础。研究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其中如费老和同他一道工作的同志们所用的方法，应算作一种比较实在的科学方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方法。

发展小城镇，是当今我国农村中的一件大事。对这件事各方认识不尽完全一致。但小城镇数量远不适应我国社会主

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已是公认的事实。小城镇本身产业结构不能千篇一律，有了小城镇还应有中等城市作为大小城市的联结点，中等城市数量也应有所增加，这也是无疑义的事。尽管如此，需要探讨研究的问题还是很多的，从事研究的人数少了不行，需要培养一支适量的科研队伍。费老带了头，写了文章，培养了干部。作为一个经济工作者，我衷心感谢他的努力，并高兴为他的论文集出版写这个小序。

杜润生

目 录

小城镇	大问题	1
小城镇	再探索	51
小城镇	苏北初探	75
小城镇	新开拓	115

小城镇 大问题^①

(一)

今年的春末夏初，我在江苏省吴江县住了一个月，对该县十来个小城镇的历史与现状作了初步探索。此后打算写一篇关于小城镇的类别、层次、兴衰、布局和发展的文章，来参加这次小城镇讨论会。然而一回到北京，时间由不得自己支配，这个打算便落了空。因此，这里只能依我的腹稿，谈谈我在吴江调查的感受以及由此联想到的一些问题，只是一个提供讨论的发言。

在说到正题以前，首先说说我对这次讨论会的四点希望，即希望通过讨论取得四个具体结果：一是出版一本研究论文集；二是订出一个今后切实可行的研究规划；三是为今冬全国政协小城镇问题调查组作些准备工作，就是提出一些请他们来调查的问题；四是成立一个推动、协调、交流这个课题研究工作的学术性组织。

① 本文系作者于1983年9月21日在南京“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讨论会”上的发言。由沈关宝同志整理，并经作者审阅订正。

这次学术讨论会是今年年初确定的，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现在不仅会议如期举行，而且还汇集了几十篇论文。万事开头难，时间只有半年，这样的结果确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应当珍惜已经获得的成果，以论文集的形式将迈出的这第一步脚印留下来。

这些论文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它们都联系小城镇建设的实践，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探索小城镇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我认为这个研究方向是对头的。我国的社会科学应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密切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进行科学研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要贯彻这里所提出的指导思想和达到最终目标并不那么容易。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对于马列主义理论，我们多少学了一些，许多同志也诚心诚意地想把事情办好；但是学习的理论常常不能和实际工作相结合，这就使得我们的认识往往落后于实际。对于具体问题的处理也就提不出实事求是的建议来，难免把以往的经验或是别国的东西硬套照搬，以致花了过多的学费，亏了本，走了不少弯路。

失误使人清醒。现在我们多少懂得了一点小平同志在他的《文选》里所阐明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只有联系实际才能出真知，实事求是才能懂得什么是中国的特点。我们的小城镇研究一开始就摆脱了在概念中兜圈子、从书本到书本的模式，而注重实地调查，力求在对小城镇的实际考察中提高认识。可以说这一课题的研究，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有了一个良好的尝试。

以实践为根基的认识自然要具体、充实得多。尽管现有的文章还显得粗糙，分析不够全面，可是写在论文里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不是我们从概念里推论出来的，更不是凭主观臆想出来的东西。只要我们能自觉地、不留情面地把其中一切不符合实际的成分筛选掉，那么这些文章就成为现实小城镇面貌的素描。它是历史的真实记录，过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人们还是要翻看，仍然具有价值。价值就在于它是未来的起步，而今后的变化则是它的延续。

当然，人们的主观认识与事物的客观存在完全符合是不可能的。人们对客观实际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而客观实际又是不断变动的，人们的认识也得跟着变动。反映不能及时，跟不上变化而固步自封，认识就会落后于实际。我们的一生，人类的一代又一代，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跟着向前走的。我们今天对于小城镇的认识，过些时候回头一看，如能发现它的肤浅和幼稚，那就证明我们的认识有了进步。这不是很好么？不怕起点低，只怕发展慢。

为了留下历史的痕迹和认识的脚印，不使我们在实践中得到的这一点宝贵的知识流失，我希望江苏人民出版社能把这次讨论会的论文印成一本集子出版。我认为把知识流传开来，储存下去，应是出版社的责任和义务。当然，在出版之前，还必须对文稿进行选择和修正，容许认识不足并不等于是说文章可以拙劣。会见情人前总得打扮一番，以自认为最能悦人的面貌见世。为此，我愿意承担一部分推荐论文的责任，出版一本小城镇研究论文选集，这是我对这次会议的第

一个希望。

小城镇研究是一个长期的研究课题。它不仅是社会科学范围内国家“六五”规划中的一个重点课题，而且它在“七五”规划中还将继续研究下去。现在我们在苏南所进行的研究只是这个课题的开始。为了使这项研究不断深入和扩大，我们必须考虑下一步究竟应该怎样走，同时对下一年做出具体的计划，并对“七五”规划的远景做一些设想。这是我对我这次会议的第二个希望。

进行科学研究最忌讳的毛病是一叶障目，坐井观天。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们这一年所进行的小城镇研究无论从深度或广度上看都还很不够。到目前为止，课题组既没有对某一个小城镇作出全面深入的解剖，也没有越出吴江县的范围。这就好比是在显微镜下找到了一个细胞，但尚未看得清楚，更未顾及其他类似的细胞。胡耀邦同志视察西北回来，提出要种草种树开发大西北，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在此之前，确实很少有人想过还有一个大西北可以开发的问题。可见中国之大，不允许我们做井底之蛙。即使以后研究范围扩大到江苏全省，对全国而言，它仍然只是一个点而已。我们要提出江苏在全国、苏州在江苏、吴江在苏州，它们所处的地位怎样的问题来告诫自己不能满足于一孔之见，更不应以点概面。相反，应当提出认识的限度和吴江县小城镇的特殊性和局限性。

然而管中窥豹所见的毕竟是豹的一个部分。吴江县小城镇有它的特殊性，但也有中国小城镇的共性。只要我们真正科

学地解剖这只麻雀，并摆正点与面的位置，恰当处理两者关系，那么，在一定程度上点上的调查也能反映全局的基本面貌。吴江县地处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苏南，我们以吴江小城镇为调查点进行深入分析，或许是触到了小城镇问题的塔尖。所谓塔尖是指吴江县小城镇建设的今天有可能是其他地区发展的明天；现在在这里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将来在别的地方也会碰到。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发生、发展有一个科学的认识，那么对不同地区今后的小城镇建设无疑有指导和参考意义。当然，我们在开始时必须十分警惕，决不要忘记我们只是在解剖一只麻雀，而一只麻雀是不能代表所有麻雀的。

科学的研究要有目的性和计划性。要使小城镇研究深入下去，必须订出一个具体计划。我们要把研究重点继续放在原先的调查点上，一方面对已经触及的问题作进一步探讨，要象调节照相机的焦距那样，使其有更清晰的映像；另一方面应检查前期研究中有哪些缺门，即有哪些问题还没有作调查，要在每一个镇上开拓更多的调查项目。与此同时，可以选择几个不同类型的地区开辟新的调查点，以便于作比较分析，并制订必要的研究指标，为从调查点上的定性分析推向面上的定量分析作准备。

事实上，制定研究计划的过程就是明确研究目的和要求的过程。只有研究目的和要求明确了，计划才能订得具体可行。为此，我们这次会议作了新的尝试。与会者有社会学的研究人员，有其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科研工作者和大专院

校的教育工作者，还特别邀请了在小城镇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有关部门、江苏的省、市、县三级政策研究机构的同志一起来参加讨论。针对同一个研究课题，进行如此广泛的多学科、多系统、多层次的交流和协作，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新的尝试。但愿我们能创立一条成功的经验，有助于我国学术的发展。

这种广泛的结合至少有两点好处：一是能听到更多的不同见解，启迪自己的思想。所谓学术讨论，除发表自己的见解外，就是要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我曾在《读书》杂志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看人看我》，主张我们要认真地看人家怎样看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二是使科学研究与实际要求挂起钩来。以往的理论脱离实际，除了个人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社会组织上的原因。由于科研部门与实际工作部门长期缺乏交流，造成知识分子与实际工作者背对着背。前者愿将知识应用于实践，但不知用武之地在哪里；后者希望以科学知识来指导工作，然而不了解所需知识在何方。现在两者都转过背来，面对着面。实际工作者向科研人员质疑、问难、提要求，使科研目的更明确，计划更合理，成果也更富有实际意义。科研人员向实际工作者介绍成果，提供建议，使实践按客观规律进行，工作具有科学基础。

我的第三点希望就是要对贯彻“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方针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在前一段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当前小城镇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一些大家在认识上比较一致的建议供决策机构参考，起到咨询作用。

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知识，也就是要依据从科学的研究取得正确反映实际的知识，去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问题。要做到这一点，科学的研究和建设工作之间必须建立起畅通的渠道，使得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能提到科研的项目里，经过科学的研究反映出实际情况，再根据政策方针形成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建议，由决策机关审核各种建议，联系有关情况，并考虑可行的时机作出实施的决定。这些决定通过行政机构的执行和群众的实践，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但是一项决定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有待实践的验证，而且旧矛盾的解决又会引起新的矛盾，效果的估计和新问题的产生又将构成新的科研项目。这就是说，由科研、咨询、决策和实践构成一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循环系统，这四个环节环环紧扣，周而复始，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我国的决策者是党的领导机构，通过决策体现党的领导。领导的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上述建设工作循环系统的根本模式。由于现代化的日益深入，建设规模日益扩大，决策过程更显得需要对情况的了解和对问题的分析，所以提出干部要知识化，也就是要把决策过程放在科学的基础上。把科研和咨询作为这个循环系统中的必要环节，实质上就是体现党的群众路线。

把科研和咨询作为上述系统中的必要环节包涵着它们具有和其他有联系的环节相对的独立性。我们党的领导一向遵守实事求是的原则，所以一切政策的制定都要求经过调查研

究。毛主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因此各级领导都有专门从事政策研究的机构，这是党的优良传统。但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反面的教训，那就是在“左”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这些担负反映实际情况责任的研究机构被视作已定政策的辩护者，甚至看作是主管人员个人意志的吹鼓手，走向了科学的反面，“四人帮”的“内查外调”暴露了它的极端危害性。科学知识必须为政治服务。这里所说的服务绝对有别于“四人帮”时的“梁效”对其主子的“效忠”。科学研究要对客观事实负责，即实事求是。

但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不等于消除了可能有的片面性，每一门学科的研究，其片面性都是难以避免的。越是专家，其片面性或许会越大。为了不使决策陷入片面性，在决策和科研之间应当有一个中间环节。这个环节就是综合各个学科对某一事物的认识，进行“会诊”，然后才向决策机构提出若干建议及论证。至于怎样组织这类咨询工作，我们现在还没有经验。我建议不妨作一个试验，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其他有关专家对一定的事关重大的建设问题组成咨询小组。这个咨询小组应当联系群众，联系各个学科，发挥其综合性的特点，向党的领导机构提出建议，反映群众的要求和意见，以备党作决策时参考。

在党的领导依据建议、资料制定决策以后，由行政机构付诸实践。政策在实践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客观事物发生了哪些变化，这又给研究部门提出了新的课题，于是上述过程又重复进行。实践、科研、咨询和决策四个环节的循环往复

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

我们的小城镇研究是一个综合的长期的科研项目。现在它已经吸引了多学科多层次的人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范围的扩展，将会有来自更多方面的同志参加进来。这就需要有一个相应的机构来加强各方的联系，进行组织和协调。所以，我的第四点希望是在这次会议结束时成立一个关于小城镇研究的学术性团体，把现有有志于此的同志组合起来。

由于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在江苏，所以我建议请江苏的同志偏劳，出面来组织这一个团体。至于团体的名称、机构和任务等具体内容，请大家一起来讨论决定。

(二)

小城镇问题，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它是在客观实践的发展中提出来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认识它。记得1981年初我到天津开会，遇见当时在天津市委工作的李定同志，他告诉我，1980年胡耀邦同志到云南视察，看到保山县板桥公社的小集镇破烂不堪，凄凄凉凉。于是就在同年年底的一次会议上，讲到要发展商品经济，小城镇不恢复是不行的。要使农村里面的知识分子不到大城市来，不解决小城镇问题就难以做到。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城市没有小城镇，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可见中央领导早就看到了小城镇问题的意义，要把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的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

可是，据说在传达了耀邦同志上述讲话以后的几个月中，并没有得到该市郊县的积极反应。可见在当时小城镇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许多同志还未认识到小城镇与农村经济之间的关系，还不理解小城镇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怎样的一个概念。这件事表明，在客观事物发展中提出的新问题，要想得到人们的普遍认识并不那么轻而易举。认识过程也有它自身的规律。人们往往要经过自己的直接感受，才能比较深入地认识新事物和新问题。

就我个人而言，我十分赞同耀邦同志的上述提法。那是因为我早年在农村调查时就感觉到了有一种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的存在，这种社会实体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能缺少的联系。我们把这样的社会实体用一个普通的名字加以概括，称之为“小城镇”。

任何事物一旦产生了理论概括，便容易使人忽视事物内部之间的性质差异，只从总体概念上去接受这一事物。小城镇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从笼统的概念出发，就会把所有的小城镇看成是千篇一律的东西，而忽视各个小城镇的个性和特点。因此，小城镇研究的第一步，应当从调查具体的小城镇入手，对这一总体概念作定性的分析，即对不同的小城镇进行分类。下面我谈一谈在吴江县所看到的五种不同类型的小

城镇。

第一种类型的一个镇叫震泽镇。1936年我从清华研究院毕业以后取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当时我的导师史禄国教授建议我先在国内作些实地调查后再出国。我听从他的意见，去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由于自己的失误，负伤出山，回家乡休养。我的姊姊费达生送我到她正在帮助农民开办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的吴江开弦弓村小住。我就在一个多月里调查了这个农村。记得有一天我去村里一家很小的店去买香烟，谁知这小店不卖整包的烟，只能一支支地零卖。店主说若要买整包的烟可去找航船带。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这个村子有三、四百户人家，一千多口人，是江南少见的大村子。可是村内只有三、四个小商店，商品品种极少，规模小到连香烟也要分拆开来零卖。那时，这个村子里的农民生活并不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农民的日常用品从什么地方获得呢？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去观察店主所说的航船。

其实，航船就是普通手摇的有舱的小木船，只因为主要用于人的交通和货物的流通而得名。那时村子里有两条航船，每天早上，在航船摇出村子前，两岸农民们便招呼船老板代为办事。这家提个瓶子托买酱油；那家递上竹篮托他捎回点其他日用物品，船老板一一应接，把空瓶、竹篮等放在船上，航船便离村出发了。航船的目的地就是离村子有十二华里的震泽镇。当航船来到震泽时，守候在岸边的商店学徒们一拥而上，抢着来做各种生意。船老板自己便到茶馆落座喝茶。到下午，商店学徒们把装着物品的瓶、篮又送回船上，

航船离镇返村。航船就这样每天在震泽与村子之间往返，村子里要去镇上的人都可以搭乘这条船。奇怪的是托捎物品的和搭乘的人都不用付钱。追问船老板的生活来源，才知道，原来在春秋两季，村内农户出售蚕丝和粮食都要通过航船卖到震泽镇上去，震泽镇上的丝行和米行在年终时就得给船老板一定的佣金，那些酱园和杂货店逢年逢节也要给船老板一定的报酬。所以船老板的收入是不少的。他们是农村货物流通的经纪人，是农村经济活动中的重要角色。后来我也“免费”搭乘航船往来震泽，发现震泽镇的市河里停靠的航船有二、三百条，据说都是来自镇周围各村。震泽显然是附近这些农村的商品流通中心。

我在这里追述当年的观察，是想说明震泽镇是以农副产品和工业品集散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中心，是一个商品流通的中转站。农民将农业产品运到震泽出售，又从震泽买回所需的日用工业品。对于镇周围的农民生活来说，震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经济中心。而航船主、学徒以及米行、丝行、酱园、杂货店等商店的老板则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商品流通组织。震泽通过航船与其周围一定区域的农村连成了一片。到震泽来的几百条航船有或长或短的航线。这几百条航线的一头都落在震泽镇这一点上，另一头则牵着周围一片农村。当地人把这一片滋养着震泽镇同时又受到震泽镇反哺的农村称之为“乡脚”。没有乡脚，镇的经济就会因营养无源而枯竭；没有镇，乡脚经济也就会因流通阻塞而僵死。两者之间的关系好比是细胞核与细胞质，相辅相成，结合成为同一个

细胞体。

由此可见，小城镇作为农村经济中心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有具体的实际内容。在半个世纪前，震泽镇作为商品集散类型的小城镇对我是有吸引力的。但那时我是单枪匹马搞调查，研究工作不能不以村为界，没有能力进入镇的这一层次去。我只是在村子里遥望到了小城镇，感觉到了小城镇这种社区的存在对于农村所发生的影响。此后，我总希望有一天能进入小城镇作些调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出于我的预料，在1981年真的有机会实现了这个愿望。

第二种类型的一个镇是盛泽镇。盛泽镇现在是吴江县人口最多、工业产值最高的一个小城镇。这个镇出口的真丝绸占全国真丝绸出口量的十分之一，可见它是一个丝织工业的中心，是具有专门化工业的小城镇。

盛泽镇的历史发展较早，据说它在明末就有上万人口。那么这个镇发展较早的基础是什么？镇上聚居的人口又是以什么为业的呢？我记得小时候去盛泽时，看到有人站在织机上提花，觉得很新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2年再去盛泽时，就询问解放前丝织作坊的情况。有人告诉我，那时在镇上的作坊为数不多，且都是小规模的，最大的一家也只有二十部老式织机，但是绸庄、丝行和米行却不少，其中又以绸庄为最多。既然镇本身织出的绸并不多，绸庄的绸又从何而来呢？这就使我看到了盛泽与震泽不同的特点。绸庄通过“绸领头”收购农村织绸户的绸匹。“绸领头”是织绸户和绸庄的中介人。他们发放贷款给织绸户，要织绸户按照绸庄需

要的花色品种进行生产。“绸领头”将收购到的绸匹再分类售给绸庄。这样，一个绸庄通过“绸领头”的联系，就可以掌握几十、几百甚至成千的织绸户的生产。如果绸庄把如此众多的织机集中到镇上来办作坊，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了。所以，盛泽与震泽的不同就在于它不是农副产品的集散中心，而是农村家庭手工业产品的集散中心。象盛泽镇那样早先是以手工业产品的集散为主的经济中心，是很值得研究的。

家庭丝织手工业不仅是盛泽发展的基础，也是所谓天堂的苏杭地区发展的基础。这个传统基础对于我们今天的小城镇建设仍然具有它的意义，因为这传统在民间已有近千年。如此悠久的历史使它深入到每一个人，甚至进入遗传基因，成为生物基础。一位外国朋友听我说到苏州姑娘纤巧灵活的手，便提出妇女的这种技能是否可以转向搞电子工业的问题。因为电子工业需要的正是精细准确的动作。外国人都注意到了我们的历史传统，我们自己要是不研究、不利用，那就愧对祖先，是说不过去的。

第三种类型的一个镇是我的出生地松陵镇。松陵在解放前后都是吴江县的政治中心，现在吴江县政府就设在松陵镇上。解放以来吴江县其他原有的小镇都处于停滞和萧条状态，唯独松陵是例外，它的人口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比解放初有较大的增长。

松陵设县由来已久。封建时代地主统治阶级为防卫农民造反起义，筑起城墙和城门将城内外隔开，在城里连集市买

卖也不准做，人们只得在大东门外的盛家库做交易。城里主要是专政中心的衙门和城隍庙这阴阳两大权力机构。人活着时由县衙门管，衙门旁边是监狱和刑场；据说人死后由城隍庙管，有牛头马面、阴曹地府。城内的住户主要是地主大户和服务于他们的各种小人物。这里的建筑也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弄堂狭小，两边是数丈高的风火墙，地主们住在里面，带有统治和防卫的特征，颇有点欧洲中世纪城堡的风格。

第四种类型的一个镇是同里镇。同里是我姐姐的出生地，我家在搬到松陵以前就住在那里。同里距运河边上的松陵只有六公里，距离自苏州到上海的水路要冲屯村镇五公里半。同里镇本身四面环水，似乎是一片藏于水泽中的岛屿。它的周围地区河塘交叉、漾湖衔接，是典型的湖沼水乡。解放前的同里不通公路，只靠摇小船进出。对于不熟悉水道的陌生人来说，往往在水面上转悠半天也找不到进出的河道。正由于同里处于交通闭塞的地理位置，具有不同于一般的水乡地貌，它就被地主阶级、封建官僚选中作为他们的避难所和安乐窝。解放前，这个小镇上集居着大量的地主和退休官僚。据土改时统计，全镇2,000户人家中有500多户地主，占四分之一。地主阶级找到同里这个安全岛，修起了与苏州名园可以媲美的园林，现今正在修复的“退思园”只是其中之一。有名的评弹珍珠塔的故事，据说就发生在这个镇上。同里过去可以说是一个消费、享乐型的小城镇，现在正在改造成一个水乡景色的游览区，已经成为文化重点保护区之一。

第五种类型的一个镇是平望镇。平望镇地处江浙之间，

北通苏州，南通杭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它屡遭兵燹。自古代的吴越之战，到近代军阀之间的江浙战争，战场都是在平望一带。日本侵华时，它又几乎被夷为平地。近年来，平望已成为水陆交通干线的交叉点。历史上有名的大运河经过平望，沟通苏州和杭州。有公路东达上海、南通浙江、西联南京和安徽，成为吴江县内最大的交通枢纽。

平望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使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易遭战争攻击和破坏，因此在解放前曾经几度由兴而衰，一直未能稳固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由于交通发达，物资流畅，具有发展经济的优越条件，使它常能衰而复兴。解放后，战争的威胁消除了。党的三中全会后，“左”的干扰被排除，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它争得了成为大城市工业扩散点的地位。据说，上海的一些工厂在扩散过程中，开始也找过铜罗等几个镇，但是最后还是在平望落脚。平望就这样一下子冒了出来，成为近来吴江各镇中发展得最快的一个小城镇。

必须指出，上面列举的五种不同类型的小城镇，只是小城镇定性分析中分类工作的尝试。分类的对象只限于在吴江县初步走访过的镇，调查深入后，很可能还有应当提出的另一些类型，比如以渔业为主的社区，尽管人口较少，也可以因它的特点而成为一个类型。至于在吴江县之外全国各地的小城镇无疑还有许多各有特点的类型，比如以采矿为主的城镇等等。而且有些地方的商品流通还处于形成固定城镇的过程中，只有一些具有日中为市性质的集、墟、场、街等场所。这些都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所以这里所提出的类型是

既不完全也不齐备的。

还应说明，提出类型的目的，是为了突出这些城镇的特点，使我们对小城镇的概念不至于停在一般化的笼统概念上，而要注意到各个小城镇的个性和特点，但在突出特点的同时，自然不应当忽视小城镇所具有的共同性质。小城镇的共同性质，正如胡耀邦同志所指出的，它是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小城镇的分类是以此共同性质为基础而就其不同的侧重点进行的。比如，松陵镇固然具有全县政治中心的特点，但同时也是附近农村的经济、文化的中心。震泽镇固然是吴江县西南一片包括若干乡的商品集散中心，但同时也是乡一级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近年来已成为小型社队工业的中心。盛泽镇固然是当前地方丝绸工业的中心，但同时也是附近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上述某镇具有某种特点，只是指它在小城镇所共有的许多职能中所表现的突出方面。

通过这样的分类，我们注意到各个城镇有它的特点，而且这些特点是由各镇的历史形成的，因此在建设这些城镇时不应当一般对待。比如前面说的同里镇，它原来是地主阶级和退休官僚聚居的地方。土改后，它原来的经济基础已被摧毁，要建设这个镇，显然不能走平望的道路，因为它不在交通要道上；也不可能走盛泽的道路，因为它没有传统的工业。但是它却有幽美的园林，有水乡特色的建筑和河道。这是一个前人从经验中选择出来的退休养老的好地方。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它建设成为一个休养和游览的园林化城镇呢？加

拿大有维多利亚城，我们也可以有一个足以同它媲美的同里镇。这就是说以小城镇的特点来分类，对于我们确定小城镇发展的方向是有用处的。

(三)

吴江县的小城镇在解放后发生的变化，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分界线是在七十年代初期。七十年代以前是小城镇的衰落和萧条时期，在此期间，小城镇逐步失去它赖以生存的基础；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小城镇有了转机，到了后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呈现出发展、繁荣的景象。

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吴江小城镇的人口一直处于停滞甚至下降状态，与吴江县人口的迅速增长相比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以盛泽镇为例，它还不是人口下降最多的镇，五十年代初就有22,000人。其后二十年中，人口总数持续下降，近年才有转机，到1981年才达到26,000人。22,000的人口基数，以全国平均的自然增长率来计算，至今应该有四万余人口。所以，我一听到这些数字，就说其中“大有文章”。什么文章现在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正在继续调查研究。这里让我们先看看吴江最南端的铜罗镇的人口变化概况。铜罗在解放前叫严墓，镇的类型与震泽相似，以烧酒和肥猪出名。全镇1952年有2,475人，1962年有2,488人，1972年是1,900人^①，1982年人口普查时城镇户口人数为2,007人，三十年

① 1972年人口未统计，这个数字是由前后三年的人口数推算得来的。

来城镇人口下降19%。据初步调查，1951年土改时为了分得土地，有60户老家在乡下的小店铺关了门，约150人回乡务农。同年还有一、二十名青年参军赴朝，其中只有个别人后来回镇。从1952年到1957年，特别是在1956年的“对私改造”期间，又有约200人离镇外出。这批人大多是做生意的业主和学徒，其中有文化的进入附近大、中城市的国营企业，有技术的则流入上海郊区和浙江的一些县城。据反映，当时他们觉得私人经营生意是一种剥削行为，连在私人店里当工人也不光彩，所以大家要另谋出路。1958年的大办农业和支援农业，以及1963～1964年的职工下放，镇上又减少了近五十户居民。除了上述的人口外流，还有青年学生考入大、中专学校，外省市招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也使镇上人口有所减少（其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绝大部分后来已回镇）。

象铜罗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小城镇也程度不同的发生过。人口下降是小城镇衰落的表现之一。那么小城镇衰落的原因何在？其后果又如何呢？

1957年合作化高潮时，我去江村作过一次调查，即所谓“重访江村”。农民的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改善，但是传统家庭副业已经衰落。农民对我说：肚子可以吃饱了，就是手头没有现钱。由于执行“以粮为纲”的方针，其后的近二十年只重视粮食生产的发展，农村的商品经济长期没有恢复。直到七十年代初期，由于社队工业的兴起才使情况有所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了多种经营的方针，农村才开始走上繁荣。1981年我三访江村，老熟人不再发牢骚

了。他们同我谈的都是卖兔毛有多少收入，以及要求我帮助社队工厂推销产品一类的话。当时农民不仅能吃上三顿干饭，而且手上也开始有钱买东西了。因为他们集体的和家庭的副业发展了，社队又办了工厂，农村里有东西能卖出来，换到钞票，可以到市场上去买他们生活上需要的用品了。吃饱、穿暖、有钱花是农民生活改善和农村经济繁荣的具体内容。

把这两次在江村看到的情况与铜罗镇的人口变化联系起来，可以看到小城镇衰落的原因和后果。从农村方面看，由于“以粮为纲”，搞单一经济，取消商品生产，农民不再有商品到镇上来出售，小城镇自然也就失去了作为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的经济基础。从小城镇方面看，由于提出变消费城为生产城，搞商业国营化，集体和个人经商受到限制和打击，居民无以为业，不得不到处找活路，小城镇留不住居民，人口下降。总之由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出发的“左”的政策，是造成小城镇衰落的根本原因。小城镇越衰落，作为它的乡脚的附近农村发展农副业商品生产的阻力就越大；反过来，农村商品经济水平愈低，作为其中心的小城镇的衰落就愈益加剧。所以农村与小城镇间经济上的恶性循环是小城镇衰落的必然结果。当然，上述因果关系还有待于用客观事实有系统地全面加以检验。

下面我只谈一点有关商业渠道的问题。解放前，农村和城镇的商品除了食盐外全由私营的商人经营。解放后实行了统购统销，农村里所生产的粮食、油料、生猪、蚕茧等主要农副产品以及若干种生产资料都纳入了国营商业的流通渠

道。各级行政部门都设立粮食、副食品、进出口贸易等机构，县级成立公司，县以下设所或设站。这样的商业改革使那些没有设置行政机构的小城镇失去了与周围农村的主要联系。但1958年以前，小城镇的商业除了国营商业这一渠道，还有集体性质的供销社，联营合作商店以及个体户等多种渠道。自从公社化以后一直到文革期间，个体商业和集市贸易不断受到打击，连农民提个篮子在镇上卖几只鸡蛋也要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联营的合作商业被“利用、限制和改造”，不能不向国营商业和供销社靠拢，以致有的镇最后只剩下几家供应开水的茶馆和点心店。而原先由农民集资起家，属于集体性质的供销社则逐步国营化，变成全民所有制。最后，几乎一切商品都按行政区划上拨下调，在国营商业这一条渠道内流通。

商业渠道的统一国营化引起了小城镇的巨大变化。凡是设置行政机构的小城镇，都有国营的流通渠道，在收购农副产品的以及调拨分配农民所需物资上占绝对优势，这就使得作为全县行政领导和物资批转中心的县城松陵镇成了吴江小城镇普遍衰落的一个例外，它的城镇人口因机构增多、干部调入而一度相持不动，后来还略有上升。一些设置公社机构的小城镇在总的衰落趋势中借着国营商业和供销社之力得到挣扎余地，而那些没有设置行政机构的小城镇受到被淘汰的压力就相当严重。在庙港公社的区域里，原先还有陆港、更缕港和罗港等几个小镇，解放前它们和庙港一样都是太湖东南岸边商业性的渔港。据说，陆港商业全盛时有五十户人家做生

意，集镇规模虽不及庙港，但它的乡脚范围与庙港相仿，也有五、六华里地。更缕港则更小一些，只有近二十个“连家店”^①。解放后，庙港镇先后设置区政府和公社机构；陆港、更缕港变成庙港下属的乡和大队，只有基层政权组织而无相应的一套行政机构。从1956年开始，这两个小镇的商业逐步被庙港吞并，商业人员大都并入公社的商业机构。到文革后期，更缕港集镇完全被吃掉，人去集空，只留下冷落的石板街和残破的店铺面，退化为农村的居民点。陆港商业虽然也被蚕食去大部分，但它地处庙港与七都两个公社交接处，原属于陆港乡脚的村子离公社较远，主要是凭借了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镇上留下了两个商业门市部和一家茶馆，三十几名商业人员在那里顽强地撑着小集镇的地位。

从全县范围来看，没有设置行政机构的小城镇大多数被吞掉了，象陆港那样已吞未咽下的是极少数。这个吞并过程值得进一步记录下来加以分析。

用行政渠道来控制商品的流通，势必造成农民买难卖难的困境，而商业本身在经营上也容易滋长“官商”作风。据农民反映，收购农产品的部门要货时急如星火，不要时弃如敝帚。比如兔毛，去年由于某种原因价格大跌，养兔的农民叫苦连天，也不明白为什么同样的兔毛一下子就不值钱了。小城镇和农村里原有众多的流通渠道已变成了单轨，适应不了这几年来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实际上已成了农村

① 解放前农村小集镇的店铺中有一种前门开店，后屋住家属的叫做连家店。

经济继续发展的障碍。

商业国营化的过程是在“化消费城为生产城”的政策下进行的。这一政策对于我国的城市建设固然有其积极作用，但由于当时对消费和生产这两个概念的涵义没有搞清楚，以致我们对小城镇性质的认识发生了偏差。在我国旧的传统思想中，消费不是一件好事情，它是指不事生产，靠着人家吃吃花花，实际就是指剥削享受。而在小农经济的眼光里，生产是指有实物收获的劳动，不包括商品的流通。这样我们一方面把小城镇的商品流通职能排斥在生产范围之外，归入消费中去；另一方面把地主官僚对农民和雇工的剥削，以及他们挥霍浪费的行为，看成所有小城镇唯一的基本性质。以后又进而把做生意、消费、剥削这些概念都划上等号。表现出来的是逐步限制、打击小城镇的个体和集体商业，这就大大削弱了小城镇作为农村地区商品集散中心的地位。然而城乡的工农业产品不能不流通，而流通总得有渠道。在集体、个体等贸易渠道全都被堵死的情况下，供销社非走向国营化不可，国营商业就不能不包揽一切。但是国营商业固然可以用行政手段把商品流通包下来，却包不下小城镇上原有的经商劳动者，于是小城镇居民中很多人无以为业，纷纷找出路。其中最有办法的人挤入了上海、苏州等大中城市；稍次的进入当地的国营企业；没有办法的也不让在镇上吃“闲饭”，一批批地被动员下放到农村。最后那些由于病残体弱等原因确实无法下乡的人留了下来，依靠社会福利型的小手工业生产维持生活。这一过程，在铜罗镇的人口变化中看得很清楚。

它表明在经济基础动摇以后，小城镇作为人口的蓄水池也就干涸了。无以为业的人口是留蓄不住的，不能不向大城市和农村两面泄放，小城镇本身日见萧条冷落。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三点情况：第一点是在这一时期小城镇衰落的总趋势中，吴江县也有新兴的例子。菀坪和金家坝这两个公社集镇是由村居民点上升形成的，它们都是设立新的公社行政机构产生的结果。第二点是从五十年代后期起，吴江的县办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例如盛泽镇上的丝绸工业从作坊手工业到机器工业，一直到专业化的若干道工序配合的现代丝绸工业。但是这些县属工业在经济、管理等方面都隶属于县的工业部门，它与小城镇可以说没有多少实际联系。第三点是有少数小城镇的衰落是由于自然灾害、地理发生显著变化等多种因素引起的。如松陵西南五公里处的南厍，以前是吴江西北部地区出入太湖的主要港口镇，每天有三、四百条渔船和捞水草的农家船停靠南厍，商业兴旺。1949年太湖发大水，南厍的店铺被洪水席卷。公社化以后围湖造田，南厍失去濒临太湖的港口地位，再加上行政设置的变化，南厍集镇也就退化消失了。

(四)

由于看到小城镇周围农村生产的单一化和镇本身商品流通职能的丧失导致小城镇的衰落，在1981年又看到农民家庭副业的兴旺和听说那几年吴江小城镇建设也在繁荣起来的情况，我曾产生过一种错觉，以为是农副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促

使小城镇的复苏。后来经过实地调查，才发现吴江小城镇兴盛的主要和直接的原因是社队工业的迅速发展，而不能说是多种经营、商品流通的结果。

以与上海郊区接壤的莘塔公社集镇为例，在1975年以前，莘塔公社的农业经济路子越走越窄，农业只是种粮食，副业只是养猪。农民收入长期在人均150元上下徘徊。从公社镇来看，不用说新的基建，就连原有民用建筑的维修也缺乏资金来源。居民住宅日渐破败，危险房屋越来越多。镇区内两条宽只有三米的过街楼式的沿河小街狭小敝陋。自1975年以来，该镇面貌大变。现在已盖起了许多新的厂房、居民职工住宅和一座能容纳1,000多人的电影院，马路宽达18米的新街区颇有现代气派。这些基建的总投资共达356.8万元，其中有258.1万元来自莘塔13家社办工厂所上交给公社的利润，占总投资的72%以上。

莘塔的社办工厂原只有公社农具厂（现为油泵厂）一家，是在大跃进年代办起来的，其他的工厂都是在1975年前后创办的。据1982年资料，这些社办厂中，年总产值超过百万元的有油泵厂、灯泡厂和客车厂三家。若把全社的队办企业也统计在内，社队工业共有57个企业，务工社员2,098人，占全公社劳动力的17%。全年总产值1,026万元，利润66万元，其中上交给国家的所得税12万元。以务工社员工资和参加年终分配利润这两项计算，全公社20,000余人人均工业收入为49元，占年人均总收入的15%。

从农副工三业产值结构和分配结构来看，莘塔公社总产

值中农业占33%，副业占13%，工业为54%。在社员人均分配水平327元中，农业收入为190元，工业收入为49元，社员家庭副业收入是88元①。

这一例子告诉我们，莘塔在七十年代中期开办社队工业以后，改变了农村一段时期“以粮为纲”单一经济的局面。社队工业的发展为镇的基本建设提供了主要的资金来源，增加了农民的年终收入，而且吸收了接近五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

从莘塔看到的基本情况在吴江县乃至整个苏南地区是普遍存在的。各个公社在介绍社队工业的好处时，都集中在吸收劳力、增加收入和发展公社集镇建设这三个方面。为什么苏南地区的社队工业在七十年代能得以发展、遍地开花呢？对此不能不从该地区的歷史传统和特定的社会条件去作考察。

苏南地区的历史传统可以加以概括为人多地少、农工相辅。江浙一带，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已有悠久的历史，人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人口密度越大，人均耕地必然减少，所以在农业社会里，在一定的范围内，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是相矛盾的。然而我们的祖先却闯出了一条路子，使人口稠密与经济发达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那就是男耕女织、相辅相成。这种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一直持续了几千年。我三十年代在江村调查时，还曾看到农户的收入是工农相辅，一半对一半。人多地少，要富起来，不能完全靠种庄稼，在粮食作物之外要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并从事农产品加工性的家庭手工业。这就是农工相辅这一历史传统的本质。

① 社员家庭副业是根据供销社收购系统的数据所作的测算。

这个道理在现代人眼里看来很简单，可古人开出这条路子时的艰辛是今世无法想象的；而这条路子作为一个根基开出新的花来也是古人始所未料的。因此，依我看来，现在所谓离土不离乡、遍地开花的社队小工业就植根于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地少人多，农工相辅是社队工业发展的内因。

在这几年的农村调查中，凡是我所接触到的基层干部，只要一谈到人口，都说有一股压力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当解放初期出生的那批人口在六十年代中期进入劳动年龄时，农村就开始出现窝工现象。此后劳动力增长的速度逐年上升，年工分量猛涨起来。而同期粮食产量的增长却越来越少。到1970年前后，平均亩产显示出已达到极限时的起伏波动。这时农村已不是一般的窝工，而是由于劳力的剩余，农民开始在那里抢工分了。我曾请一位县委书记算一笔帐，假定现有的劳动生产率不提高，现有的粮食产量不降低，全县可以有多少剩余劳动力？他的计算结果是在三分之一到一半之间。如此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是一股无法长期压抑下去的力量，一旦有了某种条件，它就会冲出来解放自己。正如当地同志所说的那样，办社队工业是“逼上梁山”，是将压力化为动力。

人多地少只是一股内在的动力，农工相辅的实现还需要外在因素的触发。社队工业兴起的外在因素就是“文化革命”这一特定的社会条件。十年动乱，全国遭劫难，然而在吴江、在苏南的农村，在一定意义上却可以说因祸得福。社队工业正在这时狭处逢生，发展了起来，所以有人说社队工

业是“乱世出英雄”。对此我起初颇觉意外，后来听了一些社队工厂的开办发展史，才了解到大城市里动刀动枪地打派仗，干部、知识青年下放插队这两件使城里人或许到现在还要做恶梦的事情，从另一面来看，却成了农村小型工业兴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办工业要有原料、劳力、资金设备、技术和产品市场。农村有足够的劳力，这是有利的条件。那么其他几个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呢？

铜罗镇有一家生产化工产品的工厂可以说真正是白手起家的。1968年，一个城市青年插队到吴江的一个公社。这个青年的父亲在化工厂工作，他打听到某一化工产品因为职工派性纠葛而濒于停产，而这一产品又是另一个企业的必需品。于是他就帮助这个公社与需要这一产品的企业挂上钩，这一企业把原料、技术、设备甚至一部分资金全都包了下来。就这样，农民便在几亩地上办起了化工厂。类似这家工厂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社队工厂的同志说，那时的办厂条件多数是大中城市主动送下来的。

大中城市为什么要主动送下条件来让社队办厂呢？道理很简单，“文革”中城市里的大中企业有不少在打派仗，搞停工闹革命，没有稳定的局面，自然不可能进行正常的生产。但社会生活不能没有商品。尤其是一些外贸产品的生产还得完成计划。而相比之下，农村的局面要比城市稳定。于是城市里不能生产，就转移到乡下去。那么，由谁来牵线转移？从吴江的实际情况来看，主要是那些家在农村的退休工

人以及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干部，尽管目的各不相同，但他们实际上却成了城乡经济的中介人，做了一件自己不一定意识到其意义的事。社队工业就是在社会需要大于社会生产，农村局势相对稳定，而且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有了中介人作联系的条件下产生出来的。等到十年内乱结束，苏南的社队工业已渡过了最关键的初创时期，进入了它的发展阶段。

工业发展不同于农业，它必须要有一个集中的地方。这个地点一要交通便利；二是对来自各个村庄的务工社员来说地理位置适中。这两个要求使社队工业找到了正在衰落的小城镇。在吴江县可以看到，凡是公社集镇都是社队工厂最集中的地方。在县属镇，由于镇、社体制分设，社队工业不能侵犯镇区，于是就傍着老镇，在外围形成一个社队工业区。

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到在吴江县的七个县属镇内还存在着另外两种工业：一种是县属工业（包括全民或集体），另一种是镇办工业。县属工业的发展较早，一般是在五十年代开办的。它对保住小城镇一部分人口和为附近农民提供就业机会是起了作用的，而且近年来这部分工业也出现了新的飞跃。然而县属工业与它所在的镇之间没有发生经济上的联系，它只对国家和县交纳税收和上交利润。所谓镇办工业在1966年以前大都属于社会福利型的集体小手工业组织，实际上是残留在镇上的剩余劳力进行生产自救的组织。由于在“文化革命”期间，各级行政有需要自己找财源，“分灶吃饭”，灶灶要自己生火，镇这一级也得找各种门路办工厂。于是镇办工业就在集体手工业基础上与社队工业同

时发展起来，现在也达到相当的规模。

“文化革命”的后期，从县、镇到公社、大队，各级都在那里积极办工业。甚至连学校也要办工业。震泽中学是吴江有名的重点中学，出了人才。这份功劳部分要归到“六神丸”的瓶塞子上，这不是虚言。不搞校办工厂生产瓶塞，这个中学的校长就难以当家。学校添置设备，修理校舍，都要校长筹集经费，校长又到哪儿去要呢？培养我们子弟的教育经费如此不足，要由学校自己办工业来弥补。我听了以后，总觉得心中有一股压抑。由此我也明白了为什么从公社主任、镇长到县长对办工业这样积极。1978年以前，吴江县解放三十年只铺了三公里的县级公路，十年铺一公里。没有经费搞建设，他怎能不办工业！所以尽管当时条条框框还很多，但各级自有办法，各显神通争财源。社队工业如同鸭子凫水，下面已经动了起来。等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开了捆住的手脚，社队工业和其他各种小工业就如雨后春笋一下子生长了起来，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

由此看来，苏南这些年来小城镇的复苏和繁荣，是小型工业，特别是社队工业带动的结果，而集体商业的经济活动还没有真正活动起来。我们作科学的研究，不能笼统地说什么小城镇繁荣发展了，而要看小城镇里繁荣发展的是什么东西；它的这种发展又给小城镇与农村之间的联系带来哪些新情况、新问题。所以，我想从上述的变化出发回到点与面的关系上，提出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谈一谈对小城镇现有工业、商业、服务业的认识，来共同探讨怎样才能使小城镇真

正成为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个基本问题。

(五)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通过调整改革，大中城市的工业生产逐步走上了正轨。在这种形势下，人们对于社队工业有两种估计：一种看法是社队工业发展是钻了城市工业停滞的空子，所以城市工业的发展严重威胁社队工业的生存，前途并不乐观。另一种看法认为城市工业与社队工业不但不相克，而且是相辅相成，因此对社队工业的前途不必悲观。这两种估计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怎样认识、处理城市工业与社队工业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在发展中提出来的课题，我们应当用发展的眼光去深入全面地作研究。

目前社队工业的确存在不少问题，而对这些问题起制约作用的是社队工业生产不稳定。我所见的不少工厂很多是二、三年换一块厂牌，一、二年转一个产品，人们叫它“开关厂”。这样做固然有作为新厂可以免税的奥秘在内，但根本上还是缺乏稳定性。

我们不能满足于市场调节稳定性差这种回答，而应当从社队工业的实践中，去解决在社会主义原则下的市场调节怎样能够达到企业稳步发展的问题。首先不能一般化地对待社队工业，而应当从具体事实出发去分析社队工业里不同的类型。下面先列举一些我们见到的不同类型的社队办厂。

吴江县社队工业里有不少是丝织厂。办丝织厂抓住了当地农村具有丝绸手工业传统的特点，而且它作为劳动密集型

工业，利润较高。照理说这种工厂是应该稳定的。然而绝大多数社队丝织厂的原料不是蚕丝，而是化学纤维。在七十年代，化纤产品是热门货，只要能生产，不愁无销路。但随着大城市化纤工业的发展和人们对衣着需求的改变，这两年来吴江县社队丝织厂的产品市场离本地越来越远，采购员采取了你占城市我下乡，你在平原我上山的办法，一直把产品销往福建、安徽、青海等省。尽管如此，去年化纤织品降价，损失还是不小。

庙港有一家蔬菜加工厂是在1980年创办起来的，共有三十多名固定工人，生产各种酱菜，主要是小黄瓜和大头菜。这个厂的原料都是本公社农民自己种的，1982年它向全社收购蔬菜总值达110万元，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工厂本身年利润最高达15万元。它的产品有半成品和成品两类。半成品销往山西，成品除当地自销外还销上海、苏州和由外贸出口远销南洋各地。

平望现在有上海缝纫机三厂的一个分厂，它是1981年6月由上海缝纫机三厂和吴江县农机厂联合投资、共同筹建的。总厂与分厂两家联合生产蜜蜂牌家用缝纫机。分厂虽不是社队工厂，但它一方面为总厂提供一部分机头零件并组装整机；另一方面则和梅堰、震泽、金家坝的几家社办厂协作，为上海总厂及其本身生产机架铸件和台板。这几家社办厂的原材料由上海供应，产品归上海接受，按照总厂的计划组织生产。分厂的原材料也来自上海，技术由上海派人指导。分厂所获利润和超产部分，与总厂对半分成。

上面三种社队工厂有可能是吴江现有社队工业的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类是原料和市场都不在当地农村，只是利用当地劳力的工业。在目前社队工业技术水平还较低、在品种式样受到资金匮乏制约、商情信息基本上还靠当面碰头交流的条件下，这类社队工业忽起忽落不能稳定是必然的。第二类是原料来自当地农村，市场也比较可靠的工业，这类工业实际上是当地农副产品的加工工业。农副产品与工业原料衔接起来，是社队工业中最稳定的一类。第三类工业的原料来源和第一类相同，并不是本地自产，但由大工厂供应，市场也是大工厂承包，它是城市大工业的扩散点，相当于大工厂的一个附属车间，所以它只要能维持住与大工厂的关系也是相当稳定的。

从吴江全县来看，第一类工厂占绝大多数，第二类工厂是少数，第三类工厂只有几家。因而从总体来看，全县社队工厂还是处于不稳定阶段。

对社队工业作出上述分类，是为了说明在基本上属于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发展社队工业，必须根据农村地区的特点去确定能够发挥自己优势的工业方向，才能保持稳定性。因此我认为应当把工业的重心转移到第二类上去，要大力发展食品工业和具有地方特色的轻纺工业或手工业。这是基于我对社队工业应当有原料和市场的主动权才能稳步发展的认识。当然哪些原料适宜由社队工业去加工，它掌握主动权的比例应有多大等问题尚需进一步具体化。但农村工业的原料与农副产品衔接起来进行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生产，以地方特色拓

宽国内与国际市场，这些无疑是社队工业选择发展方向时应该遵循的普遍原则。第一类工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送上门来的，而现在却要到处磕头找原料和市场。这说明它作为农村工业的先导任务已经完成。这类工业将来是否会有新的出路，那要看整个国家工业怎样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工业体系以后才能预测。第三类工业看来是有前途的。从世界范围看，大城市工业扩散是一个趋势。大城市人口密集、土地贵、工资高、污染严重等，已使它的工厂不能再继续发展下去。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已向郊区和附近农村扩散，现在甚至扩散到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去了。这种工业扩散曾引起严重的污染扩散的后果。但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这种恶果是可以避免的。而且我曾说过我们应当提倡“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要求大中城市的工业帮助、促进农村社队工业的发展，社队工业也可以帮助更小集体工业的发展。最近我看到江都宜陵的一份调查报告，说那里的社队办的蜂乳加工厂，把装蜂乳的玻璃管、包装盒等零件分到各个生产队去制造，使得这个公社的许多生产队都得到好处。这不是“小鱼帮了虾米”么？所以工业要打破大而全、小而全，要一层一层地扩散下去。但是大中企业不应当把污染也扩散给还不怎么懂得污染危害的农民，而是把就业机会和工业利润扩散出去，这样它自己可以集中精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改善经营管理以增加本身利润。这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体现。

工业要打破大而全，不仅是形式问题。工业规模越大，

越能趋向合理化，这是外国的经验。我们不该不假思索地把它硬搬过来。我们首先要考虑到怎样在发展工业中解决广大农村中居民的生活问题，我们不应当重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农村破产的老路。其次，要考虑到我们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必须适合我国当前的国情。毋庸讳言，我们对大企业的经营管理还缺乏经验，以致一些大的国营企业不能赚钱甚至长期亏损。现在有的社队工业想稍稍扩大点规模，结果他们自己说是“骑上了马背下不来”。因此我认为应当注意研究社队工业的规模和适应当前农民水平的经营管理方式，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实践培养出一大批能管理工业生产的基层干部，为我国工业进一步大发展创造人的条件。

社队工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有个队办工厂赔了钱，我问他们怎么办？回答是赔钱还得搞，这是因为工厂看来是赔了钱，但是生产队每一家都有人在厂里做工，挣得工资，所以不允许关厂，而宁可少拿一点工资。因而我想到这些社队工业有点象是传统家庭手工业的扩大和集体化。家庭手工业是不计工资、只算收入的。所以从社队工业来说是赔了些钱，但如果把工人们的工资算进去，对全生产队的农民来说，还是增加了收入。赔钱还要办下去，体现了社队工业的坚韧性和顽强的生命力。这种坚韧性来自于传统，来自于人多地少的现实。这种顽强的生命力使它在不稳定中还要坚持生存下去。

赔钱还要办；一家出一个工人，机会均等；凡此种种，看起来都与现代工业讲求效率、利润、择优挑选人员等经

营原则相背离。要实现工业现代化，这些是应当改进的。但是，这些现象自有它发生的社会原因。人多地少和工农相辅的基本情况不改变，这种现象也不易改变。我们应当因势利导，转变它的落后性为开创新工业服务。日本企业家引为自豪的所谓 Z 式管理，无非是利用传统的“我照顾你一辈子，你得终生为我服务”的从属关系作为经营管理中发挥劳动效率的有效方式，而我们农村中人际关系的传统要广泛深刻得多。当然其间良莠不齐，应该对它们加以分析和考察，作出区别，弄清哪些东西可以利用和利用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应以虚无主义的态度看过去，要真正懂得中国的特点，并根据这些特点来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研究可以生长出新东西来的旧事物，甚至要用旧形式来发展新事物，最终使旧的转化为新的。

社队工业的发展使一部分农民转化为工人，县办和镇办工业的发展也招收了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这就是说现在已经有不少农民到小城镇里来了。据调查，这五、六年来，小城镇的实际聚居人口与户口在册的人口相比，普遍增加了三分之一。因此，人口普查所得的小城镇人口数与实际情形差得很远。这些农民工到了镇上与镇上工人一样干活，甚至那些条件最差、最累、最重的活往往是由他们来承担，他们实际上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新成员。这批人数目相当大，据不完全统计，1982年江苏全省的务工社员人数达到527万人，而全省城镇户口的劳动力总数只有606万人。换句话说，在大、中城市及小城镇从事各种非农业工作的人数中，农民工与城镇户

口的工人在数量上已相当接近。农民工挑着小城镇工业三分之一的担子，应当深入考察这批人走出村子到小城镇上做工的全过程，研究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工作、思想感情。这是中国工业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新情况。

在实地调查中，时时可以觉察到有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在驱使那些基层干部不能不开动脑筋朝前赶。我也受到一些感染，提出上述几个问题作深入研究的引子。我似乎感到自己盼了数十年之久的东西就在眼前，农村真正的工业化、现代化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然而自己对其中许多有着深刻历史的现象还未能透彻地理解，还需要继续观察。

江苏其他地区的条件有什么不同，他们是不是也走苏南社队工业的路子？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步子怎么走法？它从苏南的经验中能得到些什么？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在我心里盘算，希望今后的研究能向这些方面开展。

吴江的社队工业走过了十几个年头，三中全会后的迅速发展也有五年了，其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现在应是加以回顾总结的时候了。我们应当对社队工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对社队工业中发生的问题作出科学的说明。

(六)

小城镇作为商品的集散中心，它的商品流通与农村的经济发展之间具有互为前提、相互作用的关系。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要搞清楚小城镇商品的流通环节和疏通商品的流通渠道。

商品的流通环节，是指商品从生产者那里出来到达消费者手上，中间所经历的步骤。比如某一工业产品由上海的工厂生产后运往苏州，苏州的商业部门将它分配给吴江县，吴江的商业机构再把它分拨到各公社，公社供销社又把它批发给集体商业，最后由门市部出售到农民手中。商品就是这样经历了五个非直接消费的部门一步步地转运给消费者农民。这每一次转手都是商品流通的环节。同样，农副业生产的商品也要经过若干环节作相反方向的流通。这里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目前的商品流通要经过哪几个环节，以及各个具体环节对于商品流通有什么作用。

让我们撇开大中城市，先取出从小城镇到农村这一段来作考察。从这一段商品流通环节的具体分析中，就可以看到小城镇之间还有大小不同、层次高低之别。

前述的类型分析表明，小城镇对农村的主要作用可以因类型不同有所偏重。然而即使是同类型的小城镇，对周围农村所发生的作用，也不是等量齐观的。例如，同是作为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的小城镇，震泽的乡脚大，庙港的乡脚就要小得多。因此，由小城镇作用影响范围的大小，反映出一个有系统的高低不同的层次来。

城镇层次的划分，过去大多以人口数量的多少为标准。然而，小城镇商业作用的层次分析，单以人口为指标是不够的。因为人口大体上相同的城镇在商品流通环节中所处的地位却可以不同。在目前我国商品流通的过程中行政的因素特别重要，许多不同等级的行政性的商业机构决定了商品流通

的环节。所以，我认为不妨首先从城镇的行政地位入手来观察商品流通的过程。

吴江县的小城镇依据行政地位，可以分为三层五级：第一层有县属镇，在吴江有人称为七大镇。这一层小城镇的共同特点是具有镇和公社双重商业机构。县属镇又分两个级别，第一级是县城松陵，它有县、镇、社三重商业机构。第二级是震泽、盛泽、平望、同里、芦墟和黎里等六个非县城的县属镇。第二层是有公社商业机构的公社镇（或称为乡镇），吴江的十六个公社镇也分为两个级别。第三级是商业人口接近于县属镇的八坼、铜罗和横扇，当地叫做三小镇，这三小镇除公社商业机构外，还有若干县属商业机构的派出部门，其管理范围超出本公社。第四级是设置有公社商业机构的庙港、七都、莘塔、金家坝等十三个镇。第三层是大队镇（或称村镇），这一层镇在区域上都属某一大队范围，在行政上并不附设商业管理机构。它不同于有下伸店和双代店^①的大队中心村，区别在于有商店、服务业和集市贸易的聚合和有经常性的商业管理人员。第三层不再分级，在吴江县共有如前面所说的陆港等十二个村镇^②。

由此可见，商业流通的环节实际是以一层层的行政级别为依据的。那么商品是怎样在这些环节上运行的呢？实际情况要比工业品通过高层次到低层次再到农村，农副产品又反向运行的理论分析要复杂得多。

① 业务属供销社系统的大队代购代销店叫做双代店。

② 据乡村建设局调查统计。

例如开弦弓村有一家下伸商店，这个店销售量最大的是火柴、糖果、香烟、酒、酱油、盐一类的商品。店里还有三只铝锅，据商店工作人员说铝锅已在货架上放了整整一年。难道是开弦弓村人不用铝锅？不是。农民说买一只锅子要用几年，总得挑个好的，但这里只有三只没法挑选。所以买铝锅之类的物品他们就要上震泽或庙港。村里的青年男女结婚时新房里所需要的一些用品还要到上海、苏州去买。开弦弓是一个村落，不是村镇，但从这里可以看出普通农村里农民生活各种必需品是分别由不同层次的城镇供应的。这里就体现出了小城镇作为商业中心的层次来。一般情况下，农民生活中食用的如油、盐、酱、醋等一次性消费品基本上可以在村镇得到满足。村镇商业的门市部一般不到十个，销售范围大都是在一公里以内。农民生活中日常用品如热水瓶、脸盆等低档耐用的消费品，基本上是从乡镇或县属镇得到满足的。乡镇内同类商品一般都是独家经营的，花色品种与数量均较少，它们的商业门市部在十到五十个之间，销售范围在3公里左右。县属镇内同类商品则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门市部销售，花色品种与数量比乡镇多，选择余地增加，它们的商业门市部在五十到一百个之间，销售范围在5公里上下^①。

小城镇的层次是层层包含的。这就是说高层次的小城镇的销售范围不仅包含低层次的小城镇及其销售范围，而且高层次的小城镇自身也具有属于低层次小城镇的销售范围。例

① 商业门市部数与销售范围都是吴江县各层小城镇的平均数。

如，假定庙港、七都、八都等乡镇和这些公社的农村都到震泽来买铝锅，那么对铝锅这一商品来说，震泽镇铝锅的销售范围就包含了以震泽为中心的所有乡镇及乡镇的销售范围。但震泽不只是卖铝锅，它同时也卖油、盐、酱、醋；就这些商品的销售来说，震泽镇的范围与陆港这些村镇的范围相差无几，都限于附近约一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商品的销售范围实际上就是吴江民间所说的“乡脚”。乡脚并不是以镇为中心的一个清晰的圆周，每一种商品都有各自的乡脚，所以一个小城镇的乡脚由许多半径不等的同心圆组成。小城镇层次的划分实际上决定于它们乡脚的大小。

小城镇层次分析应当深入到满足农民各种生活需要的功利评估。所谓功利评估，是指农民对买何种商品，花多少时间、付多少成本的计算和均衡。功利评估的原则是以最少时间、最低成本去取得最满意的商品。小城镇的商业层次应当根据这样的研究结果来布局。我不知道现在的商业部门有没有一本在哪个环节该储备什么样的商品和每种商品要储备多少的帐。如果没有这本帐，就会产生有些环节上应该具备的商品无货供应，而在另一些环节上不应该储备的商品又被囤积的不合理现象。例如我在广西大瑶山的新华书店买到一本《陆游年谱》，对我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但在瑶山的书店里摆上这类书籍，恐怕是很少有机会被人赏识，难以遇上知音的。

流通环节的合理化是商品流通的必要条件，道理是显见的，但做到合理化却需要作细致的研究。

疏通商品流通渠道是一件更大的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城镇上行政化的单轨渠道发生的问题，我们还不怎么清楚。我只是了解到集市贸易在吴江已经恢复起来，农民挑担上街，商贩摆了摊子，到处很热闹。松陵镇还为这样的集市搭了个玻璃瓦棚，下雨天，买卖人群不致淋雨，做了一件好事。虽然在集市贸易中是有价格管理等许多问题存在，但我看主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吴江县小城镇的集市贸易还只是停留在农民提上一篮鸡蛋在集市上等上半天的原始状态，而不是象北京市中关村一带那样，只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便从日中为市的个体经商变成一排排集体合作的商店。

听说供销社也正在进行改革，对此我得首先说明自己是外行，又没有进行实际调查，目前还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说几句。从客观形势看，现在要供销社重新回到合作性质上去恐怕不那么容易，要国营商业把已经经营的那些项目让出来恐怕也有难处。据说，前两年小镇上供销社和集体商业从体制上划清了。然而所谓的集体商业，其实还是批发商品给它出售的供销社附属机构。不客气一点说，那是换一把勺子去舀大锅里的汤。

那么，小城镇集体合作形式的流通渠道怎样才能建立、发展起来呢？前些时松陵镇的同志写信给我，要我帮助他们买一辆卡车，用它把凤尾菇运销到苏州市场上去。买汽车，我当然是毫无办法，但这封信使我受到了启发。1981年我把澳大利亚一位朋友送给我的平菇的菌种带回了家乡。1982年吴江县农技所和松陵镇的同志试种成功并作小规模推广，有

同志还给它起了一个优雅的名字叫凤尾菇。经化验，这种蘑菇不仅食用价值高，而且体积大，产量高，每斤以七分钱的成本能卖得六、七角钱，它还能立体柱形栽培，适宜作为农村家庭副业。可是在农村里推销有困难，县城内的市场太小，而苏州和上海却很欢迎这种食品，于是运销的问题也就发生了。所以，他们要我设法买一辆卡车。这封信给我的第一个启发是新商品要走新的商业渠道。既然原有的商品走集体形式的流通渠道困难重重，新的商品或许就比较容易创出新的方式来。我们应当支持鼓励生产者自己组织起来作集体流通的新的尝试，一切好的形式都是从尝试中出现的。我们要积极发展小城镇，就要从一切方面想各种方法去尝试新的发展。

由此我想到要进一步研究农村产品商品化的问题。凤尾菇产量大了，就想到自己要买汽车运销，那是商品产量的提高促使他们想到的。如果农村除社队工业外的商品生产还不足以满足附近几个小城镇居民的需要，那么手拎肩挑的集市贸易渠道就完全可以承担流通任务，自然不必也不会有更上一层楼的要求。然而1982年江村杀兔吃肉的事实又说明，农村经济商品化的水平必须要有新的立足于国内市场的流通渠道才能巩固和提高，如果一味把身子靠在洋人的背上过日子，人家动一动小拇指，我们就要跌筋斗。所以，我希望有同志能从农村经济商品化的现状出发，深入探讨小城镇商业流通渠道与农村商品化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从这些事实又引出一个看法，小城镇商业的发展之所

以没有社队工业的发展快，原因是受到原有商业渠道压抑的农村商品经济，对小城镇的冲击力还不够强，一旦这种冲击力强大起来，包揽式的流通渠道就非改革不可。而现在农村经济尚处于生产责任制的低级阶段，商品生产的程度还不够高。要突破当前的局面，还有待于多种经营专业责任制的发展。从以家庭生产为单位的责任制到集体专业化生产的责任制，是当前农村生产力继续提高的必由之路。从整个苏南地区来说，集体专业化生产的责任制形式已经在某些方面出现。所以，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客观的发展会带来的结果，以开辟新的流通渠道的尝试去自觉地适应、促进这一具有光明前途的发展。

(七)

小城镇怎样成为农村的服务中心、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对此我只能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四访江村时，听说在影片“少林寺”上映前，浙江的南浔镇电影院先贴出上映这部新片的预告。震泽镇的电影院获悉这一消息后，赶紧抢先搞到这部片子赶在南浔之前放映。这部片子在当时吸引了周围四面八方的农民。他们摇着船、带着孩子来镇上看电影。《少林寺》放映一周，卖座率始终不衰，电影院收入一万元。农民上街看电影总得吃点面条、点心，还要往家捎回些东西。结果这七天内全镇商业的营业额增加了六万元。这件事在我看来是镇作为农村中心的生动例证。假如经常这样，震泽岂不就是一个农村的娱乐中

心和商业中心了么！这件事说明小城镇的服务业是蕴有巨大潜力的。不是农民没有对现代社会生活的需求，而是我们不懂得农民的需求，致使小城镇上的服务项目、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远跟不上客观的形势。

为农村妇女烫发，现在是小城镇的一个服务项目。1981年我三访江村时，很少见到有姑娘烫发。到四访、五访时，烫发的女青年逐渐多了起来。今年六访时看到，不论是社队厂的青年女工或是在田里干活的姑娘，头发几乎都弯曲了起来，甚至连十二、三岁还在上学的女孩子也烫了发。据说她们大多数是到庙港和震泽的理发店里去烫发的，每次两元。每逢过年过节，理发店日夜开业。在这件事上，庙港和震泽已成为农村姑娘的服务中心，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测量这两个中心服务区域，即小城镇乡脚的一个指标。但是，农村姑娘烫头发的风气完全是自发的。我们对电视机的下乡引起了什么后果可以说很不清楚。这些都是看来是小事情，但意义却十分深远的问题，需要我们严肃地进行科学的研究。

再说小城镇上的茶馆，过去这是附近农村交流社会信息的中心，城里的、镇上的、村里的信息都在茶馆里汇集，并散播到附近农村里去。它是个民间相互咨询的服务场所，里面有社会新闻、有生产技术问题、有做媒等丰富的内容。现在民间的信息交流、咨询服务是否还在茶馆进行，还是另有场所和其他途径？在农业生产责任制和农副工综合发展新的情况下，农民到底有什么新的服务要求，怎样去满足他们的要

求？这些都是迫切需要加以研究的课题。

在文化方面，除了电影院对农民开放外，镇本身现在很少有什么文化设施。青年们一般不上茶馆，又几乎没有文娱、体育等活动，连找对象在镇上也没有谈话的场所。去年松陵镇修了一座小公园，除了供人憩息，还有一些石条凳可坐，使农村青年男女进城来可以有个谈恋爱的地方。听说还有人反对，说是有伤风化。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小问题。我看现在存在着严重的地缘、业缘内婚现象。青年男女没有正常的社交活动，不熟悉居住和工作范围以外的人，不得不在同村、同厂、同机关内部找对象，以致选择的圈子越兜越小。据说在一些交通闭塞的山村里低能儿越来越多，原因很可能就是长期的近缘婚姻带来的不良后果。所以，扩大青年的社交范围对于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对于改变近缘婚姻是有积极意义的。小城镇的文化中心作用不是一句空话，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不是空洞的口号。真正的中心作用是要使农民到小城镇来能解决实际问题，满足农民的需要。也就是人与人要在这里碰头，物与物要在这里运转，信息要在这里交流。苏南、吴江这一发达地区的小城镇到底为农民做了多少事情，很值得我们去看一看、想一想。

在教育方面，使我最痛心的事是江苏的文盲率要比全国的平均数高，吴江更是高中之高。按理说，一个地区经济水平是与文化程度成正比的，实际上现在反过来了。其中的规律性值得研究。可我想提一个倒过来的问题：为什么要识字？不识字又怎样？如果不识字照样生活，收入还比识字的高，

那就发生了为什么要识字的问题了。

这次我在太湖边上的庙港渔村里散步，我问了几个年龄不同的居民识字不识字，他们都对我摇摇头。年纪大的都是有经验的渔民，年轻的孩子们正跟着父兄们学打鱼。据说他们近年来的收入比农民高得多。我在和他们的谈话中才悟出他们不识字的道理来。这些都是多年甚至世代在太湖上捕捞的渔民，捕捞是搜集自然产物的生产方式，由来已久，说是原始经济也未尝不可。这种生产方式需要有这地区自然地理的丰富知识。在太湖里打鱼就得充分掌握太湖的气候、风浪和鱼源，这是他们生活所依赖的知识。这些知识却并不靠文字来传递，而是口口相传并在实践里体验来的。要成为一个能靠捕鱼为业的太湖里的渔民，就必须从小跟着父兄在船上生活。试问他们为什么要在学校里花费多少年学会几千个方块字呢？年轻时进学校而不去跟父兄一起经风浪，到头来恐怕会在打鱼时被风浪淹死在水里。但是如果要提高渔业的生产力，改捕捞为饲养，就是用人工去经营鱼塘以提高产量，情况也就完全改变了。饲养员需要知道温度、湿度、水里含氧的成分等等所谓“科学知识”，要学习这些知识，不识字是办不到的。从太湖上的“浪里白条”变成鱼塘里的饲养员，是从原始采集阶段的生产方式发展成饲养阶段的生产方式，也就是从不需要文字到离不开文字的发展过程。如果现在庙港的渔民安于在太湖里乘风破浪地捕捞为业，那么我看文盲是扫不完的。我从太湖边上散步回来，对扫盲问题的认识似乎又深了一步。我们读社会发展史应当要用它来理解当

前的实际问题：生产力不发展，教育普及不了。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当前农村的教育问题，也会看到目前农村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不仅提出了普及教育的需要，也提供了普及教育的可能。怎样才能满足农民对教育的需要，那就有赖于我们提供怎样的教育内容了。因此怎样把小城镇建成农村的文化教育中心，对我们来说应当是一个重要的新课题。

(八)

我的发言应当结束了，在末尾我想附带提出一个名词问题。我素来不主张在名词上浪费笔墨，但是也不能不注意到名副其实的必要。“小城镇”这个名词最近大家已经习惯了，是否还可以多考虑一下？用这个名词来指作为农村中心的社区是否妥当？我们的字典里对城、镇、集、墟、街、场、村等名词都有一定的释义，我不在这里再重复。但必须指出，当前各种社区需要划分出一条城和乡的界线，各层的社区用哪些名词来表达最为妥当还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如果把“城镇”这个名词用来指作为农村中心的社区，从字义上看，它似乎应当属于城的一方，而实际却是乡的中心。为了避免这种因望文生义而可能产生的误解，不如称这种社区为“集镇”。我们知道有不少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商业和文化中心，而停留在“日中为市”的定期赶集形式上。津浦铁路进入安徽境内就有很多车站至今保留着某某集的地名。这些集所起的作用，程度上虽有区别，性质上是和吴江所见到的许多“小城镇”相同的。把这

些集称作“小城镇”总不免有点牵强。所以我想不如把在吴江所见到的“小城镇”和这些集归在一起而称它们作“集镇”。

当然“小城镇”应当归在城、乡的哪一边，还是一个可以研究讨论的问题。把它说成城乡的纽带，只说明了它的作用，而没有表明它是一个具体的社区。我主张把农村的中心归到乡的一边。但也可以考虑在城乡之间另立一格，称之为镇。麻烦的是汉字不习惯用单音节名词。镇字旁还得加个字，要加就不能再用城或乡，所以还是可以考虑称“集镇”。

还要提到的是群众语言中有传统的分层模式，那就是“城里人”、“街上人”、“乡下人”。这种分层至今还有现实的社会意义，含有高低之别。而我们所提到的吴江县的“小城镇”中在群众语言中却包含了三个层次。作为吴江县行政中心的松陵镇的居民过去被称作“城里人”。松陵镇过去也确有城墙，解放后才拆除。其他的镇上的居民在群众语言里都不称“城里人”，而称“街上人”。但是象庙港一样的公社镇，过去并不是基层行政中心，只是沿太湖的港口之一，象一个较大的村子，所以它的居民够不上“街上人”，还是“乡下人”。有人看到在现在所谓“小城镇”里还存在着和群众语言相适应的层次，所以主张用“城镇”、“乡镇”、“村镇”来区别。“城镇”指松陵一样的大镇，即县属镇，“乡镇”指公社一级，也是体制改变后乡政府所在地的镇，其下则是“村镇”，这种意见值得考虑。我在这里只是提出来供大家讨论。我们的调查研究越深入，对我们用以

识别事物的概念也会越来越细密，也会要求我们所用的名词更加确当切实。现在一般应用的名词都有待我们进一步去研究讨论。

今天我的讲话里还是用“小城镇”这个名词，因为我们的讨论会的名称就这样用的，不能因为我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就加以改动。这也说明了这些概念和这些名词都有其社会的根源和作用，即使改动也要有个过程。我个人的意见也会改变，一门科学在初创时期总是这样的。

小城镇 再探索

(一)

我们的小城镇研究是从农村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1981年我三访江村时，还只是以一个农村为范围进行观察，但是这年年底四访江村时，我们就提出要“更上一层楼”，从农村升一级，去调查研究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集镇。我们曾访问了吴江县的一些集镇，发现这些集镇正在从衰落转向繁荣。除个别例外，在过去三十年里，绝大多数集镇普遍存在着人口外流，人数增长缓慢，甚至下降的现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现了新局面。这些集镇的册外人口大增，有些镇竟达居民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所谓册外人口是指住在镇上而没有户口的人。我们看到这里问题很多，所以决定从1982年开始，把小城镇研究列为我们调查工作的重点。这个意见得到了江苏省委的支持，因为就在我们提出这个意见不久之前，江苏省委在常州举行过一个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发展小城镇的主张，真是“不谋而合”。因此，中

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就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联合组成了小城镇的调查研究组，开始这个课题的调查研究工作。

为了深入探索这个新的课题，我们采取了“解剖麻雀”的方法，把小城镇数量上号称“多子女”的吴江县作为解剖对象，并提出“类别、层次、兴衰、布局、发展”的十字提纲。我们的工作分两个阶段，先是从上而下，向各级党政干部请教，初步了解从县到镇的基本情况、有关的工作经验和已看到的问题。然后，按不同类别和层次，定点、定人、定题，课题组同志分别下乡作实地观察。去年秋季集合汇报，并邀请了中央有关部门及江苏省委政策研究人员、江苏省有关各市各县各镇领导干部，以及有关研究机关和高等院校的研究人员一起进行多层次、多方面、多学科的学术讨论。这就是1983年9月21日到27日在南京举行的江苏省小城镇研讨讨论会。我在会上作了《小城镇，大问题》的发言。课题组及其他参加会议的同志提交讨论的一些论文，经过修改提高已汇编成《小城镇，大问题》（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论文选第一集），今年7月份可望出版。在这次会上成立了江苏省小城镇研究会。

1983年全国政协组织了有北京和南京各方面专家参加的小城镇调查组，从11月11日到12月6日在江苏的常州、无锡、南通、苏州四市和部分县、镇参观访问，对江苏小城镇讨论会所提出的问题和观点进行“会诊”。调查结束后，在苏州总结，会上的发言正在整理，陆续将在《社会学通讯》上发

表。我这篇《小城镇，再探索》就是以我在这次总结会上的发言为基础，整理而成。下面我只想把我个人在四市和部分县、镇访问中的体会作一简要的叙述。

(二)

农村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小城镇的复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短短的五年中，广大农村落实了各项经济政策，全国农业生产，除了极个别地区，都有了普遍的和显著的提高。农民确实富裕起来了，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们所调查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四市，在近年农村经济发展上，在江苏省来说是站在前列的。而江苏省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上又是站在前列的。1982年江苏的先进记录是“两个超过500亿”，即粮食571亿斤，工业总产值502亿元。1983年再创的新记录是“六、七、八”，即粮食610亿斤，财政收入72亿多元，工农业总产值824亿元。

在我们调查期间，1983年农村的各项指标尚未结算，省委农工部提供的资料：1982年江苏全省社员人均收入309元，比1978年增加154元，四年翻了一番；同年，粮、棉、油总产量年均增长率都在4%以上；主要副业项目的年均增长率都高于10%；乡镇工业（公社及生产大队两级所办企业）总产值四年也翻了一番，占农村工农业（生产队所办企业算作农业）总产值的42%，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

我们调查所经过的地方，农民住宅已在更新，使得农村面貌焕然一新。长江北岸开始“草房改瓦房”，苏、锡、常

开始“瓦房改楼房”。有些地方沿路可以看到装上阳台，阳台上摆满花卉的别墅式两层楼房，一幢接一幢地绵延几里。集镇上百货公司、电影院、文化宫、书场等新型建筑在宽阔的大道两边耸立，使旧上海的边缘市容相形见绌。有些生产大队开始兴建公共浴室。无锡县前洲乡的一位青年在他花费10,000元建起的三层楼的新居中掰着手指告诉我们：近几年，他和他那在队办纺织机械厂工作的妻子一起，每年收入约4,000元，除了全家三口的日常开支，可以积蓄2,500元到3,000元。这种人家在前洲乡一类的农村里是很普遍的。江南鱼米之乡出现的“建屋热”是农民丰衣足食之后开始解决居住问题的反映。农民造房子有些地方已超出了居住的需要，部分是属于家庭副业的生产投资，还有部分是属于“实物储存”。农民从商品生产中获得的收入，一时已消费不了。江苏农村在1982年末的储蓄额达20亿元，在苏州市平均每个农民有78.9元存进银行。但是有理由相信留在农民口袋里的现金很可能超出此数，这部分余资按农民的传统心理，要变成不动产才放心，所以也构成了兴建房屋的一种动力。无论怎样，在这四市的农村中已出现的小康气象是十分动人的。

使这地区农民富裕起来的主要因素是农村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这些年来江苏全省农副工三业各以不同的速度逐年增长，其中农产品产量的增长率最低（约4%），乡镇工业（即社队工业）的产值增长幅度最大（约90%）。这意味着在农民的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比重相对降低，而来自工业的比重越来越大。在我们调查的四个市中，以县为单位，工业

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都接近或超过一半，特别是长江以南这三市的县一般都在70%以上。1983年这三市中有无锡、常熟、江阴三县（市）的工农业总产值各超过了20亿元，其中农业产值只占10~20%。据1983年统计，江苏已有塘桥、乐余、前洲、玉祁、周庄、华士、黄巷等七个乡的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了1亿元，这些乡的工业产值都占90%。农民富裕靠工业，已成了普遍的事实。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由于这些地方工业办得好，因而富裕起来的乡村，农副业收入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而在绝对数字上却相应地增长，速度也较工业不发达的乡村为快。这个事实应当大书特书，因为它向人们展示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种崭新的特点：中国社会基层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而且又促进了农业发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这个特点的重要意义只要和西方早年工业化历史相对照就容易看得清楚了。欧洲工业化初期，在集中于都市里的机器工业兴起的同时，农村却濒于破产，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涌进城市，充当新兴工业的劳动后备军。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工业的成长是以农村的崩溃为代价的。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与此相比，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却出现了上述的那种基本上和资本主义工业化迥然不同的新道路：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以巨大热情兴办集体所有制的乡镇工业。这种乡镇工业以巩固、促进和辅助农业经济为前提，农副工齐头并进，协

调发展，开创了农村不断繁荣兴盛的新局面。这种工业化道路，从具体历史发展来看，并不是从理论上推论出来的结果，而是农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自己的创造，经过了多年实践的检验，“实行几亿农民离土不离乡，积极发展乡镇企业”，终于被肯定为从我国国情出发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方针。

(三)

在吴江县的集镇调查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集镇的转衰为兴，是由于当时所谓社队工业即现在所说的乡镇工业的兴起。我们这次四市访问证实了这是这个地区共同的特点。

据反映，苏南地区的乡镇工业虽发生于七十年代的初、中期，但那时是“偷偷摸摸地搞”，一般说来工厂为数不多，规模也较小，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兴起，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例如无锡县的前洲公社1970年仅有一个农机厂，12名工人，全公社的工业产值才150万元；到了1982年，工业产值达到7,388万元，增长了四十八倍，务工社员也增长到7,700余人。从无锡全市范围来看，1978年以来乡镇工业的产值和利润分别以年均23%和7%的速率递增。

这一情况的发生，如我过去已经指出的，只有从乡镇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内在联系中才能找到答案。苏南是一个农业开发历史悠久的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吸引和积聚越来越密集的人口。为了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维持住该地区的“天堂”之富，这里很早就在农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家庭

手工业。“牛郎织女”的传说反映了夫妇之间的分工和合作，表明了农业与手工业在一个家庭内的有机结合。这就是苏南地区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历史总结。

建国以后，苏南的农业由个体经济走上了集体经济的道路，农业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可是，由于人口的一度失控，人多地少的矛盾在这里越来越尖锐，七十年代初四市的人均耕田已经降到1亩上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农村经济政策又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以粮为纲”变成了单一的粮食生产，破坏了这一地区工农相辅的传统结构。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力没有别的出路，不得不以成倍增长的成本在有限的土地上搞强化开发，那是增产不增收的路子。据苏州市的测算，七十年代中期以来，纯农业的收入长期在人均100元上下徘徊。

我在《小城镇，大问题》一文里已经说过，江苏农民怎样在十年动乱中“逼上梁山”地找到发展乡镇工业的道路。我也指出过，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是乡镇工业发生和发展的内在因素。据我们这次调查的四市来说，以劳均四亩耕地计算，农村里就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剩余劳力，仅苏州市的五个县就有120万人，约占该市农村总劳力的50%。这些原来被“大锅饭”所吞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旦在自办的工厂里找到了从事生产的机会就成了农村里新增的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生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里家家户户都发现了从有限的责任田上大可腾出手来另找生财之道，于是乡镇企业就遍地开花地在农村里生长了起来。因此，我

们可以说，乡镇工业是农村剩余劳力以新的劳动手段与新的劳动对象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农民依靠集体的力量办起来的工业，它不但不会损害作为自己基础的农副业，而且能在为国家财政收入作一定贡献的同时，主动地承担起支农、补农和养农的责任，形成了我在上节里所提出的我国工业化的新道路。

从江苏全省来看，1983年乡镇工业向国家纳税11亿元，占全省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在1979年到1982年四年间，乡镇工业的利润中有20%以上用于购置农机、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兴办农村集体福利事业等，总额达14.5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家对全省农林、水利、气象的投资总额。与此同期，乡镇工业工资总额和返队利润累计有59.9亿元，其中1982年为17.9亿元，以全省农业人口计算，人均收入35元。苏州市的同志说：“我们这里正是由于乡镇工业的发展，依靠以工补农这着棋，才稳定了务农社员的生产情绪，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继续发展。1982年，全市五个县农村人均255元的集体分配收入中，来自乡镇工业的为130元。实质上，这是在弥补粮食价格背离价值的差额上，在国家宏观调节手段不足的情况下，乡镇工业为国家分挑的一部分担子。这副担子非挑不可，因此，乡镇工业也非办不可。”上述数字表明了苏南的乡镇工业对农副业的巩固、发展和农村的繁荣所作出的贡献。在调查中我们看到，凡是工业办得好的地方，随着工业对农副业的补养成分越大，农副业的发展也就越迅速。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必然的联系。

乡镇工业补贴农业并促使农副工综合发展的这种作用，在形式上类似于历史上农民的家庭手工业。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乡镇工业是根植于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的。但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农工相辅已不再以一个家庭为单位，而是以集体经济的性质出现。从一对对的“男耕女织”到一村一乡的农副工综合发展，使农工相辅的传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一进步迅速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使农民的富裕得到了保证。在调查中，四个市的干部和群众都提到这样三句话：“农业一碗饭，副业一桌菜，工业面貌改。”意思是说，农副业过关，充其量是解决温饱问题和略有余款，只有办起乡村工业，才能使农村的繁荣具有坚实的基础。这是各级干部与农民的切身体会和自觉行动，是一种“与荣俱荣，与枯俱枯”的感情。苏州的一些同志说，要是回过头来，把转移到工业上去的几十万劳动力重新捆在一人一亩的土地上，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四)

乡镇工业不仅与农业之间有着历史的内在的联系，而且与大中城市的经济体系之间存在着日益密切的连结。在旧中国，自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的上百年间，外国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就从这个商埠出发，沿着沪宁铁路把吸血管一直插到苏南的农村。首先被摧毁的是农民的家庭手工业；接着农业也独木难支；最后农民忍痛出卖土地，到上海去做工——走上了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还要加上半殖民地的性

质。

解放前，由于农村破产，被迫走入城市的农民在工厂里学会了现代技术。他们在当前乡镇工业发生和发展中成了一个积极因素。据无锡市反映，解放前上海的钣金工中有近一半是无锡人，形成了上海机械工业中的所谓“无锡帮”。这些工人原来就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中国的工人和西方国家不同，他们多半是只身进城，挣钱养活乡下的家口。这种“藕不断，丝还连”的状况至今还起着作用。我们走访了二十八家乡镇工厂，它们的创业都与各种各样的“关系”有关，而其中大多数就是由有乡土关系的退休工人或干部牵线搭桥或提供技术力量而诞生的。但乡土关系只是乡镇工业得到促发和催化的条件，乡镇工业与大中城市日益密切的连结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发生和加强的。

在常州湖塘镇，一家社办的柴油机厂正在为常州市内的国营厂生产配件。据说近年来由于那家国营厂的生产量供不应求，要扩大生产规模，但是由于受到市内土地、资金、招工指标等许多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展开。于是就通过某种关系找到了湖塘的社办厂为他们生产配件，形成了“一条龙”工业体系。生产关键部件和承担总装任务的“龙头”设在市内，“龙尾”则摆在集镇或乡村。在无锡、苏州等地，看到有不少轻工产品，如液压标准件、各式服装等订上了上海的商标出厂，询问之下才知道当一些城市工业转向高精尖产品时，同样受到条件的限制而无力再承担市场仍有需求的老产品生产，于是将老产品连同技术一起转移到乡镇工业，这被

称为“产品脱壳”。

“一条龙”和“产品脱壳”都是城市工业与乡镇工业相联系的形式。目前联系的形式很多，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下列六种：（1）合资经营，产品或利润分成。（2）产品脱壳，部件扩散。（3）来料加工，保质保量。（4）技术支援，协作收费。（5）支援资金，补偿归还。（6）技术转让或专利转让。这些归纳和分类是否详尽和科学尚需研究，但可以说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经济体系的调整和发展，由于城市条件的限制，城市工业与乡镇工业联系也就越来越密切，全面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正在逐渐取代那种只是通过几个“关系户”作媒介的联系。

以所调查的四市来说，在城市工业与乡镇工业的经济、技术合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与上海市联系的乡镇工业最多，与常州、苏州、无锡、南通等市联系的次之。这就是说，上海市的经济发展对乡镇工业乃至地区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起着中心的作用。从无锡县的情况来看，在全县2,000多个乡镇企业中，与上海、无锡等大中城市工业、科研单位挂钩的已有709家，协作项目895个，其中与上海、无锡两市协作联合的居绝大多数。由此可见，乡镇工业是以城市工业为依托的，城市工业是以乡镇工业为后方的。他们的相互依赖性在不断增大。特别是在乡镇工业经过了1980年和1982年两次整顿以后，它在城市工业体系中占有了一定的地位。仅以沙洲县锦丰公社玻璃厂为例，它在上海跃华玻璃厂的支持下，已年产三十万标箱的民用玻璃，在华东地区属可

数之列。据说，上海，无锡等市的工厂企业，向同他们挂了钩的乡镇企业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心连心，不变心，一条心”。因此可以说，苏南的乡镇工业实际上已经成为城市工业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是乡镇工业离不开城市，城市工业也离不开乡镇工业，两者的密切连结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

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这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系统；展现了“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的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当然，对这个系统内各部分之间联系的细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然而系统中各个部分的不同作用是明显的。从苏南地区的实际来看，这一区域经济系统已具雏形，各自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所谓区域经济系统，是指一种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才具有它意义的经济模式，一旦越出区域，发展模式就会改变。在常州市的金坛县和南通市的如皋县，可以明显感到它们已是上海经济区的边缘地带，因为那里的经济发展已具有许多不同于整个苏南地区模式的特点。

当前，乡镇工业面临着不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困难。其中普遍反映的有：（1）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缺乏计划渠道，乡镇工厂中有一部分变成了做做停停的“开关厂”，好几个县的负责干部在为煤炭、钢材而煞费苦心，千里奔波。（2）技术力量薄弱、人材缺少。（3）环境污染的治理和劳动保护的条件较差。（4）担心在1984年取消低税率

后，乡镇工业将会处于劣势。苏州市的同志提出：目前对乡镇工业的扶持还是迫切需要的。例如，在材料、能源的供应和产品销售等方面，能纳入计划的应即直接纳入计划；在资金信贷上，可否给予低息优待；在税收政策上，是否可采用变通措施，在支农、补农款放在税前列支；每年分配一部分大专和中专毕业生到社队工厂工作，以加强其技术力量。对这些问题，还需要更深入地调查研究，才能提出切实可行和因地制宜的解决办法。

(五)

随着乡镇工业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了一条出路。据无锡市的统计，全市乡镇工业和其他乡镇企业已经安排的劳力占农村总劳力的34%。其他三市的情况与无锡市大体相仿。这意味着在苏南地区，农村劳力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已脱离了农业劳动。从全省范围来看，乡村工业的职工总数为400多万人，这一数字接近全省城镇户口的工业职工总数。与此同时，由于多年来集镇本身人口萎缩，县属和镇办的企事业发展也因人员缺乏而用各种方法招聘和使用相当数量的非正式职工，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村劳动力。据省劳动局统计，不包括外发加工部分，1982年全省城镇企事业单位共录用了农村劳力99万人。这一方面使农村的人口压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另一方面使这部分农民开始以新的劳动手段与工业生产的对象相结合。于是，在江苏农村形成了一支具有独特性质的劳动队伍。

各地对这支劳动队伍有许多称呼，例如农民工、务工社员、亦工亦农人员等等。叫法虽然不同，但意义却相同，那就是农工相兼。因此，兼业就是这批劳动者具有的独特性质。然而从实际上看，该地区的劳力剩余量是一个随着农时而变化的数字，农忙时剩余少些，农闲时则大量剩余。这就要求在剩余劳力转向工业的时候，应当保持他们在适当时间内能从事农业的弹性，以保证农业的稳定。因此，兼业是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

在苏南农村，从人口与土地的总量上分析，就是在当前的技术水平上说，劳动力剩余已经成为严重的问题，因而剩余劳力向工业、商业、建筑、运输、服务业的转移是一种好现象，而且，这也是社会主义农村长远发展所需要的。现在县、乡干部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把农村看成可以无限制地吸收劳动力的观点，而全力以赴地为剩余劳力谋出路，开辟新的生产渠道，这是值得赞许的。

我们走访过的乡镇工厂往往是采取每家农户出一人的招工办法。这样做似乎不合择优原则，但是却有符合农村具体情况的一面。他们告诉我们说，这样既可以保持农户在收入上的大致均衡，同时也是出于兼业的需要。每家抽出一个劳力务工，其余劳力在家务农，务工的上班时做工，下班回家后帮助干农活。武进县湖塘镇新光毛巾厂的女厂长就是这样的兼业者，她有效地管理着一个有1,800名工人（全部是兼业人员）的工厂，回家就务农。因此，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工业与农业以劳务搭配的形式，结合到每个家庭中去，家庭成

为兼业户。四个市中，兼业户约占农户数的80%左右。在乡镇工业较发达的无锡、常熟、江阴、沙洲、武进等县的农村里，除了五保户等特殊农户，几乎都是兼业户。

当然，对于兼业者来说，由于受到用工制度、上下班时间、工种以及家庭劳力状况等因素的制约，他们的兼业程度很不相同。大致上看，主要有三种状况：（1）以农为主兼营工业。这主要是指从事外加工的部分。务工者将刺绣、编织等手工产品承接回家，每天闲空时做工。（2）亦工亦农。这部分人一般是在非常年性的乡镇企业或离家很近的乡镇工厂工作，他们或者是在下班后仍从事相当数量的农活，或者是在农忙期间歇工务农。（3）以工为主兼营农业。这部分务工者一般都在离家较远的县城或县属镇工作，他们吃、住在工厂内，只是每周末回家做做帮手。

上述不同的兼业，实际上反映了由农民逐步向工人转化的过程。随着工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民有条件越来越多地转入兼业队伍，兼工程度也越来越高。在调查中可以看到，在从事工业生产方面，这批兼业劳动者中的绝大部分与城镇工人之间已经不存在本质的差别，他们同样与先进的生产力相联系，承担着约占办在镇上的工业三分之一的生产任务；他们与有集镇户口的工人做着同样的工作，而且以能吃苦耐劳而受到称赞，许多人已经成为工厂中不可缺少的生产骨干，有的人实际上是没有职称的“技术员”、“工程师”和称职的管理人员。因此，他们无疑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一批新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新一代的一部分。但是这些兼业

者的户口在农村，吃粮靠农业。在工资待遇和劳保福利上，他们与城镇工人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例如同工不同酬、劳保条件差、不能参加工会组织等等。对此，各地干部认为，粮油、户口关系的不变，不能成为否认以工为主的兼业者作为工人阶级成员的理由，他们要求工会组织接纳他们这批“与农村连着脐带”的新工人，并适当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经济待遇。这确实是由苏南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提出的一个新问题。

兼业劳动队伍的形成，不仅影响到社会结构，而且改变了人口的分布。整个苏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很高，然而分布极不合理。多年来存在着两种相反方面的人口流动：一种是涌向大中城市的自然流向；另一种是将城镇人口下放到农村的政策流向。这两种流向，导致大中城市人口的膨胀和农村劳动力的严重过剩。与此同时，那些处于大中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县城和集镇人口却普遍相对下降，形成了人口的两头粗、中间细的葫芦状分布，人口级差增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镇、社、队四级工业大多数是以原有的县城及集镇为基地迅速发展起来的，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力到这些小城镇上来工作，这就导致小城镇人口数量上的增加和结构上的变化。以江阴县青阳镇为例，该镇总人口解放初期为5,500人，1960年为5,885人，这十年仅增长7%。从七十年代起，乡镇工业开始吸收农村劳力到镇上从事工业生产。到1982年底，全镇聚居人口为15,366人，其中兼业劳动者为5,114人，占总人口的33%。再以武进县为例，

六十三个小城镇现有聚居人口25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7万人，占28%；兼业劳动人口10万人，占40%。青阳镇与武进县这种兼业者的比例在苏南地区只是一般水平。因此，在苏南地区，户籍人口数不能真正反映县城和集镇的人口规模。这些兼业者，绝大多数仍住宿在农村，每天在镇村之间作钟摆式的流动。县城和集镇就是以这种形式，控制农村剩余劳力向大中城市的盲目流动。从乡镇、县属镇到县城，各个层次的小城镇都在起着层层截流聚居人口的作用，从而减轻了大中城市的人口压力。

在调查中还发现，近年来这些地区开始用劳务输出的方式，将本地丰富的劳力、技能与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挂上了钩。仅南通市的农村集体建筑工程队就有13万人，现正在黑龙江、内蒙、新疆等省、自治区进行施工。这些建筑队以质量高、进度快而受到建筑单位的欢迎。工人们既不带家属也不讲究生活条件，往往是一年的任务十个月就完成，然后回家帮助做农活，过年后再次外出。无锡、南通、常州等市县在劳务输出的同时，还在互利互惠的原则下，与边疆地区开展经济和技术合作。

如下两种人口流向，开创了在流动中改变人口不合理分布的新路：一部分劳动人口从农村向小城镇聚居，被称为“离土不离乡”；一部分劳动人口有组织地定期从本乡外出，被称为“离乡不背井”。在江苏全省，前者已达400多万人，后者也约有100万人。由此看来，“离土不离乡”和“离乡不背井”这两种方式，应该作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

两条具体途径来进行研究。

(六)

从历史上看，我们所调查的这四个市的集镇都具有商品流通的功能，而且可以说绝大多数是商业型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农村经济的单一化，由于商品流通趋向国营化、封闭式的单渠道，集镇上的商业萧条下来，集镇本身也就日渐衰落。七十年代乡镇工业的发生，特别是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蓬勃发展，奠定了集镇发展的经济基础。同时，由于工业原料的采购和成品的销售，急切要求流通渠道的支持。随着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农村经济已从自给和半自给生产逐步走上商品生产的道路。过去那种狭隘的单轨流动渠道已不能适应新的需要。在这些压力下，集镇上的商业活动开始有所改变。从目前情况看来，流通渠道还需要大力疏通，否则将成为农村经济继续发展的障碍。据反映，现在集镇商业一般都具有国营、集体、个体三种经济成分，有国营公司、供销社、集体商业、乡镇工厂门市部、多种经营服务公司、个体户、集市贸易等七、八条渠道。其中集市贸易（包括农副产品的长途贩运）的发展最为显著。据省供销社反映，1978年的集市贸易成交额为8.1亿元，只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8%；1982年达到22.2亿元，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13%。各地都反映，虽然一再地扩大集市场地并搭棚改善贸易条件，但仍然满足不了集市规模增长的需要。上市时间也由早市、定期集变为全日市、天天集。集市贸易的活

跃，既是农村多种经营兴旺的标志，同时也反映了原有国营和集体商业渠道有不相适应的成分。如南通市海安县，去年饲养鸡680万只，国营商业部门无力承担全部的收购、储运任务，于是从事贩运活鸡的人逾万。据说，他们大多是用一辆自行车装着几十只活鸡到南京、上海去出售，人称“百万雄鸡下江南”。

这里，引出了目前在商品流通中的两个大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开辟着眼于国内市场的、与生产者利益密切相关的新的集体运销渠道的问题。吴江县农民家庭多年来以饲养长毛兔著名。去年兔毛大幅度降价发生了农民杀兔吃肉的事情。如今鸡与兔相比要幸运得多，因为它们毕竟运过长江，成为城里人的佳肴。兔毛是依靠国营渠道统一收购出口到国外市场，而鸡是由个体或联户的贩运者销向国内市场。这就是说如果不从打开国内市场着眼，如果商业收购部门与生产者之间脱节，那么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就不可能保持稳定，也根本谈不上大的发展，而只能维持在农贸市场热热闹闹的水平上。由此看来，现有的国营商业必须多向国内广大消费者着眼，并将自身的利益和生产者的利益真正连在一起，才能谈得上真正的改革。看来，要促进商品流通似乎应当首先着重开辟由生产者联合组成的新的集体运销渠道。

第二个是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配合问题。乡镇工业的能源和原材料的需要与计划供应的比例，与它的发展越来越不相协调。不少同志反映，过去集镇所承担的城乡物资交流作用，只是将农副产品运往城市，把城市工业品供应给农

村。而现在的集镇，已成为城乡经济体系中的一部分，因而在商品交换的内容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从城市运到集镇并通过它输向农村的，不仅是为数更多的日用工业品，而且有大量的供应乡镇工业的原料、燃料和各类机械设备。从集镇运往城市的，也不限于农副产品，更多的是以轻纺和机械产品为主的各类工业品。这一新的变化，提出了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重点上要有计划地加以分工的问题。但是目前乡镇工业除了自己争取到的与城市工业挂钩的间接计划外，原材料和燃料的70%以上要从市场调节获取。农副产品的粮、油、茧、猪、禽、蛋、皮、毛、骨、花、果、茶等十二大类的品种都由商业部门收购运往城市，其中大部分用作城市工业的原料。在计划与市场的供应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乡镇工业的继续生存和发展确是困难重重。因此他们提出，希望在城市工业与乡镇工业有所分工的基础上，考虑国营企业让出一些品种或一定数量的、适宜于乡镇工业生产的农副产品，作为乡镇工业的计划部分；同时，对于其他的原材料与燃料也作适量的计划供应。

(七)

由过去商业型的集镇，转变为今天工商结合、城乡结合的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对集镇本身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新问题：

首先是建设资金的来源问题。在调查的十八座小城镇中，可以明显看出，九个乡镇的新建筑数量都超过非县城的

县属镇，而县属镇的规模都大于乡镇，产生这一逆结果的原因是县属镇的建设缺乏资金。虽然国家和江苏省都明确规定：工商税收附加、公用事业费附加和房地产税返还这三项费用用于集镇建设，但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以苏州市为例，全市三项费用共200多万元，县属城有18个，平均每个镇仅摊到11万元。而且这些费用大部分用于县城的建设，其他县属镇得到的只有数万元。不少县属镇的干部反映，这些钱连危险房屋的维修都不够，根本谈不上搞其他建设。县属镇不但与设在镇上的乡政府是平级，而且对在镇上的全民企业和县属大集体企业也是看得见、管不着。据一些县属镇干部反映，以往他们在整顿街容修路铺桥时还可以向全民或县属集体企业集些资，但现在往往得到“不准乱摊派”的回答。他们认为这是对有关文件的一种曲解。他们说：集镇应当加以建设，建设必须要有资金，而集镇建设的资金不能依赖国家财政，只有靠集体集资的方式。因此，有权利者应当尽义务。凡是在集镇上的企业单位，按照不同的受益程度，规定集资的比例，是一条可行的解决建设资金缺乏的途径，它符合“人民城镇人民建”的原则。

其次是集镇的建设规划。对这个问题调查组内的建筑学家在实地观察以后认为：现在的小城镇建设存在着缺乏整体性、各自为政、见缝插针等等缺点，必须加以纠正。他们还提出了以建成农村发展中心的建设方向以及区分类型和层次、找出微差、合理功能布局、综合利用土地、体现地方风貌和时代气息等建设原则。

我们建议由江苏省建设厅牵头，并由清华大学建筑系和南京工学院建工系协助，在一两个小城镇（比如吴江县黎里镇、无锡县东峰镇），对建设规划进行具体的设计试点工作。

在集镇的经济发展、商业流通和建设布局中，有不少问题都涉及到集镇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这个地区集镇的行政管理体制现状是：在县城里有县政府、镇政府、乡政府（或区政府）的多重垂直和多重并列机构，在非县城的县属镇上有镇政府、区政府（或乡政府）的双重并立机构，在重点乡镇上有区、乡双重垂直机构，在一般乡镇上有乡政府，在自然形成的小市集或新兴的大队工业点上一般没有设立行政机构。

上述各层次的县城和集镇中，体制上矛盾最突出的是非县城的县属镇（即建制镇）。在这些镇上，由于几套行政机构的并立，将城乡之间的联系人为地加以分割，影响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在江苏全省实行市管县的情况下，这种镇乡分割的管理体制，看来应该进一步加以改革。据吴江县黎里镇实行镇乡合并、镇管村的试点表明，这样的体制改革加强了镇乡的经济结合，有利于城镇建设的统一规划，打破了庄园式的封闭体系，还能统筹安排农村劳力和统筹解决城镇居民的生活设施。但由于原先的经济实力是公社比镇要强得多的情况，镇乡合并以后，就势必提取一部分原来由社队所办工业的利润用于集镇建设，对农村一头的好处不明显。对此，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总结经验。

行政管理体制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加强块块的领导，逐步改变条块分割的现状。目前在集镇上的县办企业名义上是条块双重领导，实际上只承认条条而无视块块，以致造成政府办工厂、工厂办社会的现象。对此如何解决为好，也要进一步研究。

另外，为使一些具有特殊资源或旅游价值的集镇发展得更快一些，起到它们应有的作用，在行政体制上应采取改革措施。例如宜兴县的丁蜀镇，是一个与江西景德镇齐名的陶都，现在实际聚居人口已达七万，但由于它只是一个相当于公社一级的县属镇，在镇上又是丁蜀镇、丁蜀区、周墅乡三重并列体制，严重阻碍了它的发展。象这样在国内乃至世界有影响的陶都，可以考虑升格为县级市，由无锡市直辖管理。考虑到宜兴县的实际情况，可以由市属镇给予财政补贴。

* * *

在苏、锡、常、通四市调查近一个月，同志们越来越感到小城镇确实提出了一个大问题。研究这个课题，对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有密切的关系。参加调查组的研究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对这次携手合作表示满意，对江苏省和有关市领导机关的支持深表感谢。我们意识到这次调查由于时间的短促，只是走马看花，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还很不够，有不少问题的研究只是刚刚起步。而且这次调查的是江苏境内长江两岸的集镇，还没有去看正在大步前进、潜力很大的苏北地区。我们从这次调查中所探索到的一些事实和观点还是有局限性的。因此，对江苏小城镇的调查并不能结束，过去

的调查只是第一阶段的摸索。为了全面地认识江苏全省小城镇的面貌，以便与上述地区的经济模式作比较，我们将迈开双脚，越过长江、淮河，对徐(州)、连(云港)、淮(阴)、盐(城)、扬(州)五市的小城镇进行考察。我们希望我们的探索能有助于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开展。

小城镇 苏北初探

1983年12月结束苏南四市小城镇调查时，我们决定“烟花三月下扬州”，到苏北继续江苏小城镇调查研究工作。我们一行于1984年4月21日到达徐州市（农历3月即公历4月）。按照江苏省委的建议，访问了苏北的徐州、连云港、盐城、淮阴、扬州五市。行程三千华里，途经20个县，停留访问9个县、两个集市、9个乡镇企业，1个港口和1个水利枢纽，5月10日在南京集中，共20天。时间短促，所以只是“走马看花”，为苏北调查做了初步的探路工作。但由于课题组先期出发，配合各市的研究人员，预先进行了探索，我们每到一地均能取得较有系统的调查资料。经过和当地各级有工作经验的负责同志共同讨论和选择重点进行观察后，使我们对苏北情况有了一些概念。在这个基础上对下一步调查工作的定点、定题、定人、定期、定质作出了规划。我们对江苏省委的支持，各市领导及工作同志的密切协作，表示由

衷的感谢。

(一)

“苏北”作为一个区域的概念并不是很明确的。如果用长江为界把江苏省划为南北两区，长江以北除了徐、连、盐、淮、扬五市以外，还有南通一市、南京市的六合、江浦两县和市区的一部分。但是现在通用的概念苏北却只指上述五市。我们去年访问“苏南”包括了苏、锡、常、通四市，也和地理概念有别。把地处长江之北的南通市和长江以南的苏、锡、常三市并提作为一个区域，是从它们经济发展上的共同性来说的。有人把这四市列入上海经济区，我们基本上也同意这个观点。但是如果深入一层看去，南通市的北部，包括海安和如东两县，实际上受到上海市经济辐射已很薄弱；常州市西部的金坛、溧阳两县，无锡市的宜兴县亦复如是。我们曾粗略计算，上海经济区大体只包括以该市为中心周围150公里的地区。

江苏省内经济发展区域的划分，迄今还没有一致的看法。我倾向于同意在苏南、苏北之间还得划一个苏中区，把扬州市的沿江一部分和镇江、南京两市合成一块，甚至包括南通市的西部及北部在内。不论是两分法或三分法，提出这个问题是有益的，因为我们感觉到江苏省内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各有特点的经济发展区域应当在各方面作出区别对待。但是目前调查工作还不足以提供解决这个问题所必需的根据。我们这次调查不包括上述“苏中”地区在内，所以本

篇所讲的“苏北”实际上是以上述三分法为范围的。

我回想我自己，长久以来对苏南和苏北的区别就存在着许多不符合实际的错误看法。在我的头脑里还保留着一种早期流行的对苏北的偏见。那就是把苏北看成一个贫穷落后没有前途的苦地方。这种偏见其实只反映了解放前近百年的历史，既与长期的历史不符，也和当前的情况不合。

苏北这个地区经济落后，民不聊生，只是解放前近一百多年甚至更短的时期以来的情况。在帝国主义入侵我国之前这地区曾经是个经济繁荣的地区。我这次访问中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这地区在明清两代出了那么多民间喜爱的文学巨著的作者。在淮安我们走访了《西游记》作者吴承恩（1500—1582）故居，在连云港游览了传说中孙悟空“王国”里的花果山。我们到了《水浒》作家施耐庵（元末明初）的故乡兴化，但限于时间没有去拜谒他的墓门。在赣榆听到人们说这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1701—1754）幼年读书的地方。在连云港南的板浦镇休息时，又听说这就是《镜花缘》作者李汝珍（1763—1830）著书之地。更不用提兴化的郑板桥（1693—1765）了，他的狭小的书斋还保存着他的珍贵手迹，历劫未毁，真是人间幸事。十六世纪以来，文人荟萃于这个地域，决不是偶然的。古人说“人杰地灵”，用现在的话来说，必有其物质基础，就是以繁荣的经济作为底子的。

用这个作引子，我们不难看到，苏北的盛衰实倚于运河的兴废和黄河的通塞。京杭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曾经

从徐州到扬州畅通苏北全境。在徐州还可以看到原是流经这里奔腾入海的黄河的旧道。现在盐城附近的上崗乡，宋天圣年间（1023—1031）范仲淹出任盐官时，在此筑堤以防海啸。这条被称作范公堤的就是现在通榆公路的基础。可见当时的运河东离大海只不过八十公里，其间以运河和黄河为主干，河道纵横，构成了有如今日江南的水网地区。扬州在唐代是个对外贸易的海港，后来又一直是中原广大人民日用必需品食盐的集散中心。具有地理上如此的优势，真是一片繁华胜地，难怪十年梦醒的诗人念念不忘的还是此间二十四桥的明月。

徐淮地区经济的繁荣，依靠着运河这条南北交通运输的动脉。尽管元明之际，黄河一再决口，屡使运河淤塞，但是历代建都在北京的中央政权总是不能容许这条动脉中断的。直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距今一百六十年，部分漕运改用海道，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运河运输才南北断航。这时帝国主义已入侵我国，内忧外患，不断发生，加上1911年津浦铁路通车，这个在南北经济联系上已失去关键地位的苏北地区，随着水利失修，灾害连年，日益衰落。在解放前的近百年中，苏北人民悲惨的处境形成了至今还存在于一般人们印象中贫穷落后的面貌。

苏北地区在解放前由于地理及历史的原因，经济上和苏南相比的确显得贫穷落后了。解放以后，苏北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从治淮工程开始大兴水利，改善了灾祸连年的局面。三十多年来，共挖土172亿方，基本上建成了以京杭运

河和灌溉总渠为主干的灌溉和防洪、防滞、防旱、防渍、防潮基本配套的工程体系，使苏北农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被称为洪水走廊的淮河两岸，低洼多涝的里下河沤田，经过治理都成了一年两熟、甚至三熟的丰收田。三中全会后实行了联产责任制，农民的积极性爆发出来。近三、四年亩产赶上甚至超过了苏南出产稻米有名的苏州地区，过去的“逃荒区”已经成了现在的“商品粮基地”。淮海平原的“锅底”兴化县粮食年产达到20亿斤以上，创造了江苏省的最高纪录。徐州到连云港过去是黄河古道，一片盐碱，现在用水压碱，广种水稻，取得了丰收。不仅不再需要返销粮，反而有大批余粮接济山东的产棉区，协助了邻省的经济开发。

苏北五市由于土地面积广于苏南，解放初期粮食总产就高于苏南，但人均占有水平仍较苏南为低：1975年苏南是718斤，苏北是662斤。1983年苏北粮食总产已达381亿斤，比1978年翻了一番，人均占有达1352斤，超过了苏南。经济上苏北在江苏省的地位已经起了极大的变化。它和苏南相比，概括地说，在人口、耕地、粮食、棉花、油料上都是六四开（北六南四），农业产值各占一半，但是工业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只是三七开（北三南七），乡村工业和财政收入上是二八开（北二南八）。①

① 这里所引用的资料中，南北对比是以全省两分法为依据的。即苏北包括徐州、连云港、盐城、淮阴、扬州等五市，苏南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及南京、镇江等六市。

1983年苏北五市在江苏全省的比重（南通市划入苏南计算）：

人口	3470万人	56.6%	农业产值	132亿元	51.9%
耕地	4490万亩	64.7%	工农业总产值	293亿元	35.5%
粮食	381亿斤	62.4%	工业产值	160亿元	28.2%
棉花	802万担	60.5%	乡村(社队)工业	42亿元	26%
油料	900万担	61%	财政收入	17亿元	23.8%

上述数字表明了苏北五市在粮、棉、油产量以及农业产值上的绝对数字已超过苏南，但是由于工业，特别是乡村（社队）工业发展较慢，所以在工农业总产值上比苏南落后了相当大的一截。这是目前苏北五市经济的基本情况。总的说来，由于水利建设的成就和实行了联产责任制，苏北农业大发展，根本改变了一百多年来贫穷落后的面貌，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具备了进一步大发展的条件。

继续把苏北看成是个贫穷的落后地区显然是错误的了。而且应当看到它的潜力大、后劲足，在农业上的优势已经表现出来。北部的煤矿是江苏能源供应地，不断发现的如水晶这类珍贵的矿藏还是今后尖端工业的必需品，正在钻探中的淮海油田频传喜讯，加上东海沿岸广阔的滩涂，大可开发，所以从发展的前途来说，苏北完全有可能后来居上。

(二)

苏北不仅和苏南有所区别，它本身各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上也存在着不同的水平，而且由于自然及历史条件的差

异，各地区也各有其特点。我们从研究小城镇的角度来观察苏北各地区之间的差别，首先看到江苏省测绘局编制的《江苏省地图》（1：100万）上，在徐州市和淮阴市范围内所有的地名中带上“集”字的特别多，凡是带集字的地名多的地区，很少带镇字的地名。带镇字的地名多的地区，如连云港、盐城、扬州等市，带集字的地名就比较少，甚至没有。如果这两类地名确是表明经济发展上不同的实体，那也就使我们看出苏北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了。因此，我们不得不追问一下集和镇、或者说集市和集镇，区别何在？

集市可能是人们很早就有的商品流通的场所。在我国确是古已有之。《康熙字典》在“市”字下引《说文》：“买卖所之也”。引《易系辞》：“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引《周礼地官》：“五十里有市”，又“大市，日昃而市，百姓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这些解释不仅说明了古代商品流通的方式，而且也说明了现在我们还看得到的集市的基本情况。

在最基层的贸易场所的集市上活动的主要是散居在农村里的生产者。他们带了一些自己消费不了的农业或手工业产品到这里来出售，卖到了钱就在这里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这是接近原始性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换，货币过一过手，只作为计算的媒介来使用。

这些进行买卖活动的人，一清早从住处来到集市上，当天还要回到住处，所以在以步行肩挑为主的时代，赶同一个

集市的人们不容易超过半径25华里的范围，所以说“五十里有市”。住得离集市最远的人走到市上大约已到中午，所以中午时市上集中的人数最多。苏北一带人们称市为集，也许就指很多人会集在这地方的意思。“集”字是指杂、众、聚、会。（见《康熙字典》）。辰即中，“日中为市”。这时市场上的人，为数最多的是想来进行交易的生产者，所以说“百姓为主”。在早上已经在市上等待顾客，不是从村子里走来的人，他们常是那些专门以交易为职业的人，称为“商贾”。现在的集市上就可以见到一些商人很早就在街道两旁摆摊子，等候顾客。到了夕阳西下，有些带了货物想出售的农民，如果尚未成交，而又不想把货物再背回家，就会宁愿低价出售。这时就出现了一种收购货物，储存到下一个或另一个集市去出售的人，这些人就是“贩夫贩妇”。我们的古书能为集市作出这样具体的分析，说明了我国很早就有这种集市了。

这种集市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我在抗战时期住在云南昆明南面呈贡县城附近的农村里。在县城外，离我们住的村子有二十分钟步行的距离，有个龙街（苏北称集，云南称街），平时只有一座庙和几十户人家。每隔六天，到了街期，四面八方的各族人民都来赶街，有上万的人，摩肩擦踵，热闹异常。

这次为了要了解集市，我们特地到沛县的敬安集和睢宁县的大李集去参观。这两个集比呈贡的龙街发达得多。在市集的街道两旁有百货商店，这些商店是每天都营业的，只是

赶集那天顾客特别拥挤。街上有许多临时的摊贩，出售衣衫布匹和各种百货，摆摊子的都是领有执照的个体商人。街道两旁还有许多用木板或铁皮构成、容得一个人坐在里面工作、不用时可以加锁关闭的小亭子，坐在亭子里的人大多是因为修理钟表、收音机等新兴的服务行业人员。传统的理发和修理农具的铁匠，有的已有店面，也有摆摊子的。整个集市还划分若干专门出售某种货物的分场。各分场里，街道两旁分别有许许多多面前放着几篮鸡蛋或是几袋粮食、一堆蔬菜的“老百姓”，即农村里来出售自己产品的农民。在人数上说，以这种自售产品的农民为最多。但是营业额却是百货商店领先。我们曾去参观过的这些大集，据估计生产者直接出售的贸易额只占集市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这种集市和呈贡的龙街已有所不同。这里有日常营业的商店进行交易，只是逢到集期才有摊贩和农民间的贸易活动，而龙街不到街期，除了供应街上居民零售的小店外可说是没有贸易活动的。

我们所参观的大李集是苏北有名的大集，这个地名在中学用的地图上也找得到。它原有“小南京”之称，正处在睢宁县和安徽省的交界上，赶集的人很多是越省而来的。集上常住居民有8500人，赶集的人数一般在二万到三万间，到春季大集时，可达到十万人，山东、河南都有人来。平时每十天赶四个集，每集成交的营业额少则二十万元，多则四十万元。有九个分场：猪羊、牛马、粮食、木材、肉、蛋、小百货、蔬菜、柴。在摊子上和商店里有来自上海和苏南各城市

的产品。有十多个理发店，还有六家小旅馆和四个浴室。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货栈。贩运看来还只限于小量的个体活动。商贩们从这个集市上买了东西到另一个地方的集市卖出，在差价中获利，实际上是取得运输上所花的劳动报酬。

象大李集那样的大集，在苏北有多少，我们还不清楚。以徐州所属六县来说，据我们得到的资料，大小集市共有286个：赶集人数超过二万的有12个，超过一万的有43个，超过五千的有65个，在五千以下的有166个。在“文革”期间，这些集市都受到过打击。但是农民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他们之间互通有无的活动是取缔不了的，所以当时尽管街头站岗拦阻，摊贩被驱散，但是其实只是把集市分散和改变场所罢了。当然，这种打击对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为害严重。

在苏南的常州、无锡、苏州三市已经看不到这种形式的集市了。如果进行比较和分析，也可以看到在苏南，农民到市场上直接向消费者出售自己生产的商品的活动，这几年来已有所恢复，即所谓“农贸市场”。但是一般只有清晨的早市，七、八点钟已经收市了。这种活动在市民副食品的供应上尽管起着作用，在整个商品流动中并不重要。而且农贸市场一般是经常性的，而集市是间隔几天才有一次。

还应当指出，这种集市在苏北说，也不是普遍的。我们到盐城和淮阴探问过这些地区有关集市的情况。我们得到的答复是在灌溉总渠以北各县一般都赶集，但是渠南各县，即使也有赶集的，重要性已不大，因为以经常营业的商店为主构成的农村商品流动中心的小集镇已经比较多。

我们对苏北各县集市的调查正在进行中，对上述的说法还没有核实。我们只在江苏省测绘局编制的江苏省地图上把以集为名的地点（可能是一些大集，至于小集在这种地图上是查不到的）计算了一下：在灌溉总渠以北的地区共77处，渠南共15处。其中最密集的，即有10处集以上的有睢宁、淮阴；5处集以上的有铜山、宿迁、沐阳、涟水。在地图上都没有带着集字的地名的县有：连云港市的赣榆、东海、灌云，盐城市的射阳、建湖、大丰、东台，淮阴市的盱眙，扬州市的江都、兴化、泰县、泰兴、靖江。这个统计并不能充分反映集市分布情况，因为有些集市没有上地图，有些以集为名的地方现在不一定有集市。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从地名分布上看到的情况和当地干部给我们的答复是相符合的。大体说来，以灌溉总渠为界，渠北多集市，而渠南较少，规模较小。集市少和小却并不反映商品流动活动较少，相反的，却反映了这个地区已经有较多的以经常营业的商店为主构成的作为农村商品流通中心的小集镇了。从地图上看，集市少的也正是集镇较多的地区。

我们也许可以把集市看成是集镇的前期形式。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中集市可能逐步成长为集镇。集市上的贸易活动可以说是初级的，在发展上看是比较落后的，而且反映了农村经济不发达，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集市上，我们看到那么成千上万的人，熙熙攘攘，挤来挤去，为了出卖几十个鸡蛋，几百斤粮食，走上几十里路，在集上蹲上半天，热闹一番，浪费的时间实在不少。如果农村里活路多了，谁

还会愿意整天向集上去跑呢？

但是在苏北的北部，集市对农民的吸引力目前还是很大。有首民谣说：“集市象块吸铁石，吸着农民去赶集。手里扶着犁，心里想着集。身在地里干，心在集上转。赶了东集赶西集，一天到晚忙赶集。东集买、西集卖，一天能赚七八块。”对商贩有成见的人，可能对这民谣有反感，但是我们却看到了集市在商品流动中的重要性和当前农村经济繁荣后农民对商品流动的迫切要求。如果对流通渠道不加疏通和提高，大量劳动力作为个体商贩被吸收到贸易活动中去是势所难免的。至于在这个地区里，怎样促进集镇的发展来代替或部分代替这种集市形式的贸易活动，正是值得我们注意研究的课题。

集市分布的不平衡启发了我对苏北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研究兴趣。从集市的分布上，我们看到苏北的东北和西南两部分存在着集市和集镇数量上的区别，我们接着看到这种区别同样反映在各市经济结构中工农的比重上。简单和笼统地说：徐州各县是农七工三；连云港市各县和盐城市灌渠总渠以北各县是农六工四；盐城市渠南各县是农五点五工四点五；淮阴市也要分南北两部分，北部可能近于徐州市各县，南部如淮安县是农六工四，近于盐城渠南各县。扬州市里下河各县情况与盐城南部各县同，或农工相等，不相上下，有局部地区工业略高于农业。但是通扬运河以南各县都已是农四工六，在产值上工业超过了农业，接近苏南水平。各县工农比重的具体数字还待汇综。但是大体可以说，工业比重以

西北部为最低，向东南方逐步上升，但在灌溉总渠以北工业一般低于农业，到了里下河地区工业才相等于或略高于农业，要过了通扬运河工业才胜过农业。

根据这些材料，我们是否可以初步把苏北划成西北和东南两部分，这两部分的界线并不能划得很具体。大体说来西北部包括徐州市和淮阴市在灌溉总渠以北的地区；东南部包括连云港市、盐城市、淮阴市南部和扬州市在通扬运河以北的地区。至于通扬运河以南的地区，我倾向于把它和南京市、镇江市划在一起，作为苏中区，也就是上述的三分法：苏北、苏中、苏南。这些是从当前经济发展的总面貌来划分的区域，不同于一般经济区域的概念，因为这只是从几项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指标来衡量的。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上面所用的一地总产值中农工的比例以及集镇发达的水平。我们正在按这个要求制定一些可比性的统计指标，以备进一步在江苏用问卷调查法进行一次宏观的普查。必须指出，从这些指标统计显示出来的区域差别并不是长期不变的，而必然会随着各地不同发展速率而改变，所以与一般地理学上的经济区划是不同的。我们这项研究的用处在于帮助在建设过程中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

(三)

我们这次调查访问的路线是从徐州进入苏北境内，向东到连云港，折南入盐城，转西去淮阴，然后南下扬州。时间是北多于南，形成了前松后紧，到扬州市区已快到期限，又

需要花几天时间进行讨论，以至没有去访问洪泽湖周围各县。所以在总结这次“探路”工作时，这一部分的情况几乎是空白的，只能有待今后的补课了。下面我想以我们的旅程为序，把所见的情况和问题作初步的提示。有些问题是我们在一地看到的，很可能其他地区同样存在，我们所掌握的有限资料还不够作出概括性的叙述。由于这不是苏北全面的调查报告，所以各区的详略也不等，看得多一些的就写得多一些。

徐州市本来是一个省属市，体制改革中，附近6个县划归徐州市领导，这个地区实际上是淮海平原的一部分，徐州市区本身是这个平原东部的一个重要经济中心。至今尽管有种种行政区划上的限制，它和山东南部，安徽北部，甚至河南东部经济上联系还是相当深。据说，解放初期由徐州百货二级站供应商品的区域有四省44个县，现在还有跨省界的二十多个县，两千多万人口（徐州市六县共690万人）。这个区域的社会经济特点，比如上面讲的集市多、集镇少，可能是这一部分黄淮海平原的一般情况。

徐州市区是一个拥有78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在交通和资源上都具有突出的优势。贯通南北的津浦铁路（1908—1911年通车）和贯通东西的陇海铁路（东段1921—1925年通车）就在这里交叉。在资源上它以“江苏的煤都”出名。有煤就有电，徐州电厂的发电能力达80万千瓦。在此基础上解放后发展了钢铁、水泥、机械、化工、纺织等工业，总产值1980年超过了20亿。我们在事前期望能看到这样一个中等城市，

在其所属各县起着推进乡镇工业的作用。

我们到徐州后不久就去附近各县访问。我们在公路上走了很久也看不到烟囱，大概要走60—70公里，看到烟囱时，几乎必然是县城所在地。我们询问这个地区有多少个“镇”时，每个县几乎都说只有县城这一个镇。我就诙谐地说：如果苏南吴江县自称在集镇上是“多子女”，那么这个地区一县一镇可说是“独生子女”了。这些“独生子女”的县镇在三中全会后确是已经面貌一新，乡镇工业也有了发展。比如丰县的裘皮机械厂，沛县的毛纺厂，睢宁的棉纺厂，去年产值均达到300万元。但是一出县城，我们从公路两侧所见到的来说，除了一些烧石灰或砖瓦的窑厂外，很少见到工厂。因此，徐州市市区之外各县的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0%（加上徐州市区的工业，占61.8%），而其中一半以上是食品（30%）、农产品加工（14%）和建材业（7.8%）。这种情况不能不使我们对徐州这个“煤都”应起的作用有点失望了。为什么这样一个能源丰富，交通又这样发达的城市却没有把工业扩散到四周农村里而象苏南那样发展乡镇工业呢？

我在《小城镇，再探索》中强调了上海和其附近中等城市对乡镇工业所起的作用，而这里却并不如此。这是为什么呢？经过和当地干部讨论，初步的看法是徐州这个煤都主要是采掘工业，劳力重于技术。徐州的制造业是解放以后才开始的，1949年工业总产值只有四千万元。解放后，由于苏南工业发展，需要能源，徐州的煤矿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经

济恢复的五年里，年产量就提高了一倍，现在年产量达1200万吨。采煤的技术却还是着重在体力劳动。全市职工从解放时的5万人增加到现在的39万多人，其中固然包括新兴的其他工业，但主要是煤矿职工。这就表明徐州的工业在性质上和上海及其附近中等城市不同。徐州的采掘工业比重较大，一般只提供原料，不进行加工。在技术上带不动附近的乡镇工业。

另一方面，徐州地区的农村经济以往一直是以农业为主，缺乏家庭工业的传统。在过去又长期在“以粮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农村没有发展工业，直到目前为止，农村工业还刚刚起步。三中全会后实行了联产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在这五年内，农业翻了身，1978年至1983年，粮食总产从34亿斤增加到73亿斤，棉花由56万担增加到146万担。皮棉单产平均141斤，居全省第一。所以这个地区农村的变化是农业的发展所带来的，主要的变化也是农民的生活基本需要得到了解决。过去吃的是山芋干，现在吃的是大米、白面。至今他们还是用“大米饭、白面馍、山芋干子换酒喝”的话来表达他们对新局面的颂扬。温饱问题是解决了，人均分配却还在250元（1983年）的水平上，一般说来，还谈不上是富裕起来了。这种情况基本上是适合于苏北的西北地区的。

联产责任制的落实，农民从大锅饭中松绑出来，苏北的农民和苏南的农民一样，都发现每家有多余的劳动力可以利用来增加收入，但是怎样去利用，找什么活路却各地不同，那

是受地理、历史等条件所制约的。一般说来，在苏北象苏南一样从小型工业里找出路的农民比较少，他们主要是搞副业，和搞农业延伸出来的如碾米、酿酒等农产品加工业，以及其他为农民服务的如烧石灰、砖瓦等非农业生产活动。当然，在近一两年来，各地区都出现了一些类似苏南的制造业性质的小型企业，但还没有取得主要的地位。

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到我们在徐州市丰县见到的劳动输出的情况，这可以说是江苏省日益发展的活动。徐州全市现在已有一万三千人有组织地出外承包建筑的劳动队伍。当地称劳动输出为“不冒烟，挣大钱的工厂”。他们每年春季出外，入冬回乡；一个普通工人可以带回一千多元的工资，技工为二千到三千元，从全市来看，分到各家的收入总数有几千万元。

搞劳务输出在江苏并不限于徐州，也不限于苏北，全省去年据说有一百万人的建筑队伍在全国各地活动；南到深圳，北到黑龙江的大庆，西到新疆的克拉玛依和西藏的阿里。他们以质量高、速度快、成本低、不拿公家东西而受到当地的欢迎。去年我在南通和沙洲调查时已经听到劳动输出这件事，而且听说南通一市的外出包工的建筑队伍挣回了上亿元的收入。这在当前江苏农村经济中是一笔重要的收入，不仅改善了农民生活，而且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是乡镇工业赖以发展的原始积累的一部分。

这次我们在丰县遇到了一位在徐州地区来说最早组织建筑队外出的领班人，他原是地委的干部，“文革”期间被下

放到丰县。丰县是他的家乡，家乡的领导干部让他搞建筑站。当时两派正在打派仗，他在家乡还是呆不住，就把队伍拉了出去。到辽河油田承包国家的建筑工程。他有组织能力和才干，加上能吃苦耐劳的苏北农民，很快掌握了建筑技术，并打出了牌子。从几百人开始，几年里队伍扩大到几千人，现在已有上万人。他自己虽则已经回到市委做领导工作，但是这个建筑队伍越来越壮大和活跃了。

把队伍拉到外地离乡背井地去搞劳动，在徐州来说是象他这样的同志创始的，但是这项办法却有它的传统基础。正因为如此所以其他地方也不约而同地在搞性质一样的劳动输出。苏北这个地方历来就有外出找活的传统。过去这里是多灾多难的苦地方，自从水利失修，连年灾荒，几乎每年要发生“就食江南”的人口流动。每逢大水来临，农民们就用泥土封了门，全家外出逃荒。有些地方，如里下河地区，在大水时节，全村可以空无一人。这些逃荒的人，如果在外地找到了活路，也就不再回乡了。在我幼年时，苏南太湖边新涨的土地上每年都有这种难民住下垦荒。太湖水涨，淹没了他们的土地，又得到城里来讨乞，甚至劫食，成为我家乡一件无可奈何的烦恼。更多的难民是到城市里去卖苦力。解放前上海工资最低、劳动最重的苦活主要是由苏北逃荒出来的人负担的。很多是被榨尽了血汗，客死异乡；也有站住了脚跟，成了都市里的下层居民。据说现在上海一千万居民中至少有一百万人的祖籍是在盐阜地区。他们过去聚居在杨树浦和闸北的贫民窟里。另外，扬州的“三把刀”（理发、修脚、厨

师)几乎包办了这几行在过去是微贱的服务专业，不仅全国甚至国外的侨区，都有他们的地盘。

现在的“劳动输出”虽则可以溯源于早年的逃荒和走码头，但本质上已起了变化。现在是有组织、有领导、有专业、为人民服务的劳动队伍。这种劳动队伍对其他地区，特别对边疆地区的建设作出贡献，是一项社会主义的新事业，实际上是技术和劳力支边。对于江苏这样人口过密的地区，有计划地输出劳动，尽管户口不迁，正是减轻人口压力的一个积极的办法。

我在前年曾发表过“做活人口这盘棋”一文，提出了要做活我国人口这盘棋需要做两个棋眼：一是发展内地的小城镇这种人口蓄水库，一是疏散人口到地广人稀的边区去开发那里丰富的资源。这次我看到了离乡不背井的劳动输出，深深感到这正是把两眼联通的一着重要的棋子。因为这种不落户而为当地建设服务的劳动队伍，正是民族地区欢迎的人口流动的形式。现在还只限于建筑业一行，还将逐步推广到其他行业和其他建设事业，并由短期的流动发展到较长期的流动。一旦队伍大了，人数多了，不是同样会起平衡人口分布的作用么？新的事物一旦发生，如果符合客观的需要，必然会茁壮成长，蔚成大业的。

(四)

从徐州市，我们东行入连云港市境。连云港市除市区外有三个县。这三个县都不是一县一镇，而是一县多镇了。

东海县的县城在牛山镇（一万五千人），西有桃林镇*（一万人），赣榆县的县城在青口镇（二万二千人），东有海头镇*（一万人），南有沙河镇*（一万一千人）。灌云县的县城在伊山镇（三万六千人），北有板浦镇（一万二千人），东有徐圩镇及扬集镇（七千人）。连云港市府所在地新海区（二十三万人）外，北有猴嘴镇，南有南城镇（六千人）。除了县镇之外，上面这些镇都没有建制，因为据当地的干部说，没有建镇的原因是想取得税率的优惠（现在对乡镇工业的优惠税率已经取消）。事实上一般都承认这些地方都是“镇”。在我们所用的地图（1：100万）上，许多就在地名后有镇字。凡是地图上不加镇字，而在当地政府给我们的材料上称“镇”的，我们在上述地名后都加上*号。

徐州市的一县一镇，连云港市的一县多镇；在地名上徐州市范围内没有“镇”，连云港市范围内没有“集”，这些明显的对照固然值得注意，但是实际上的区别并不是那样绝对。我在叙述集市时已说过，比较大的集市上都有经常营业的商店，而且很多前门是店，后门是田，亦农亦商，集上有多少非农业人口不易计算。一到赶集的日子，就有许多本街道和附近各村来的人在街道两旁摆摊子，出卖批发来的货物，他们只是间断性的临时商人。还有许多农民背着自己生产的鸡蛋、蔬菜等等到集上来出卖，卖得了钱，就在集上买他们所要的东西回家，他们还不够格称作“商人”，只是进行交换的生产者，在徐州一带的集市上后面那两种人比较多，固定的商店比较少，也许就因此称集不称镇。

在连云港市东海县的桃林镇和赣榆县的沙河镇平时有比较多的商店和工厂经常营业。桃林街上有二十多家企业，其中三家是有名的酿酒厂，还有四十几家商店；沙河街上有针织厂，面粉厂和大小商店。但是一到赶集的日子，四方客商，蜂拥而至，赶集的人平时在二万人以上，春节和会期（指传统的集市大会，有些地方称庙会，一年有好几次）多至五万人。如果在赶集日子去参观，它们和睢宁县的大李集并没有多大不同；但不在赶集的日子，大李集的面貌就不如桃林和沙河了。所以“集”和“镇”的差别在苏北主要是集期从间隔到连续，营业从临时到经常，门面从摊子到商铺的变化。由于商店多了，天天有贸易活动，象桃林和沙河那些地方一般就被称“镇”了。在苏北被称为镇的地方一般依旧是赶集的地方，每逢集期四乡来的人就多。人数尽管多，但生产者之间交换性质的贸易额却比较少。只是在一些赶集人数在几千人的小集市上，商店和摊子少，生产者之间的交易在比重上才多些。这类小集民间称作“青菜集”或“草鞋集”等。看来，集市必须分大小和层次。商店、摊贩的营业额的增长和集市的大小相关，最后也就成了“集镇”。

我们这次到苏北访问，正当各县市领导干部开会传达贯彻今年1号和4号文件，宣传提高农村商品生产，积极发展集镇的战略方针。同时干部和群众都听到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智不进”这句话。因之，当时已不是要不要搞乡镇工业，要不要发展集镇的问题，而是搞什么工业和怎样建镇的问题了。

在建镇问题上，我们感觉到有些人似乎还认为只要在原来的集市上设立些行政机构和挂上一个新牌名就可以了。事实并不这样简单，所以有必要把集（市）和（集）镇的区别再着重说一说。我们认为只有在农村相当高水平的商品生产基础上才能形成名符其实的镇。而高水平的商品生产单是靠农业是不容易达到的，还必须发展乡镇工业，苏南有镇无集可能和很早就有生产商品的农村手工业有关，而近年来乡镇工业的发展更使集镇兴旺了起来。农村传统工业不发达的苏北，单纯依靠农业商品生产的地方，集市已经足以适应商品流通的需要，甚至集市还处于一定的优势，所以集镇也就不易发展。工业的商品生产与农业的商品生产不同，不仅需要出售产品的市场，还需要产前原料的供应和产中的种种服务，乡镇工业的经营更大程度地依赖于作为农村经济中心的集镇。这样看来，苏北要建镇还有待于乡镇工业的兴起和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商品化，也就是说，建镇包含着在原有集市上进一步发展乡镇工业。

苏北的农民温饱问题还刚得到解决，只有很小一部分农民开始富了起来。温饱靠农业，富裕靠副业和工业。乡镇工业上苏北比苏南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在上面已说过，据当地干部的估计徐州市区的工矿业除外，郊区和六县的工农业产值上的比例还是三七开，而连云港的工业比重略高，大约是四六开。这种估计和我们在东海、赣榆所参观的几个集镇的印象是符合的。但是还没有用统计资料来核实。徐州市原是省属市，统计数字和所属各县容易划开，而连云港市区本

身据说是三个镇联合构成，至今在地区上还是不相联接的。哪些企业应当划归乡镇工业还不那么清楚。如果只从所有制上着眼，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一共一千零二个（占企业总数80%），而产值只有3.8亿元（占全市工业产值总数28%）。我们知道有一个时期，集体企业办得好了就会收归全民所有，所以单从所有制来划分也不能真正反映乡镇工业的比重。这些问题将留待进一步研究。

从现有资料来看，乡镇工业在苏北还是不发达的，只有扬州去年产值超过20亿元（其中大部分应划归苏中区），其他各市都不到10亿元，盐城7.9亿元，淮阴4.3亿元，徐州是5.3亿元，连云港如果以2.8亿元计算，是居末位，但是以地区来说，面积最小，只包括三个县，相当于淮阴市的四分之一。大体说来苏北一个市的乡镇工业，产值上只相当于苏南四市里的一个县。这是因为苏北的乡镇工业起步比苏南迟，在今年1号和4号文件下达之前，乡镇工业一般说来还没有被认真作为发展方向来对待。

由于起步迟，乡镇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基础较差。当农民吃饱穿暖要求富裕的时刻，国家的政策已在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鼓励专业户的发展。这种历史条件和乡镇工业起步早的苏南就有所不同。苏南乡镇工业是在公社制度下起步的。公社、生产大队以及生产队作为集体单位办工业，资金是集体积累，经营和分配由社队领导，经过了五、六年甚至更长的时期，社队的集体经济实体大多已经巩固和壮大，底子比较结实。

苏北乡镇工业起步迟，联产责任制落实得早，个体专业户发展得快，因此，我们很想知道专业户对发展乡镇工业所起的作用。那些在苏南早期就由集体经营的企业，在苏北是否将先由专业户或经济联合体开始经营，其后又将怎样发展成地方性的集体或超越地方的同业性的集体企业？这些问题还有待今后加以观察和研究，现在还只看到一些苗头。

据赣榆县提供的资料，今年该县专业户近六万户，经济联合体1087个，发展相当快。赣榆县委1984年3月编了一本《勤劳致富一百例》提供了该县自从三中全会以来“两户”的109个具体例子，其中工业（修理、农具、加工、建筑材料、采掘）42例，商业运输10例，养殖28例，种植27例。可见这些专业户和重点户主要还是经营家庭副业，养猪，养鸡。种菜，种果树的能手，一面兼种口粮田，一面发展专长，收入近万。其中带有集体性质的有一户养鸡专家，除自家养鸡外，建立了47家联系户，给他们技术指导和提供雏鸡。还有一例是4家共同承包一条小渔船，出海捞捕，按劳分配。在工业方面组织形式比较多样。最多的是个体户单独开办或承包一个企业，如烧窑、修理、箍桶等小作坊。也有一例是9个人向集体共同承包一个农机修理厂，由集体拨给厂房和工具，每年上交定额利润。还有一些由个人承包，招收职工，付工资的例子，如耐火材料厂，塑料厂，柳编厂，磷肥厂，翻砂厂等，其中雇工最多的达十五人。以赣榆县现在的情况看，从个体专业户发展到集体企业还有一段距离。

我们在赣榆县参观一个个体户集资联合办的百货商店，

这个商店里的职工，入店时都得交一笔款作为投资，工作期间除工资外享受利润分红。据说这种方式集资快，并解决青年就业问题，能为农民接受。人们说，现在农民手上钱多了，为了孩子花一笔钱找个事做，都愿意。这种个体户联合体看来正在增加。据说全县已有375个这类的企业，资金270万元，参加约有2000多人。

从个体经营发展到集体联营的例子，我们是在徐州市丰县听到的，也不妨插在这里一提。丰县的单楼乡许庙村，有家姓董的兄弟几家合起来有32口人，制造镜框条，畅销京、津、宁、鲁、豫等省市，人均收入二千元。今年和县供销社搞联合体，由社提供县城里的厂房和营业所，配备会计和营业员，投资三万元，供应原料，以后利润按协定比例分红。

我们看到苏北地区农业丰收，农民手上有钱了，而且又听说由于劳动输出，每年有几千万元流入农村。由于考虑到发展乡镇工业需要积累资金，因而想知道分散在千家万户的钱农民是怎样花的？苏南乡镇工业是集体企业，得到的利润首先积累作再生产之用，然后通过工资和集体分配流到农民手上。农民拿到钱首先改善生活，从吃、穿已经进入到住的领域。盖新房子，一层改两层，这几年苏南农村里盛极一时。在苏北，吃穿的问题刚刚解决，房子也开始更新，从土墙茅屋，逐步转向砖墙瓦顶改造，但速度似乎不那么快，有些地方旧的草房还占一半，有些房子的茅草屋顶，只在四周换上一圈瓦片。农民的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我们在赣榆公路上看到五、六辆带拖斗的手扶拖拉机—

连串、一连串地前进，印象很深。询问之下，知道这些都是今年农民新添置的生产资料。据说今年1月以来这个县的农民已买了汽车50辆，船300条（共850吨），拖拉机850台，折合成本有二、三百万元，表明了农民投资再生产的积极性是很高的。当前运输是热门，赣榆几家自备汽车搞运输的都成了万元户。农民迫切要买汽车，搞运输，反映了运输工具的供应远远赶不上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都是个体户的投资，用来发展专业的。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了当前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的积累和使用的问题。以苏南来说，这五年多来农村经济建设基本上已做到自给，不像以往那样要向国家伸手了，而且目前农村积累的资金已有的向城市投资，这是一个新的苗头。苏南农村之所以能达到这样发达的水平，在我们看来，是由于苏南在农业的原始积累的基础上，通过公社、生产队等各级集体经济实体，自己投资创办了工业；工业里累积的资金除一部分分给社员，实际上是以工补农，扣一部分支持各级社区的公共建设和公益事业外，都用来作再生产的资金。这是通过集体渠道的积累方式，效力是比较高的。

现在苏北，如上所述，这几年中农村的发展主要靠个体农民、专业户、经济联合体以及劳力输出得来的报酬，这些生产和服务所积累的资金分散在千家万户。从什么渠道能把这些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使其成为发展工业的资金呢？银行储蓄固然是一个已有的渠道，但这个渠道能在农村里吸收的储蓄额，有人估计不会超过农民手上可以用来投资再生产

的一半。还有一半怎样办呢？上面我们已提到农村中已在实行“带股金进厂”的集资办法。这种办法实际上已包含了“股票”的性质，只是不能转手的股份。是不是有地方还有更灵活的措施而出现一种新型的股份企业呢？我们将拭目以待。

(五)

从连云港我们南下到盐城。盐城这块地方是多少年来黄河和淮河下游沉沙淤积而成的。由于东临大海，所以自古就是产盐之区，汉代即在这里设置盐官。现在盐城市的行政区域里除市区外还有七个县。在灌溉总渠以北的三县：阜宁、响水、滨海和淮阴市的灌南、涟水两县，历来被认为是苏北的苦地方，直到灌溉总渠修成后，才有所改善。这里的农民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劳动搞了大量农田基本建设，推广科学种田，特别是三中全会后贯彻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大大改变了面貌。我们这次“探路”没有在这里停留，所以不多说了。

灌溉总渠以南盐城市境还可以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的陆地形成得较早，传说宋代范仲淹在这里做官的时代，筑了一条防海潮的堤，至今称范公堤，就是现在通榆公路的路基。在这条公路上的上岗镇传说是早年人们在此避海啸的沙岗。在盐城市附近确有许多冈字作地名的如大冈、上冈、冈中、龙冈等集镇。这就表明这条线之东，土地成陆的时期较近，大约只有一千多年。这段时期里涨出了通榆公路以东近50公里宽的沿海地区，黄河和长江冲入东海的沙土还在继续

淤积在江苏沿海，现在已有广大的滩涂，潮水落时一望无际。著名的东沙离海岸远达50—60公里。估计东海滩涂如果加以人工围治，在江苏部分就可以有八百多万亩良田。

我这次并没有去海滨观察，但是课题组有两位同志事先在东台县调查了该县中心港口滩涂附近的弶港镇，所以我们了解了一些情况和值得展望的前景。

先说盐城东部，这地区很早就产盐，这里出产的盐称作淮盐。盐是人民生活必需品，所以历代封建王朝就定为独占的官卖商品。这里的盐民所产的盐全部要低价缴公。再由盐官委托盐商运销全国，称为官盐。承包运销的称盐商。盐城是基层收购中心，扬州是盐商麇集的码头。纸醉金迷，腰缠十万贯，才下得了扬州去做一场繁华美梦。沿海的盐民却受着残酷的封建剥削，靠出卖体力劳动过日子。所以盐民居住的地区经济是十分落后的。

清末，南通出了一个恩科状元张謇，当地人称“三先生”。他是个“实业救国”的实践家，着意谋划在家乡兴办工业，从国外引进了机器纺织的技术，在南通开厂经营。为了培植纺织厂的原料，他看中了苏北这块沿海的沙地，从南通起直到盐城，推广植棉。这件事被称为“废灶兴垦”，即把原来的盐场改成棉田。从经济上说是从简单的采掘收集进入了开荒种植，把生产力提高一大步。在这片沿海地区上所生长的棉花，就被收购来作他在南通经营的纺织厂的原料。当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力顾及东亚的空隙，苏南的无锡、常州、南通兴起了现代的纺织工业，为长江三角洲打下

了民族资本企业的基础，而这些纺织厂的原料主要来自苏北沿海地区，所以这个地区原是苏北主要的产棉区。

这个产棉区的盛衰倚赖于长江三角洲民族资本纺织工业的盛衰。三十年代中叶纺织工业比较有起色，所以这地区也比较繁荣。但是抗日战争开始后，苏北成了我们新四军的抗战前线，在拉锯战中许多集镇和农村被敌人破坏。这个地区的经济一蹶不振。

解放后，这个产棉地区虽则有了一定的恢复，但是接着在极左路线的政策下，发展缓慢，直到三中全会后才出现新面貌。根据我们课题组在弶港镇的调查，我们了解到这个镇附近的新东乡是1979年开始由内地移民开垦建成的，经过五年，现在已有8100人。那就是说，群众对开垦滩涂有很大的积极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盐城市现有714.9万人，只有921万亩耕地，每个农业人口只分得到一亩四分耕地，称得上人多地少。而弶港镇附近东台县境内却有20多万亩等待开发的荒地，至今新东乡只利用了5.5万亩，人均耕地近7亩。人均收入1981年是309元，1982年是347元，1983年已到475元，高于盐城各县的平均水平。所以滩涂确实具有吸引人的能力。

弶港的调查提出了移民开发滩涂的远景。在弶港附近东台县境内目前至少还有15万亩荒地可供开垦。即以新东乡人均为7亩计算，大约可以移入2万多人。据初步估计苏北有400—500公里长的海岸线，800多万亩的滩涂荒地，如果由国家投资每亩约300元，地方出劳力，进行开发滩涂的基础

工程建设，群众可以进去开荒，仍以上述标准来计算，至少可容100多万移民。

江苏现有人口6000万，到2000年估计将增加600多万人。这是现在必须心中有数的严重问题。如果能在今后15年里鼓励群众积极移民开辟这片滩涂，除了农业人口可容100万人外，每15公里建立一个5000人的小集镇，沿海滩涂以30个小集镇每镇5000人计算，大约可容15万人。这对减轻江苏今后15年内的人口压力将起重要的作用。当然，我们并没有把可以由国家作为重点建设投资，采取规模较大的围滩工程来开辟的苏北海岸外的东沙（从地图上看南北20公里，东西有40公里，在退潮时出现的沙滩）打算在内。而且如果满足于与江苏其他地区相等的生活水平，每人二亩土地已经足够，现有可供开发的滩涂可容纳的人口就可以增加一倍半，可达到300万人，占了15年内新增人口的二分之一，如果东沙可以开辟，江苏新增人口的就业问题完全可以解决。

要使滩涂成为解决江苏人口压力的重要出路，除了鼓励和加速移民去开垦外，主要是引进乡镇工业，在沿海建立小集镇，使基层行政单位有财力为移民提供生产、生活上必需的社会措施。我们在弶港看到在原有的渔业基础上发展了食品工业，就推动了附近农民的多种经营，增加了收入。集镇上有了乡镇工业的支持，可以集资改造道路，建造文娱乐场所。有了乡镇工业也就会办起商店，跟着有了邮政、电话等通信设施，便利了居民。开垦滩涂的居民亦工亦农，安居乐业，又会从他们的故乡吸引来更多的移民，把原来荒废的土

地开垦成欣欣向荣的果园和良田。我们对这方面的调查还刚开始，为了进一步开发滩涂有必要总结象弶港一类创业的经验。并发现一些开发滩涂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这是一项应当引起大家注意的新兴事业。

(六)

盐城市在灌溉总渠之南的那一部分，以通榆公路，即原范公堤为界，可分东西两区，东区就是上面所说的产棉区，西区属里下河地区，一向是产粮区。里下河地区包括东台的西部，以及盐城市的阜宁、建湖、盐城郊区的主要部分。扬州市的高邮、兴化、宝应及江都和泰州的北部、淮安的南部，是苏北平原最低洼的地区，而兴化是它的“锅底”。我将把跨市的里下河作为一个地区来叙述。

在里下河东界，正处在产棉区和产粮区的交接线，由于棉粮的交换很早在这条线上就兴起了许多集镇，比较有名的，由北而南是：阜宁县的阜城、建湖的上冈、盐城郊区的伍佑、大丰县的刘庄、白驹、东台县的东台、安丰、富安。在这条线上的大小集镇有22个，占盐城市范围内集镇总数的20%。

这些集镇过去都是农产品和淮盐的集散地，而且大都是以原有的农村为基础形成的，所以集镇上农业人口占多数。如建湖的许多乡属镇，农业人口占80%，东台县全县集镇人口计21万人，其中农村人口有12.5万人，占60%，如果按现行行政上建镇标准都是不合格的。其中有些集镇在解放后成了公社（乡）的政府所在地，添置了一系列乡级机关，成了

政治中心，集镇有所发展。近年来也有些集镇发展了乡镇工业，改变了单纯作为贸易及政治中心的作用，工业开始在集镇的经济结构中取得较高的地位，有些已接近于苏南的集镇。

一般说，在七十年代以前，这些集镇上工业是不发达的。1966年盐城全市社镇企业只有280多个，多数只是粮棉加工和铁木农具的制造的修理。七十年代中期，有一部分集镇开始兴办社队工业，三中全会后才有较大的发展。1983年统计，盐城市（包括东西两部在内）乡镇企业已有5603个，职工24万余人，工业总产值七亿九千万元。在这期间有些集镇新建了高层建筑，增添了文化设施，铺设和整修了路面和地下水道，集镇面貌有了改观，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我们去访问了盐城郊区的大冈镇，使我们改变了苏北到处都没有较发达的集镇的概念。象大冈一样的集镇在苏南也不是很多的。这说明了只要政策对了头，乡镇工业发展了起来，集镇是必然会随之繁荣兴盛的。苏北完全有条件象苏南一样兴办乡镇工业，大冈镇能做到的，苏北其他地区也能做到。当然现在这方面还赶不上苏南，那是过去这段历史造成的，只要认真贯彻“提高苏南、发展苏北”的方针，起步虽迟，后来者还是可以居上的。

大冈在盐城市的西南边上，是大丰、兴化、原盐城等三县的结合部，常住人口5500人，是盐城历来有名的大镇之一，也是盐阜地区最古老的集镇之一。据说在明代已经设镇，距今有400多年。当时只有“百户”，到了三十年代已有六、

七千人，较今常住人口为多。它的周围河道纵横，土地肥沃，是苏北的鱼米之乡。方圆三、四十里内的农民利用水道的方便，都到这里来进行贸易，形成了一个农副产品的交换中心。抗战前极盛时代镇上从事商业、饮食、服务业的就有700多户，仅粮行有几十片。运粮船只延绵九里，十分壮观。当时街上的私塾有几十家，就学儿童数量不少。

抗战时期，大冈镇曾经沦陷，开始衰落。解放后稍有恢复；但五十年代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三大改造中个体粮行撤销，以粮食的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大冈镇就一蹶不振。集镇人口先后精简了三次：1954年调整商业网点调出300多人，三年困难时期下放600人；1970年后又动员了300多居民到农村落户。近年来人口逐渐增多，但尚未达历史上的最高记录。

与苏南一样，大冈镇到七十年代开始好转。当时利用苏南下放职工和城市工厂“闹革命”停产的时机创办了乡镇工业。三中全会后，工业迅速发展，1978年产值已达849万元，1983年一跃而达2000万元居全市各集镇的首位。集镇居民从六十年代人均年收入70—80元达到1983年300元的水平。总结这段转衰为兴的历史，关键是在政策，办法是在办了工业。当其衰也，居民温饱尚难解决，每年要由县政府拨上万元补助困难户。七十年代大办工业后，经济情况年年改善，现在镇上已有国营企业16个、大集体企业7个、社镇企业28个。1983年全乡农副工总产值5000万元中，社办工业产值占36%，队办工业占53%，以这个乡镇范围来说，工业产值已略略超过了农副产值了。

大冈镇办了工业，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力。这个乡原来人多地少，人均只有一亩二分耕地。农村人口经常外流，仅在盐城市区工作的职工就有三、四千人，构成了对城市的人口压力，乡镇工业办了起来，现在已有2000多人住在附近村子里，白天来镇上做工。他们离土不离乡，不必进城找活路。这样成了人口进城的阀门。

大冈镇的工业是办得有成绩的。镇上发展了工业，同时带动了农村也办起了工业。镇上有三个针织总厂，带动了三十个大队办起“松散联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分厂，在产供销上由总厂统一负责，形成大厂带小厂成功的事例。还有采取产品转让来帮助落后大队的发展。这样使得这个乡的经济迅速地商品化和工业化了。

大冈镇的工业在引进技术和人才，以及镇乡联营办厂扩散工业布局方面，在苏北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们较早采取招聘办法来罗致技术人员，其中有一个原在别地错打成反革命的人，到了这里不仅不受歧视，而且得到发挥专长的机会，成了技术上的骨干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对外来的技术人员照顾周到，所以都能安心工作，而且陆续延聘人才，现在已有外地技术人员73人。他们为本地培训了120名技术骨干。这几年各厂派出260多人到外地学习。社办的14个工厂中受过培训的职工占总数的70%以上。由于着重对外地的开放和联系，与外地建立了业务往来的单位有47个，有协作关系的单位36个，常驻外采购组有5个，购销员有97人，在各大中城市的信息点12个。这样就使得大冈能取得较远的大城

市的辐射，直接与上海及天津的工业发生关系。这对大冈乡
镇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以我们这次匆促的访问中所见到的情况来说，象大冈那
样发展了乡镇工业，而且已有成绩的集镇，如果把市区和县
镇除外，在苏北还是不多的。我特地把这个例子提出来就是
想说明，苏北完全有条件兴办乡镇工业。而且在这个例子中
也告诉我们如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的辐射力并不限于毗
邻的地区，因为技术和智力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人。他可以
超过空间间隔传播，和远近距离固然有关，但并不是必须衔接
才能起作用。大冈可以接受上海、天津的技术信息，甚至
进行协作，就是个例子。苏北离开工业发达的大城市固然较
远，交通条件也差，但是如果多注意创造渠道和有利条件，
还是可以收到大城市的经济辐射力，用来促进本地区乡镇工
业的发展。我们希望苏北有更多的象大冈那样的集镇早日形
成。

我们从里下河地区边缘，进入高邮和兴化两县。虽则限
于时间，没有能下乡观察，但访问了这两县政府所在地的高
邮镇和昭阳镇，对基本情况有一些概括的了解。

里下河地区经过解放以来多年的水利建设，已经形成了一
个苏北的“江南水乡”。过去由于地势低洼，农民生产只能
靠一熟的沤田过生活，三年两头淹，每年亩产只有三、四百斤。
所以常常有大批难民去江南就食。解放后还有一段时期依赖
国家调粮救济，兴化县1951—52年调入120多万斤，1955年
合作化时，还调入30—40万斤。1954年，200多家铁匠中大部

分外流谋生。六十年代初期渡过困难时期之后，不久又碰到十年浩劫，农民个人分配水平，一直在百元以下。所以里下河地区的农村经济直到1978年才好转。现在整个里下河地区已成了国家的商品粮基地。兴化县一亩农田年单产平均已在1500斤上下。成为全省产粮最多的县。这个变化是在五年里发生的，不能不说这是“奇迹”。

这个地区的集镇的布局和苏南太湖附近的水乡有类似的情况。过去都是在水道交叉，运输便利的地点，有一个作为农产品交易的中心的小集镇。以高邮县为例：全县有大小集镇46个，以五至十公里的距离均匀分布，平均每27平方公里有一个集镇，大的有七、八千人，小的近千人，最大的“三大镇”，人口多至9000人：临泽、三垛、界首。这些大镇的位置，几乎都在离开县镇较远和邻县的交界地上。兴化的大镇沙沟、安丰、戴南也是这样。它们都是各县之间的贸易中心。这些集镇绝大多数还没有摆脱集市的性质，一般逢五逢十赶集。三中全会以后出现大集越来越大，集期越来越密的趋势。现在高邮八桥镇除了五天一集外，每天都有鱼肉蔬菜上市，经常有40多个摊子卖副食品。盐城市建湖县的上冈镇，据调查“过去五天一集，现在不期而集。每天有2万人来上冈交换农副产品、手工业品”。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集市发展成集镇的过渡形式。看来里下河的大小集镇和集市正在逐步分化，涌现出更多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

在这些大集镇上同时也可看到非农业人口在比重上逐步上升。据说那些容易遭水灾的低洼地区，农村规模比较大，有

达几千户人家住在一起的，这是因为需要选择高地居住的缘故。许多集市贸易就在这种农村里进行，所以作为一个集镇包含的农业人口的比重就比较大。工商业发达，非农村人口日益增加。现在高邮县46个集镇里，农业人口占34.3%，亦农亦工占24.6%，在校中学生占13.3%，非农业人口占27.8%。农业人口比重由于有一部分农民在过去几年里参加了工业生产才从过半数下降到大约三分之一，这表明了集镇正在兴起的过程。

看来这个地区中，若干村子就有一个农民互通有无、定期贸易的小集，即所谓“青菜集”，赶集的大约四、五百人。大约十五到二十华里为半径的区域里，在交通方便的地方，有些就在公社机关所在地，有比较大的集市，赶集的大约有几千人。在这里已有各种家庭里需要的热水瓶一类的日用品。上万人赶集的大集，每个县都有四个到六个，其中最大的一般就是县政府所在地，所谓县城。大集的范围可以包括三、五个公社。大集上其实已经以商店为主，有高档的消费品，如挂钟、收音机、电视机、自行车之类，这也是一般农民所参预的最高一级的市场。

现在苏北各县一般说来，县城都已经建了镇，其次的大集大多还没有建镇。看来，这些大集在实质上已经在向集镇发展，但是由于乡镇工业还刚起步，这些大集主要还是农产品的集散和工业品下销的贸易中心。工业的比重还不高。

里下河地区的乡镇工业一般说是七十年代初开始的。现在一些大镇上工业已有相当的规模，但以全地区说工业比重

还没有超过农业。我们还没有汇总各县的统计，所以只能举些例子来说。兴化县很早就以铁工著名，外地有不少走码头的铁匠是这个地方出去的。但是在解放前都是个体户，只在县城里有几家小的铁作坊，很难说是工厂。但是自从七十年代开始到去年，全县工业总产值已近四亿元，已有机械、电子、化工等工厂，但其中一半在县城昭阳镇上。

高邮县城的高邮镇情况类似。解放前勉强能称得上工业的仅有手工操作的三、四家铁器厂，工业产值一百多万元。现在已有各种工厂一百多家，1983年总产值达1.76亿元。高邮县的八桥镇，是个乡镇，七十年代开始办社队工业，1983年已经有10个工厂，产值达617万元，占全乡工农总产值50%，在全县乡一级的集镇中名列第二。更小的集镇如高邮县天山乡南茶村近百户人家，办了一个红星皮件厂，去年产值480万元，利用积累铺了两公里的公路，还兴建了浴室。从这些事实看来，这个地区的农民已开始认识到农业翻了身之后还得兴办工业才能富裕起来。

总的看来，里下河地区和上面讲过的几个地区一样，在最近短短的五年来，农业有了迅速的、甚至可以说是出乎意料的发展；特别是过去受灾严重的里下河地区，变化更显得突出，原是“逃荒区”，已成“米粮仓”。以兴化县戴南镇为例，农业人口人均年收入1978年只有131元，1983年达到422元，五年里提高了三倍。令人不易相信的，据材料说，这个镇上的非农业人口的收入不及农业人口，因而有人认为这样解决了“城乡差别”。实际上，这说明这个地区工业不发达，

甚至赶不上农业。城乡差别并不能用这个公式来解决。

现在存在于苏北这一部分地区的主要问题还是怎样迅速发展乡镇工业，实现在经济上后来居上。从当前的具体情况看，农业的大发展一方面固然解决了农民的衣食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农民吃饱了肚子，交了公粮，手头还有大量粮食怎么办。在集市上我们看到副食品和日用品销得很快，而粮食很少有人来顾问，卖不出去。其他农产品也是如此。去年大蒜价格高，今年种大蒜的面积增加了，外地收购不积极，结果大批大蒜无法出售，也无法贮藏。我们访问时期，种蒜的农民还在哇哇叫。这件事足以看出储藏的仓库、保存农产品的设备和流通渠道都跟不上农业的增产，甚至表明农业增产如果不和加工工业相结合，必然会发生供需的矛盾。

苏北农民目前只有向饲养业找出路，作为家庭副业的养猪、养鸡、养兔等等有了很快的发展。我在上一篇论小城镇的文章里提到的“百万雄鸡下江南”也就是由于苏北粮食增产，自己吃不完，用来作饲料来饲养猪、鸡、兔等家畜家禽，但是这些东西还是要成为商品出售到市场上来的。现在正在用很初级的方法向需要较多的江南输送，可是这些活的家禽在运输中因死亡的损失很大。这就逼着苏北农民发展食品工业了。同时许多大集市都在考虑设立仓库和冷藏设备，使禽畜粗加工后能储藏起来，再分批外销。

我们在兴化看到一个蔬菜加工厂，把一个乡菜农所种的各种蔬菜脱水烤干，包装出口。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为农业服

务的加工厂。其他如小规模的酱鸡作坊，皮蛋厂等等都属于这一类。苏北最近急迫兴建的就是这类加工工业，而以建筑仓库和冷藏库开始。这种加工工业兴起之后，就可以促进专业户和饲料工业；进一步可以形成一个直接从农业丰收中成长出来的农工循环系统。

当然，也应当指出，这和发展其他制造业，甚至如利用石英和水晶发展激光等一类尖端工业并不矛盾。也许正可以从当前比较简单的加工工业做起，使农民进一步富起来，使农业的继续丰收不受挫折，从而积累资金，为发展精加工和专门性的制造业创造条件。

怎样发展工业和发展什么工业是当前苏北经济发展的主要课题。没有经过深入研究之前，我们还不能提出具体的建议。我们只想指出，苏北乡镇工业起步较慢，而且将在农业大丰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所以它所走的道路不可能重复苏南早期所走过的路，我们必须从具体的实际出发来解决这些问题。

× × × ×

我们这次“探路”，由于时间太仓促，收兵过早，对洪泽湖周围淮阴市所属各县（除淮安县外）及京杭运河之西各县，都没有去访问。课题组的同志目前正在这些地区进行调查，我自己也希望能有机会去参加他们的工作，所以有关这些地区的情况还得留待以后再写了。从江苏全省来说，我们对包括南京、镇江两市及扬州市通扬运河以南各县的苏中地区，还没有去调查访问，这应当是下一步的工作。

小城镇 新开拓

南京、镇江、扬州，联结这三个城市的一片狭长的三角地区，被人们称为长江下游的银三角。1984年的仲夏与初冬，我分别两次走访了这个地区。6月中旬进行的初访，由于受到时间的限制，只参观了南京市的两个郊县，听了南京、镇江两市的一些情况介绍，至多算是张网捕鱼，所得有限。因此在重访之前，我拟了一个大纲，确定了放矢之的，以求弥补前次的不足。从10月24日抵镇江，先在地处长江之中、四面环水的扬中县住了六天，重点了解该县的乡村集体企业与农户的合作、个体工业。此后便渡江北上，经泰州、泰兴到南京，11月6日返京，调查历时十四天。

两次调查前后相隔不到半年，可是客观事物发展得很快。实践的步伐迫使我们用发展的眼光去探索和认识这里的变动规律。在三年前提出小城镇研究课题时，农村的生产责任制刚在苏南落实，不少乡镇企业还举棋未定。几年来我追

随着人民的实践做研究，从苏南到苏北，再到南北交接的宁、镇、扬地区，活动之频繁常使一些好心人为我担忧，可是我总觉得自己的认识还合不上时代的拍子，怎敢有所懈怠。

这次银三角之行，恰逢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发布之后，我所接触到的城乡干部、乡村企业的职工和农户的主人，无一不在设想怎样适应全国城市经济改革的新形势。在与他们的攀谈中，我学到了许多新东西，受到了强烈的感染。这里，我试图以此为主线，描述分析这一三角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及其发展趋势。我似乎窥见到农村、小城镇、大中城市紧密联结和农村经济、乡镇工业、城市经济互相交融的前景。这一广阔的前景对我们的小城镇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应当扩展自己的视野，开拓小城镇研究的新局面。

(一)

继在苏南、苏北调查之后，我注意到有个地区还没有接触到，那就是宁、镇、扬地区。这个地区大体包括扬州的南部、镇江、南京以及毗邻安徽省的一部分地区。从地理上看，该地区西南部多丘陵，东北部多平原，依偎东流长江之两侧，位于江苏南北交接处。鉴此，我在第一次到镇江时，曾提出是不是可以在经济发展上将这一地区作为“苏中”对待的问题，向有实际经验的同志请教。

当我第二次到镇江时，一些干部和群众就向我反映说是否能将“苏中”这个提法改一改。提出这个要求的理由，据

说是一提“苏中”，人们就觉得它与上海经济区无缘，于是在该地区与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大中城市的联系挂钩时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阻力，甚至在电力等能源的供应上也另眼相看，得不到保障。这些情况的出现与“苏中”的提法究竟有多大的相关性我并不明白，但对拉闸停电我却有直接的感受。在扬中县逗留期间，大约隔天就要停一次电，少则十几分钟，多则几小时。我们还可点上几支蜡烛就晚餐，别有一番风味，可是各种各样的机器就无法运转了。据该县有关部门统计，1984年1至10月份共停电37次，其中10月份就有15次。由此造成该县工业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估计达1,000万元。

如果说问题出于“苏中”这个概念，那是违背我提出它时的原意的。随着小城镇研究由点到面的扩展，我觉得有必要在整个江苏根据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划出若干个区域来。这种社会经济发展区域的划分，其意义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研究者来说，划区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分析方法。因为各地小城镇无论在人口数量、经济规模等发展水平上，或是在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特征表现上都有共性和个性。这些共性与个性是由一定区域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历史造成的，因而不同区域间小城镇的共性和个性可以进行比较研究。二是对政策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来说，划区可以确定它在全局中的地位。在制定具体政策时要充分注意到各地区的不同特点，缩小相互间发展的差距，在指导工作上可以根据各自的长处与短处，扬长避短，发挥优势。

当然，划分社会经济区域的指标必须有效，这样才能体现出不同区域在整体中所处的位置。我在《小城镇 苏北初探》中应用各县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与农业的比例来作划区的指标，当时发现苏、锡、常、通地区的工业产值都超过农业产值，一般都是工七农三。而苏北的北部，与苏南相对，一般却是工三农七。自北向南，这个比例中的工业成份逐渐加大，到扬州一线，一般都达到工农各半。至于宁、镇、扬地区的工农业产值比例情况，那时尚未计算，所以我就先提出上述的设想来请教。

为了确定宁、镇、扬地区经济水平在全省的地位，我在这次调查中，除计算镇江所属四县1983年的工农产值比例外，还根据1983年的各县工业统计资料，计算了江苏全省分市的县均工业产值作为分析时的辅助指标。

镇江市四县1983年工业产值（包括县、乡、村三级，单位亿元）：句容2.10、丹徒2.57、扬中2.84、丹阳8.50。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句容51、丹徒65、丹阳75、扬中79。可见镇江四县工农产值比例都高于苏北，接近苏南。

再看江苏省分市1983年县均工业产值（单位亿元）：连云港1.38、淮阴1.49、南京1.63、徐州1.83、盐城2.48、镇江3.02、扬州4.30、常州5.73、南通5.76、苏州8.17、无锡10.67。宁、镇、扬低于常、通、苏、锡，而与苏北诸市相交叉，略具优势。南京郊县和苏北的徐、连、淮同是2亿元以下；扬、镇则和盐城同是高于2亿元、低于5亿元。常、

通、苏、锡都超过5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处于南京四周五个郊县的平均工业产值低于扬州与镇江的一倍，还停留在苏北的一般水平上。这一事实在我前次访问其中的两个县时就感觉到了，只是没有数字显示那样清晰。按照在苏南调查的经验，乡镇工业的发展总是离不开对该地区发生影响的中心城市的作用。由此推论，南京对宁、镇、扬所组成的大中城市体系与上海对苏、锡、常、通组成的城市体系一样，应当对自己所处的地区乡镇工业产生较强的影响力，犹如两个相对独立的星系，各自产生辐射，照亮星点周围的太空。但是客观事物和我们的预想不合。于是我就试图去寻求发生差别的原因。

首先，我注意到宁、镇、扬三个城市的历史。它们三点组成钳形，为长江下游的咽喉，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们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军事战略要地。远溯孙吴，近至太平军，都在这三个城市设防，南京城里就有能伏兵数万的城墙，镇江东郊的炮台至今还留存着。因此这三个城市代代相沿的第一位功能，便是军事防守。加上南京曾数度作为封建帝王和国民党都城的原因，使它在城市形态和结构上趋向于封闭。

其次，还可以从宁、镇、扬三个城市工业产值和结构与苏、锡、常、通四市比较，更容易看出它们的区别。这七市各自的工业总产值（单位亿元）是：无锡86.9、苏州86.8、南京85.4、常州60.5、南通60.1、扬州54.4、镇江28.2。南京居第三位，扬州、镇江实力较差。这七市轻工业的比重（%）分别是：南通72、扬州61、无锡、常州各58、镇江53、南

京38。就是说，轻工业在整个工业中南京只占三分之一，镇江占二分之一，其余各市均约占三分之二。这说明南京、镇江是重型工业结构的城市，而且据介绍南京的重工业里较大的比例是军工生产。因此我们认为：历史造成的封闭状态、工业实力较差，以及重型工业结构，特别是封闭性的军工生产是造成这些城市对附近地区经济辐射力较差的主要原因。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既然镇江市区工业实力较差，且属重型结构，它所属四县的工业何以有接近苏南的发展水平呢？对此我们作了调查。例如对该市工业产值最高的丹阳县的42家乡镇企业的挂钩单位作地域分析，发现在46个对外挂钩单位中，只有一个市镇江市的；又如该市工业产值比最高的扬中县，有一家乡办的化工仪表配件厂，近年来它在设计、生产及原料、产品的供销上与全国180个单位有或紧或松的联系，其中没有一个是镇江市的，南京市也只有六个，占总数的3%，其余大多集中在上海、北京等大中城市。为了避免个案分析的片面性，我们还对该市四县乡镇企业的厂长、供销员和技术员各按3%的比例随机抽样，询问他们在资金、原材料、设备、技术、产品、市场信息等六个方面对外联系主要受哪一个城市的影响。回答结果是上海的比例最大，南京为五分之一强，镇江只有六分之一。

以上分析使我认识到，该地区的三个城市，特别是南京与镇江，还没有充分发挥其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中心作用，孕育着相当的潜力。从该地区大部分农村来看，它们是在主要争取远距离城市影响力的情况下努力发展乡镇工业

的，出现了一个紧追苏南发展的局面。如果我们将本区域经济中心的作用叫做“近距延扩”的话，那么远距离经济中心的作用就可称为“超距辐射”。在调查时，我听说今年南京市正在采取一个市区企业带几个郊县乡镇企业的措施，试图加强近距延扩的力量，这种用行政办法推行的经济联系能否取得成功还有待于在实际中观察。但它说明城市在区域经济意义上处于封闭，近距延扩相对弱小的状况已被注意到了。因此总的说来，宁、镇、扬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居中，并显示出由封闭开始走向开放的特点。这是个潜力很大，前景可望的地区，故而我在本文的一开头就引用了银三角这个词。

(二)

城市由封闭趋向于开放，标志着一个区域性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时期的到来。对此，我们应当从城市与乡村两个方面，去研究社会经济区域的发展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这里，我主要依据在扬中县观察到的事实，谈谈对联结型的经济实体以及社会主义经济中指令性计划部分与市场调节的商品经济部分之间关系的认识。

扬中县由扬子江中的三个沙洲组成，全县228平方公里的绝大部分集中在中央最大的太平洲上。据介绍，这一片由长江淤土冲积而成的绿洲，在历史上曾是大江南北群众逃战祸、过往船只避风浪的太平之地，故得名太平洲。该县在何时开始有人定居尚无考证，设县治是在民国元年。

我选择这个年轻的岛屿作为调查的重点，是因为我听说

该县乡镇工业在镇江市名列第二，在人均产值上与第一位的丹阳县相差无几（1983年人均工业产值丹阳县为1,112元，扬中县为1,092元）。而且在扬中，村以下的小工业办得很有特色。通常说来，农村乡镇企业总是在那些交通较为便利的地方发生、发达起来。而扬中这个江心小岛对外仅有一个汽车渡口，在前往扬中时，由于我们的车辆出了点毛病，我在渡口等了二十分钟，结果两岸的运货卡车排成了长龙。据说如果遇上六、七级以上的风浪，扬中就与世隔绝了。在此如此困难的交通条件下，扬中人究竟凭借了什么发展起乡镇工业的呢？

到扬中的第二天，该县年轻的书记和县长在介绍情况时说，他们对乡镇企业的要求是要搞“散点式的规模经济”。起初我听不懂他们自己创造的这个陌生的名词，随后的解释才使我明白了其中的涵义。原来“散点式的规模经济”是指乡镇企业不能走关起门来办厂的路子，而要以自己的拳头产品为中心，成为乡镇的骨干企业，从而有力量继续向下扩散，以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更通俗地说，就是乡镇企业要把工业犹如撒沙般地扩散到乡间，直至进入农户的家庭，使在整个乡镇范围内的居民都得到实惠。对此，我在加以概括时用了一句话：要使千家万户富起来。

千家万户富起来，不仅仅是扬中发展工业的目标，而且是扬中人正在实践着的现实。目前扬中县具有六大层次的工业企业。第一层次是县级企业，包括县国营、县集体以及正在引进的县级合资企业；第二层次是乡镇级企业；第三层次是

村级企业，包括村属集体和村之间的联营；第四层次是组级企业，包括组属集体与组间联营；第五层次是联户企业；第六层次是家庭个体企业。这六个层次的前四层分别对应于早先的县、社、大队、生产队企业；联户企业则是由几个家庭合资经营的企业。据扬中县有关部门统计，1983年有县级和城镇集体企业121个，乡办企业131个，村办企业212个。组以下的企业在全县未作统计，但仅新坝一个乡，就有组办企业117个，联户与个体企业187个。由此可见，这六个层次的企业越往基层，数目就越多，组成了一个塔式梯级的农村工业体系。

为了考察这一工业体系如何使千家万户富起来以及它们内部的关系，我想从中抽取几层描述若干典型的情况。

新坝乡有一位曾当过合作社辅导会计的杜姓老汉告诉我，他家是一个专门制造冰箱、烘箱所需的铜把锁的专业户，除了他与老伴，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媳与一个女儿，共7人。1981年除花400元买了一台钻床外，他们一位能干的儿子还花150元钱买了零件，自装了一台小车床。就用这一点简陋的设备，采购了一些工厂切削时留下的铜废料和铜渣，从熔铜、刻模、浇铸到切削加工，开起家庭工厂。在这个家庭工厂中，各人都有明确的分工，杜老汉是家长，也是理所当然的“厂长”，还兼着供销、钳工等业务。一个儿子专门搞车床，另一个儿子则出模子，儿媳、女儿也各司助理之职，老伴料理家务。这个“企业”开办三年来，杜老汉一家由原来的四间简易瓦房，修起了六间两厢的一排新房。除

了上交 5 % 的产品加工税和 1 % 的工商管理费外，他家用积累添置了 5,000 多元设备，还有约 5,000 元流动资金。当我问到产品销路、收入分配及家庭情况时，他说他们铜把锁有一半以上是销给乡镇企业为电冰箱等产品配套，家庭收入是按大家讨论决定的原则，计件工资分配给各个成员的。他觉得家里的三亩多地还必须自己种才可靠，而年产 1,200 斤粮由于天天有荤菜也足够了。听完这席话，我对前几年听说的“无工不富”又有了更具体的形象。据统计在扬中县，现在已经有了六百多户类似杜老汉一家那样的家庭企业。

听完介绍，我又看了一份联户办企业的材料。油坊乡和平第七村民组共有 45 户人家，其中 22 户擅长木匠手艺，因此在六十年代初期，生产队办起了木刷柄加工厂。可是，这个小小的队办工厂居然也吃“大锅饭”，经济效益极低。最高的年盈利只有 1,000 多元。1980 年以后，从向生产队搞加工承包开始，到投股集资联户经营，发展起了 8 个木刷加工联合体。1983 年底，这些联合体共有 44 个股份、156 名工人（全自然村共有劳力 91 人，所以这些工人中有 102 人来自外村、外乡），年总产值为 45 万元，扣除成本、税金等其他开支外，净利约为 30%，为 13 万元，其中工人工资为 11 万元。股金分红约 2 万元。现在这个木刷柄联户生产的专业村还在向前发展，联户体已有 14 个，1984 年 1 至 9 月的产值就达 73 万 3 千元。他们的产品畅销 8 个省份，30 多家木刷厂。

看来，这个木刷专业村原先的那个队办厂被联户企业冲垮了，这使我联想到调查前在家乡吴江县听到一位干部说，

个体企业与联户企业的兴起对农村的集体企业有冲击力，所以他们只好采取一些措施去抑制。我觉得这不是一种正确态度，关键是在没有正确的认识。数年前，当乡镇企业兴旺的时候，有一种说法是冲击了城市企业，挖了墙脚。现在联户企业与个体企业起来了，乡镇企业可不能当了“婆婆”，忘了做“小媳妇”的时候。这一前一后的两次冲击，何其相似，里边一定有文章。因此与其去抑制，倒不如回过头来总结分析一下集体企业所存在的问题。

这次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所作的城市经济改革的决议，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国营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不讲求经济效益；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缺乏主人翁的生产积极性。这种情况在前些年比现在还要严重，所以那时乡镇企业作为自负盈亏的集体企业就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有相当一部分乡镇企业并没有完全消除“吃大锅饭”的弊端，如果不注意调节企业内部责、权、利三者的关系，那么国营企业是“吃大锅饭”，乡镇企业则是“吃小锅饭”。国营企业吃“大锅饭”是不容易看见的，可乡镇企业的锅小，大家都看得明白，小锅有多少饭，少了大家就不得不不再烧一把。因此乡镇企业要巩固自己的地位，要进一步发展，就应当正视自己的问题，与城市企业同步进行经济改革。事实上，我在基层听到的“一包三改”等措施就是这种改革的开始，并收到了巩固发展乡镇工业的显著效果。

扬中县不仅在乡镇企业内部实行改革措施，而且提出了搞“规模经济”的要求，即乡镇企业要扶持各层小企业，成

为小区域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这个要求是很有远见的，它既使乡镇以下的企业与乡镇企业有机地联结起来，围绕着乡镇企业的拳头产品展开小区域性的工业经济活动，同时也以小促大，迫使乡镇企业的产品不断更新，技术与经营管理走向科学化，于是乡镇企业也就提高了自己。

该县隆兴乡塑料厂就是以大厂帮小厂的骨干厂，它以中间产品扩散、部件加工等各种形式先后扶持了8个村办厂。现在这8个村办厂都形成了生产能力，而乡塑料厂自身也不断扩大生产业务，使这个乡的塑料行业完成产值近1,000万元（1983年），占全乡年工业产值的一半。乡里人说，一厂带八厂，富了一个乡。我去参观的联合乡红胜村糖果厂也把果仁加工、纸盒加工等等工序扩散下去，本厂集中力量上新品种。现共有27个品种，年产糖果1,000余吨，销往全国16个省市。与上述两个厂类似的乡镇企业在扬中为数不少，因此该县在总体上出现了乡镇企业与小企业双促进的局面，按1至9月份情况估计，全年全县村、组办、联户与个体企业的总产值可达2,000多万元。与此同时，乡镇办企业也以约30%的速率在增长。

扬中的“规模经济”使我想起了在今年国庆之前在甘肃定西地区听到的一个国营厂的情况。这个厂是部属的定点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大部分职工来自别的地方，除了当地供给食用品外，它与外界似乎是隔离的，当地人只见原料进，产品出，烟囱冒烟。这个厂与扬中的乡镇企业相比较是另一种模式。如果说在一个小范围内发挥经济活动中心功

能的乡镇企业是开放类型，那么类似甘肃那个厂的企业则是内向类型。内向型的企业只是对其周围的地区产生它所需物资等条件的吸聚作用，而不对所处的地区产生经济上的反哺作用。如果一个城市的内向型企业比例大，该城市必然趋于封闭；如果开放型企业比例大，则势必走向开放，从而对其周围地区发生促进生产的影响。

由此我想到，我国的城市企业改革是否应当向那些开放型的乡镇企业看齐，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道路。从我在扬中收集的资料来看，该县已经或紧密或松散地与许多城市企业进行各种联结，同时还有不少城市企业主动找上门来，希望建立经济联系。这种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双向联结把城市大中企业、县级企业、乡镇企业和乡镇以下的小企业都串了起来，组成了城乡联结型的经济实体。而这一经济实体的运行目标就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使千家万户富起来。

近年来，由于中央几次下达了文件，充分肯定了乡镇企业的地位与作用，特别是这次关于城市经济改革的决议，对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涵义作了明确的阐述。在对于基本上进行市场调节的商品经济活动的乡镇企业来说，是彻底破了戒，松了绑。一些企业领导人对我说，他们的疑虑和担忧解除了，现在搞市场调节不会有问题是了。他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所想到的是我们必须着力于研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里指令性的计划部分和市场调节的商品经济部分的关系问题，使大家的认识在科学的基础上逐步一致起来。否则不管是乡镇企业和正在改革中的城市企业，它们的经济活

动仍将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阻力。

上述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我的头脑里考虑了很久，但由于自己对经济学学得不够，头绪总是理不那么清晰。这次读了决议，觉得它说出了我想说但又说不清楚的话，心里十分畅快。为什么在前些年搞乡镇企业的同志不那么理直气壮？那是因为我们有些同志总是喜欢在概念上兜圈子，把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两者对立起来。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大特征，这一点大家都知道。那么与此对立的用市场调节的经济是什么也就不言自明了。于是乡镇企业家们不甘于被戴上那顶帽子，总是千方百计地与城市国营企业挂钩、搞协作，争取和认为是计划经济的企业联系起来。乡镇企业争先恐后地与城市企业联系，逐渐形成了上述的城乡联结型的经济实体，这一结果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原先的意图。

可是，争取到直接和间接与国家计划中的企业联系，毕竟是少数企业和少数产品，多数乡镇企业还得靠市场来调节。从扬中县来看，前者约占乡镇企业总产值的10%，后者为90%。

那么，绝大多数的乡镇企业怎样开展市场调节的经济活动呢？以扬中为例，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是以小补大。乡镇企业总是把眼睛盯着城市中的小量需要。城市的工业生产存在着千差万别的需要，其中有些需要批量很小，规格特殊，在城市内部往往不容易找到生产单位。因此，乡镇企业则在这一方面下功夫，以小补大。在

扬中有一个铜制品企业。它承担的大都是国营纺织厂、机械厂的配件任务，最小的批量只有几百元。

第二是拾遗补缺。乡镇工业总是把眼睛盯在大工业的缺门上。用乡镇企业家的话叫做“钻空子”。我在上面提到的那家糖果厂就是钻了城市糖果厂忽视儿童糖果生产的空子，现在他们的产品畅销，供不应求。

第三是适销补需。乡镇企业总是把眼睛盯在城乡对小商品的需求上。在这一方面，他们利用船小调头快的优势，生产城乡人民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千千万万的小商品。在扬中，这种企业的数量较多。

在原材料与能源方面，乡镇企业除了综合利用以外，也走出了投资合股、补偿贸易等路子。由此可见，乡镇企业所进行市场调节的商品经济活动基本上是一条满足城乡生产、生活需求，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路子。假如从书本上的概念出发，这条路子似乎出了某些条条的框框，可是它却符合我国的实际，并为社会主义城乡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因此，无论是从实际效果出发，或是从自下而上的计划体系的要求来看，这样的市场调节是不可缺的，是与计划经济相辅相成的。这就是说，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真正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商品经济并没有对立起来，而是统一的、和谐的。正因为两者的统一，在今天的江苏才出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崭新局面。

(三)

江苏农村在大中城市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也脱离了半自给的封闭状况。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乡镇工业是城乡新联结的环节。而主宰这个环节的是农村中涌现出的各种各样的企业人才。考察农村乡镇企业人才的培养、开发和变化，就可以活生生地看到农村这一社会系统由封闭到开放的过程。

乡镇工业的发展，从总体上看，都经历了由初创、发展到逐渐成熟的三个阶段。在农村中，人们自豪地介绍了许多企业的发家史。例如有一个乡在五十年代只有一个农机站，后来引进了少量设备，带出了一个手摇织机厂。后者在发展过程中又分化出一个生产现代纺织机械的工厂。诸如此类，这种如同魔术般的分身法，使不少企业“沾亲带故”。而透过这一幅幅企业间的“血缘关系图”，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对应于乡镇企业发展三个阶段的三代企业。各个乡基本上都是由一二个、二三个第一代企业起家，一个老根抽出许多嫩枝，形成一批第二代企业。以后嫩枝再发，又爆出一批第三代企业。

第一代乡镇企业，绝大多数是五十年代末集中了农村社员和集镇居民的家庭手工业而建立起来的。这些简单的集合体从事的生产主要是制造各种农具、农船、简单的机械配件，以及油米加工、建筑等等。它们以铁、木、竹等手工业联社和农机站的面目出现，设备陈旧，工艺简单，产品粗

糙，利润极少甚至亏损。这种种特征表明乡镇的第一代企业还处于劳动密集型的手工机械混合的作坊阶段。

在今天看来，正是这生产简单的第一代企业为下代奠下了基础。因此，我在调查时总是刨根究底，追寻那些奠基者。看来，奠基者有两类人，一类是“热心人”，另一类是熟练的手工工匠。热心人是第一代企业的领导者、组织者。他们大多是解放初土改时期成长起来的干部，文化水平虽然低，但是他们有着一股改变家乡穷困面貌的强烈责任心。因而当1958年一鼓而起办工业、两年后一哄而散齐下马的曲折时期，这些热心人没有把集合起来的家当拆完，而是想方设法地维持一定的规模，生产当地农民必不可少的农具，为农业发展出了力。现在，第一代企业的工人，即那些手工工匠，大都年老退职；热心人也分化或转化了，但他们创业的艰辛应当写到乡镇工业的发展史上。

乡镇工业的初创阶段拉得很长，一般而言直到七十年代初才进入发展阶段。在这一点上，宁、镇、扬地区与苏南地区大致相仿。在发展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界的两个不同时期，前者为潜流期，后者为释放期。在乡镇工业发展阶段出力的是热心人、能人和刚扔下锄把来当工人的农民。我在扬中县长旺乡化工仪表配件厂就见到了这样的热心人和能人。这个厂的党支部书记是个年近五十的中年人，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解放后先后担任过互助组组长、扫盲教师、合作社会计、生产大队支部书记等职务。1968年他来到该厂前身长旺乡农具厂当支书，面对当时毫无起色的

农具厂，他托人求贤，找到了一位在上海学生意出身、做过十年车工的下放工人。于是就从这位师傅与购置的两台小车床起家，第一年带出了包括现任厂长在内的4名徒弟，第二年8名。我问那位师傅，现在厂里五百多工人有多少是他的徒弟或徒弟的徒弟，他笑而不语，旁人替他回答：几乎全是。这个厂现有11个车间，6个科室，1984年1至10月份产值387万，创利润（税前）110万。偌大一个家业，不就是那两位热心人、能人和全厂“农民”工人开拓出来的吗？

两年来我遇到和听到的热心人和能人为数不少。这些热心人之所以热衷于办工业，是由于迫于人口与土地的尖锐矛盾；这些能人之所以有能耐，是因为他们大多是下放和退休的工人、干部，是城里的和乡里的知识青年。他们在乱世的年头机遇般地将城与乡，知识和技能结合了起来。这些我在《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中已有叙述。

但这里我要说的是他们有胆有识。那时的政治压力还很沉重，可他们有胆子发展，有办法应付。上面说的那个化工仪表配件厂据说它前身农具厂的牌子还留在那里，现在虽是名正言顺地分为两个摊子了，在那时可算得是一块避灾的护身符。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乡镇工业的发展是一股暗流。正因为受到政治的压力，乡镇工业在潜伏发展期与大中城市的联结是偶发性的，并且是以生产经验为基础而不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能人们一般仅具有高中以下的文化程度，他们与农村社会本身的劳力、资金要素结合，并没有为生产力的诸要素注入更新的、更丰富的内容，只是促成了农村中本

来存在着的潜在的工业生产力诸要素的凝聚，从而形成了一种初级的工业生产能力。所以，那时乡镇企业的特点是，能人们懂得什么技术，企业就生产什么；这些人能搞到什么工业原料，提供什么信息，企业就上马什么。这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被迫的盲目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冲破了政治上的压力，乡镇企业在潜伏发展期积蓄起来的能量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一时间乡镇工业势头之迅猛为人惊异。但是这股势头并不是所有的乡镇企业都能保持得下去，从而进入主动的有目标的发展时期。因为，等待着这新一代企业的是城市企业与乡镇企业以及乡镇企业本身之间的企业竞争和产品竞争，这是一个更为严峻的考验。生存还是淘汰，关键在于乡镇企业的热心人与能人是否能顺利地转化为各种专业人才，去克服企业在资金、原料、设备、技术、经营管理、产品的推销等一道道难关。

在经住了考验的乡镇企业中，能人向专业人才的转化是在第一个发展时期里磨炼完成的。这些企业管理人才往往跟随热心人学出来的，是从第一代企业中会计、供销员或有知识的熟练工人中提拔起来的。他们一般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年龄较轻，是乡镇企业的第一批专业化管理人才。如果说第一代企业更类似于作坊的话，那么这一代企业是向工业化大生产转变的开端。这批专业化管理人才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有眼光、有胆略、有魄力、有干劲。在当时乡镇企业基本没有纳入计划渠道的情况下，上马什么，生产什么，完全由管

理者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及信息决定，而且生产所需的资金除企业积累外，还有一部分（有的甚至绝大部分）都是职工自筹的。管理者给自己定的准则就是“只能成功不得失败”，他们在痛苦的磨炼中逐步学会了立于不败之地的本领。有眼光是表现在他们能选择市场上适销对路并具有越拓越宽的发展前景的产品。有胆略就是他们具有自己创造条件的主动精神，不按步就班地消极等待。有魄力是指他们能够大踏步地进取，如我们参观了一个电力器材厂，三个月前，这个厂刚刚破土动工，现在已拿出了价值十几万元的产品。有干劲是表现在他们肯下苦功夫，要迅速学会他们不懂的东西。

对乡镇企业的管理者来说，工业生产的经济活动对他们的要求是苛刻的，他们不仅要懂生产，还要懂经营；不仅要管理工人，还要学会打交道；不仅要两眼向内看厂房，更重要的是两眼向外看市场。好几个厂长对我说，他们没有在晚上十点以前离开工厂过，没有在夜里十二点以前睡觉过。不少厂长挤时间自学了有关的大学专科课程，对专业知识有了相当深的造诣。他们在实践中逐步将自己培养成了较为全面的新企业家。他们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成绩，并不是由于个人的天才，而是经济活动的实践逼出来的，是在普遍的企业竞争、产品竞争中造就的。

应当说，这一代企业的确向现代水平跨了一步，能够生产化纤织物、工作母机、化工产品、仪表配件等产品了。城市人才下乡传播的工业技术已经开花结果。可是，乡镇企业一旦成长起来，就形成了对城市在人才、技术、原料、产品销

售等方面的更大依托。这种依托却不能再象发展阶段的前期那样，做找不到娘的孩子，瞎碰乱撞。因此，在这个时期，乡镇工业突破了行政区划和地理位置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来同城市大工业发生联系，开始走上了进行多种形式的有机结合的轨道，并由不稳定趋向稳定，由松散趋向紧密。在各种结合中，技术联结、技术合作的内容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目前，我国城乡之间还存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巨大差别，如扬中县有工业技术人员190人，仅占职工总数的0.16%；有乡镇企业410个，没有一名有正式职称的技术员。在这种情势下，经济活动的内在要求驱使着科学技术及科技人才由高水平向低水平即由城市向乡村流动。这种与工业经济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科学技术流向，滋养了农村的一大批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年轻人，从而农村里迅速成长起了大量的工业技术人才。

科学技术下乡是由两股人才的流动带来的。一股是城市技术人才向农村的流动。这里面又有短期流动和长期流入两种形式。长期流入即从城市引进技术人员，扬中县今年已调入科技人员18名，有一个厂公开招聘后，已与六百多名技术人员建立了联系，其中重点准备调入的有64人。短期流动即是以聘请顾问、兼职、短期支援、签订技术合同等方式出现的人才向农村的流动。1983年扬中县正式请来的工程技术人员有201人。没有签订合同临时来帮助解决问题的技术人员也很多。另一股是农村的土技术员为了提高技术向城市的流动。仅1984年上半年，扬中县乡镇企业送到大专院校、科研单位

进修、培训的就有45人，送到各类中等技术专业学校24人，省级培训班205人，到外地重点企业代培的有1,260人。这些人在城里学了科学知识和技术，还开了眼界，受了现代工业社会的熏陶，接触了现代化的仪器设备，广泛结交了知识分子，他们的收获是多方面的。

在基层调查的过程中，到处能看到乡镇企业求才若渴的迫切感。县一级政府对培养人才已相当重视起来，就地培养人才的学校在县、乡、村、企业各个层次上以多种形式开办起来。如企业管理干部培训班、技术培训班、中专班，大专班等等。到1983年底止，扬中县已经以各种方法培养锻炼了初、中级技术人才6,000多人。

现在，有一些乡镇企业发展得较早的乡，骨干企业已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即成熟期，这一阶段，乡镇企业已经具备了资金、技术、人才、设备、信息、市场的条件，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和经济技术实力，有了较强的竞争能力。产品不断更新换代，走向先进化，系列化。企业能够生产高档呢绒、精密机械、化工及电子产品，逐步走上技术密集型产业。推行了现代管理，管理日趋科学化，企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如果说第三代企业是腾飞而起的骏马，那么它的领导人就是驭手。这一代企业的领导人大都具备了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高中毕业的占相当大的比例。扬中县有企业83个，厂长中高中文化程度的33人。不少人还去大专院校深造过，他们不仅懂得生产实践，而且有了科学的基础知识，懂得现代管理方法，将管理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统筹安排各方面的生

产经营活动。他们多谋善断，能精心决策和规划，懂得信息的重要以及如何运用信息，懂得有关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再生产四个环节以及市场、价值规律等经济学知识。在这样的企业领导人带动下，乡镇企业已不惧怕强手如林的市场竞争，它们能够以自己的优质产品，周密服务，良好信誉取胜。扬中县有五个产品获得国家、省、市、县一等科技奖、产品奖。乡镇企业有2,000余种产品。其中已有20多个品种进入了国际市场。

进入成熟阶段的企业，通过各种途径、培养、建立了一批技术人员队伍，并首先具备了设计试制力量。企业对于科学技术的接收能力增强，已经能够引进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研制产品进行试制，并较为迅速地投入批量生产。现在，科学技术下乡，不仅仅由人才流动带动，而且由科技资料流动、信息流动而日趋增长，这表明农村本身的科学技术实力的增长。

乡镇企业的供销队伍，自始至终都是一支最活跃的队伍。他们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担负着繁重的任务，一身几任。首先，负责材料与产品的供与销。在市场调节的条件下，要采集到维持一个工厂所需的全部原料，实属不易；要及时销售全部产品，迅速实现资金回收，在目前市场竞争激烈以及合同不严密，乡镇企业之间、商贸部门与企业间相互拖欠款项的严重情况下，更是很难的。其次，他们是产品的宣传员，他们能清楚地讲解本厂产品的长短处、用途及与同类产品的比较，使对方较快地了解产品并接受产品。再者，他

们是科技情报员、信息传递员、工厂建立各种挂钩关系的主要联系者。最后，他们还是出厂的产品、设备的安装辅导员、修理员。用一位供销员的话说：我们的本领是不能完全从书本上学到的，我们的经验也没有写进过书里。但我认为这是实实在在的学问。

(四)

在区域性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城乡之间的新联结还表现为信息的相互传递与不断反馈的速度越来越快，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在这次调查中，给我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是，从来没有看到乡镇企业的同志象今天这样地讲信息、抓信息。从认识上，他们自觉地把信息反馈能力作为发展乡镇工业的重要条件和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应变能力的前提。在企业干部的配备与使用上，他们把信息才能和管理、技术才能并列作为选拔的标准。“头脑活络”是挑选干部的最基本条件之一。在组织上，他们把收集和传播信息作为一级机构，并配备专门人员来抓。比如在不少县、乡的工业公司里都设立了“信息科”、“开发科”来获取综合信息，分析、利用信息。

对乡镇企业的发展来说，它所需要的信息主要是市场信息和技术信息。所谓市场信息即是通过产品的销售市场、订货会议及各种展销会、交易会和政府的商业部门了解有关产品的需求量大小和品种更换以及发展前景。所谓技术信息主要是指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及其对产品生产和市场的影响。

从扬中县看，这两种信息在乡镇工业的发展中起着促进交流、指导经营、疏拓流通、传输科技、适应竞争的作用。由于乡镇企业生产供销方面基本上是市场调节，所以企业对信息的依赖性很大。因此我们可以说，信息的交流与反馈是乡镇工业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

我们所到之处，都可以看到，乡镇企业在市场调节的实践中创造出了各种各样收集信息的方法。一是供销员在外收集信息。丹阳县乡镇企业派往全国各地收集信息的人员占乡镇企业职工总数的12%以上。这里，信息的收集通常采取的是信息开拓流传的形式。如扬中县有一个乡办厂，初期主要是通过这乡的一个知识青年在上海一家炼油厂工作的亲戚了解到有关的产品信息。尔后，通过这一层关系，这位乡镇企业的年轻人又被介绍到其他工厂，就这样滚雪球似地逐步拓宽了供销渠道，同时也就形成了一个信息网络。目前，该厂已与11个部属和25个省、市、自治区的近180多个单位建立了关系，签订了提供新情报、新技术、新产品的协议书。

二是在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和上海、北京、天津等工业发达城市建立信息站和技术、产品窗口。扬中县在深圳等地开了5个窗口，丹阳县在珠海特区开设了一个镇江（丹阳）产品专柜。所谓窗口即是开门市部或在所在地展销中心的橱窗里陈列，销售本地优质名牌的各类产品，以吸引国内外客商，就地观察市场变化，收集商品信息，尔后再反馈回来作为开发新产品的依据，获取最新的技术信息。

三是通过和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国营厂矿企业挂钩，

用聘请顾问的形式收集信息。凡是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产品不断更新改代的企业，一般都有“后台”。扬中县长旺乡的化工仪表配件厂五年来共开发了二项十个系列的化工仪表配件，200多个品种，2,000多个规格，其中有些还填补了国内空白，产品远销16个国家和地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厂能够从众多的挂钩单位源源不断地获得产品信息。另外，乡镇企业的同志为了获得最新的产品信息，他们聘请专家学者、大商店经理、批发部主任为顾问，从搞科学的研究工作的同志那里获得有关产品的更新，改进产品质量方面的信息；从作实际工作的同志处获得关于产品的流向、流量的信息。

四是通过各种专业会议如年会、产品订货会、学术讨论会等来收集信息。刚开始时乡镇企业并没有资格参加这些会议。但他们只要获得了开会的消息，不请自到，进不了正式会场就到与会人员驻地，结识各方面的人士，主动介绍自己企业的情况，诚恳地请求指教和帮助，交了不少朋友，由此获得了大量的信息。有些企业就是这样地获得了或稳住了拳头产品，逐步站到了本行业的前列，从而也就争得了作为专业会议正式成员的资格。

五是通过科委、科协、政协、统计局等组织、团体和部门的力量收集信息。所到之处，我都看到各县的科委成立了开发科，乡镇企业局建立咨询服务公司，专门负责新产品及企业技术难题方面的信息收集工作。科协联系了一大批本县的知识分子及在外地工作的一些家乡人，请他们随时提供本

专业的有关信息。政协的民主人士则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联系为乡镇工业采集各方面的情报。县统计局也充分运用手中的统计资料，分析本地区、本省及全国范围内的商品生产状况、物资消耗量、经济效益水平，并把这些信息及时通报给乡镇企业。由此可见，乡镇企业收集信息、运用信息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渠道众多。以上列举的种种方式只是就调查所得资料的归纳，实际上信息流向农村的道路还要开阔得多。

乡镇工业收集运用信息的特点之二是善于捕捉。乡镇企业的同志在收集信息方面创造了不少新名词，如“直接信息”、“间接信息”。所谓直接信息是指通过关于产品的销路、产量、需求量、经济效益等情报获得的信息。它的特点是易观察，易得到。弱点在于直接信息是反映经济活动的过去以及现在的状况的，用它指导生产则有一定的被动性。间接信息则是指必须经过自己头脑分析的信息。我以前提到过沙州县西张乡橡胶厂的厂长的办厂经验，感到他很会运用间接信息。小平同志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他从中看到了为孩子们生产足球是个方向，就开始生产贝贝球，从而赢得了市场。现在乡镇企业家们都开始开动类似的脑筋，即不仅消极地从市场上获得信息，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且积极地分析人们的喜好和情趣，创造新颖的、人们喜爱的产品，去丰富和引导人们的需求。丹阳县一个乡镇企业的供销员在上海观察到不少人喜欢把针织内衣当外衣穿。他做了一些调查，依据人们喜欢的式样，按外衣规格设计了新款式羊毛衫。据此信息，厂里立即转产，不到半月第一批样品运到上海销

售，结果一抢而空，企业家们不仅注意本行业的生产动向，而且还密切注视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与本行业相关联的其他行业的发展，以此来预测本厂产品的发展前景。如扬中县一个生产磨具的砂轮厂密切关注着机械行业的发展。凡出现了一些新的机械，他们就尽力研制新的磨具品种，以便为这些机械配套。

乡镇企业收集运用信息的特点之三是传递迅速，收效快。从获取一项信息到运用信息取得经济效益的时间往往很短。飞机是乡镇企业家们常用的交通工具，电报电话更是不可少的通讯方式。信息不仅传递迅速，而且见效也快。经过周密分析确实了信息的可靠性、可行性以后，乡镇企业就很快地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比如丹阳县在珠海特区的“窗口”开设后，丹阳丝绸引起了大批外商的浓厚兴趣。工作人员在与外商洽谈中了解到，如果把丝绸衣料加工成符合外商欢迎的服装款式，就会有更宽的销路，而且还可以大大提高丝绸品的经济效益。这个信息反馈回县后，主管单位立即组织设计并交有关企业生产。产品很快送到当地展销中心后，马上就引起了一个不小的丹阳丝绸品热潮。在这里，整个信息的传递与反馈仅仅用了三十多天的时间。

乡镇企业收集运用信息的特点之四是利用率高，经济效益大。在调查中，我听到很多关于一条信息救活一个产品，开拓一条销路，打开一个市场的例子。比如丹阳县界牌乡芭山大队灯具厂，原来生产集成电路，后因产品不畅销，质量不过关，连年亏本，濒临倒闭。后来他们得到了城市建设拓

宽马路，路灯的需求量增大的信息；于是就向其他厂借了三万元资金，转产路灯灯具；并不断更新产品，为新式路灯配套；为仪表饰灯配套；不仅解除了危机，产值还连年直线上升，由1980年的63万元猛增到了1983年的201万元。1984年这个厂与哈尔滨、长春、北京、天津、武汉等城市挂钩，已落实任务440万元。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我看到乡镇企业对信息的需求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也是不同的。在初创阶段，乡镇企业的信息渠道单一；所获得的信息量较少；而一旦获得某个信息，到在生产中付诸实施的周期也很长。在这一阶段，人们获得的是直接信息。随着乡镇工业发展到一定时期以后，企业中的信息渠道逐步走向多样化，信息量也随之增加；信息的使用周期也逐步缩短，间接信息的比重也在不断加大；到了乡镇企业的成熟阶段，信息渠道不仅多样；而且信息传递的速度由于利用了先进的通讯手段而大大加快，信息量十分丰富；信息的使用周期大大缩短；出现了象扬中县长旺乡箱包厂平均每五天就更换一个新产品或新品种的局面。

信息的不断反馈与传递，不仅使乡镇工业得到长足的进步，而且使农村的社会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就象一股巨大的冲击波，冲开了城乡之间封闭的闸门，使城乡之间形成信息环流；城乡联结的区域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协调。我们不论从实践中观察或者在理论分析都可得出如下结论，一个高效率的社会系统总是开放性的，这是因为一个社会系统总是需要不断通过物流、能流和信息流的交换来保持其稳定

发展，从而使其高度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并有目的和有效率地去影响周围的环境系统。一个封闭的系统是不可能对外界发生影响的。而只有通过信息的不断反馈与传递，才能逐步使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信息恰恰也是对农村社会和乡镇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成熟的乡镇企业应当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系统，一方面，象以上谈到的那样，它要从城市输入大量的人才、信息；另一方面，它又要输出产品，投入市场，在交换中实现产品的价值。企业是否能在市场经济中取胜，不仅要看人才、信息等外来资源条件，关键的一环还在于企业内部，取决于乡镇企业这一社会系统的结构合理性，即有效的、灵活的、科学的管理。

乡镇企业在经营管理上是很有特点的。首先是经营上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一切决定于市场，一切为了用户”是乡镇企业的经营方针，市场是经常变化的，用户的需求是不断增长、翻新的，乡镇企业能够对变化了的情况迅速作出反应，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和服务内容，活就活在这里。乡镇企业往往一个厂挂好几块牌子，如扬中县一个乡的电力器材厂同时又是水表厂和钢木家具厂。水表生产处于滞销期时，工厂就大量缩减水表的生产，将人力、物力转入处于畅销期的电力器材和钢木家具上。三个主要产品相互支持，不同产品的滞销期，畅销期相互继替，从而稳住了生产。另外，乡镇企业中的众多的小企业转产是相当快的。扬中县1983年转产的企业有62个，占了企业总数的15%。我们还调查了扬中

县的永胜、兴隆二个乡的60个乡村企业，这些厂从建厂以来共更新产品品种175次，平均每个企业将近3次。

乡镇企业的灵活性还表现在它为用户服务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上门服务，咨询服务，为用户培训使用人员的服务等各种形式。普遍流传于乡镇企业中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廉，人廉我转”的几句话更是形象地概括了乡镇企业的灵活性。

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够在经营上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主要是由于企业有了相当大的自主权。地方政府如县、乡政府对企业的管理是指导性的而不是指令的，这种指导性的管理是通过税收、信贷、价格、利润、利息等经济杠杆以及提供信息等各种形式在内的服务方式进行的。直接的生产过程完全由企业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自行支配。企业有权转产，扩建，上新项目，有权动用积累，加大投资也只需在企业内部决定。这是乡镇企业能够保持灵活性的根本保证。

乡镇企业在经营管理上的第三个特点在于层层实行了承包责任制，责、权、利分明，赏罚分明，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在这次调查中我所看到的骨干企业普遍制定了严密的责任制。按照规定，每个职工每月不仅要完成一定的产值，还要达到一定的成本要求、工时要求及质量标准。各道工序和各个车间之间，实行了严格的核算制。前道工序的产品质量不好，后道工序有权拒绝接受，这样保证了产品质量，而且生产进度、工作优劣一目了然。被评为扬中县企业管理先进单位的联合乡砂轮厂厂长对我说，他们这一套承包

责任制，使个人的报酬与贡献大小、完成任务好坏挂起钩来，与企业的生产状况、经济效益高低挂起钩来，克服了人与人、车间与车间之间的平均主义，充分调动了各类人员的积极性。现在，如果职工的奖金少了，他不是来找领导闹，而是自己按照百分考核标准细细地算一算，查出是质量问题，还是成本问题，然后努力去改正。

乡镇企业在经营管理上的第四个特点在于实行科学管理。目标管理、全面质量管理、价值工程、线性规划等现代管理方法在一些先进企业中已经开始实行。丹阳县与扬中县都有好几个厂是根据市场状况确定经营目标后，把这一大目标分解为许多小目标，做到各个环节、各个层次都能实现小目标，并围绕实现大目标建立了以计划管理为中心的生产、技术、质量、设备、劳动、财务、物资八大管理，从而保证了大目标的实施。

乡镇企业从第一代到第二代再到第三代，管理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经营决策上，由消极的、被动的决策走向了主动地、多选择方案的决策；经营指导思想上，由粗放型的不重视经济效益的经营走向了集约型的注重经济效益的经营；管理形式上，从作坊式的集权管理走向了权力分散、责任明确的科层制管理；管理风格上，从单线条的管理走向了系统管理；管理的基础由以经验为基础走向了以科学为基础。

(五)

结束了扬中的调查，我就到泰州市和泰兴县走了一走。

在泰州，我听到了一个值得引起注意并应加以研究的新问题，那就是在市管县的体制下；当前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域之间还存在着不相适应的地方。具体地说，一是扬州市在经济上带不动它属下的泰州市，人们把这种情况叫做“小马拉大车”。二是泰州市作为一个县级市划归扬州市管辖以后，它就与早先作为其经济影响范围的周围几个县处于同等的行政地位，它们相互间的经济联系就或多或少地受到行政区划的制约，因而泰州市不仅不能充分发挥它在区域发展上的中心作用，而且它本身的经济发展也就陷于没有后方、没有余地的局促状态。

从历史上看，扬州与泰州可以说是长江北岸毗邻的一对孪生子，这对同胞兄弟各自在自己影响的地区起着商品流转中心的作用。这两个兄弟城市几十年来都有长足的发展。据说相比之下，泰州市现实的经济实力比扬州市并不逊色。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扬州市的名声要比泰州大。解放后，两市均属扬州地区；在事实上扬、泰之间虽有亲疏，但属同级。1982年江苏省撤销地区一级行政，实行市管县新体制时，扬州市为省属市，领有原扬州地区的范围；泰州市变成了县级市，归扬州市领导。原来的同级关系就一下子变成了上下级关系。然而一个城市对其影响区域的经济联系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有着必然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并不能人为地加以割断或干预；因而就出现了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

总的说来，江苏全省的市管县行政体制，对于打破行政

区划，实行合理的区域经济联系，加速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并取得了实际的收效。但是由于当时实行新体制时，时限短促，不可能对区域经济发展作深入的研究，象泰州那样新问题的出现是难免的。

我在苏南与苏北的调查中，发现苏北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相对弱小和缓慢，其主要原因就是缺少类似苏、锡、常、通那样的经济实力较强的中等城市。因而苏北的有些县城升格为市以后，“小马拉大车”的现象较为突出。在苏南则相反，表现为一些原先有一定发展特点或规律的城镇失去它所影响的区域。例如宜兴县的丁蜀镇，这个有悠久制陶历史的手工业名城受到了县属镇建制的束缚，无法施展它的影响力。

这一问题在苏北与苏南的不同表现，在泰州与扬州的关系上集中体现了出来。对此我们应当认识到，问题既然是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引起，就必须在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去解决。现在有一批专家学者正在泰州作深入的调查，我相信通过他们的研究与实际部门的工作，这个新问题定能找到妥善解决的方法，并为我们对小城镇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提供有益的经验。我们也愿意建议江苏省能进一步开展社会经济区域发展战略的研究，并根据实际情况对现有行政区划作适当的调整。

这次的宁、镇、扬地区的调查，我把重点限于乡镇企业和城乡联结型的区域发展的研究。尽管这一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但这是小城镇研究的新开拓。我觉得乡镇企业从总体上已经走过了初创、发展阶段，正日趋成熟。从总体上看，

乡镇企业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但正是在这不平衡中我看到了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显示出来的初创、发展和成熟这三个阶段。虽然处于成熟阶段的企业，现在只是乡镇企业发达地区的少数，是一个苗头。但这个苗头提出了不少新问题。乡镇企业处于成熟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趋向于智力、技术密集型。这就是说在这乡镇企业发展的第三阶段，一个老问题将会再度出现，那就是劳力的第二次剩余。乡镇企业从第一次劳力剩余发生起来，并在它的发展中引起了小城镇的复苏和繁荣，带来了城乡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一系列变化。那么第二次劳力剩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这决不是一种简单的循环，在一些乡镇企业发达地区出现的第三产业队伍是一个信号，它或许就是城乡在坚实的经济联系基础上达到全面融合的前奏。因此，对于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的探讨，应当作为小城镇研究新阶段的主题。由此又可开出一批具体的问题来，例如乡镇企业对城市社会经济的改革的意义，两者之间有哪些普遍性，又各有什么特殊性？又如乡镇企业与城乡社会价值体系的关系等等。当然在开拓新问题的时候，对小城镇社区本身的分析还要加强和深化，这样我们就能承前启后，把小城镇研究再推进一步。

最后应对帮助我整理本文的沈关宝、李汉林、聂莉莉同志表示感谢。

小城镇四记

费孝通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印张 插页3张 93,000字

1985年6月第一版 1985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统一书号：4203·027 定价：0.35元